



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1年度报告

Boao Forum for Asia
Asian Economic Outlook and Integration Progress
Annual Report 202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经济前景及 一体化进程

2021 年度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1 年度报告.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1.3

ISBN 978-7-5663-2256-2

I. ①博… II. III. ①经济一体化—研究报告—亚洲—2021 IV. ①F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53043 号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1 年度报告

责任编辑: 张俊娟

出版发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网 址: www.uibep.com
资源网址: www.uibepresources.com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E-mail: uibep@126.com

成品尺寸: 215mm×278mm
印 张: 7.25
字 数: 186 千字
ISBN 978-7-5663-2256-2

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0 元

C 目录 Contents

缩略语	IX
写作团队成员	XI
序言	XIII

上篇 亚洲经济前景

概述	003
第 1 章 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	005
1.1 经济增长	005
1.2 就业与收入	009
1.3 物价与货币政策	013
1.4 贸易和投资	018
1.5 金融市场	023
第 2 章 亚洲经济热点议题	031
2.1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转型	031
2.2 债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032
2.3 推进落实亚洲区域经贸安排	036
2.4 新冠肺炎疫情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38

下篇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概述	043
第 3 章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	045
3.1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一体化	045
3.2 亚洲工厂一体化	054
第 4 章 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	061
4.1 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情况	061
4.2 亚洲数字贸易发展	066
4.3 亚洲重点服务行业依存度分析	071
第 5 章 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融合度	075
5.1 亚洲直接投资融合度现状	075
5.2 亚洲跨境投资展望	081
第 6 章 亚洲经济体金融融合进程	083
6.1 亚洲金融市场开放	083
6.2 亚洲货币合作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087
6.3 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	090
参考文献	099
编写说明及致谢	101

表目录

List of Tables

表 1.1	2020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基准利率调整一览表	016
表 1.2	2020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情况	026
表 1.3	2016—2019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的银行不良贷款率	028
表 2.1	2018—2020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及财政赤字率	033
表 2.2	2020 年第二季度亚洲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比增速	036
表 3.1	2012—2019 年部分经济体的出口依赖度指数	046
表 3.2	2019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三个子指标的对比情况	047
表 3.3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间贸易依存度指标	049
表 3.4	2018 年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	049
表 3.5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间贸易流向矩阵	053
表 3.6	2019 年亚洲不同地区的商品出口额	053
表 3.7	2019 年亚洲工厂依存度指数	055
表 3.8	2018 年亚洲工厂依存度指数	056
表 3.9	2001—2019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工厂依存度情况	057
表 3.10	2019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EU27、USMCA、CPTPP 的依存度	058
表 3.11	2018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EU27、USMCA、CPTPP 的依存度	059
表 3.12	2019 年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零部件产品清单	060
表 4.1	2019 年 25 个经济体服务业出口总额及增加值出口总额	062
表 4.2	2019 年 25 个经济体对服务的需求及其构成	063
表 4.3	2019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出口服务业增加值的含量及其构成	064
表 4.4	数字贸易的分类与解释	066
表 4.5	2017—2019 年亚太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	072
表 4.6	2019 年亚太主要经济体旅游相互依存度	073
表 5.1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依存度指数	077
表 5.2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引进外资依存度指数	078
表 5.3	2013—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内部投资的依存度指数	079
表 5.4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	080
表 6.1	2017—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资本流出	084
表 6.2	2017—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资本流入	085

表 6.3	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流向	085
表 6.4	2015—2019 年中国对外和投入中国的资产组合投资	086
表 6.5	亚洲金融中心城市人力资本情况	092
表 6.6	2020 年亚洲主要证券交易所数据	094
表 6.7	2015—2019 年金融中心信贷规模	095
表 6.8	2015—2019 年金融中心境外贷款比例	095
表 6.9	2015—2019 年金融中心信贷/GDP	096
表 6.10	2019 年第一季度—2020 年第二季度城市所在经济体对非金融部门的 信贷总额/GDP	096
表 6.11	2013 年、2016 年和 2019 年主要经济体外汇交易量	097

图目录

List of Figures

图 1.1	2017—2021 年亚洲不同地区经济体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	006
图 1.2	2018—2021 年亚洲不同地区经济体失业率	010
图 1.3	2019—2020 年亚洲不同地区通货膨胀率	013
图 1.4	2019 年第一季度—2020 年第三季度亚洲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	018
图 1.5	2019 年第三季度—2020 年第三季度亚洲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	020
图 1.6	2018—2019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	021
图 1.7	2018—2019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	022
图 1.8	2020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股票指数涨跌幅	024
图 1.9	2020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本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直接标价法）	025
图 3.1	2012—2019 年亚洲经济体对亚洲的出口依赖度指数	047
图 3.2	部分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指数	050
图 3.3	2011—2019 年亚洲工厂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依存度变迁趋势	055
图 4.1	2019 年亚太部分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排序	072
图 4.2	2017—2019 年部分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中国的依存度	074
图 6.1	2015—2019 年中国对外和投入中国的资产组合投资走势	087
图 6.2	全球支付结算货币占比排名	088
图 6.3	全球贸易融资市场货币占比排名	089
图 6.4	亚洲金融中心城市 GDP	091
图 6.5	金融业增加值占城市 GDP 比重	091
图 6.6	亚洲上市公司数量占比	093
图 6.7	2019 年主要经济体外汇交易量占比	097

缩 略 语

ABIF	东盟银行一体化框架
ADB	亚洲开发银行
AI	人工智能
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ARFP	亚洲地区基金护照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BIS	国际清算银行
CBDC	央行数字货币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PIS	资产组合协助调查
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DGCX	迪拜黄金和商品交易所
DIFC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DLT	分布式账本技术
DMCC	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
DME	迪拜商品交易所
ERI-ASIA	出口依赖度指数
FAST	新加坡快速安全转账系统
FDI	外国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
FinTech	金融科技
FTA	自由贸易协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TCN	全球贸易连接网络
HKMA	香港金融管理局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IFFO	香港基础设施融资促进办公室
IIF	国际金融协会
IMDA	新加坡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oT	物联网
IPO	首次公开募股
JETRO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MAS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CDF	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MOA	意向备忘录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FDI	对外直接投资
OFDII	直接投资流出依存度指数
QABs	“合格的东盟银行”制度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TA (s)	区域贸易协定
SGQR	快速反应编码系统
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UNCTAD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联合国贸发会议）
UPI	统一支付接口
USBEA	美国经济分析局
VCC	可变动资本公司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写作团队成员

张宇燕，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贾中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林桂军，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邓世专，北京建筑大学
裴建锁，中国人民大学
孙梦阳，北京联合大学
王春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 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 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周念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曹 莉，主编，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刘 琰，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田维希，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序 言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极不平凡。新冠肺炎疫情已夺走全球 270 多万人的宝贵生命，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深度衰退，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2021 年，世界迎来复苏曙光，全球加大抗疫的努力，推进疫苗接种，各地区经济渐次复苏，多边合作声音加大。亚洲经济体是加强全球疫情防控、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以及促进贸易与投资的重要力量，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器。

2020 年，面对世纪大疫情和六十年来首次经济萎缩，亚洲各国积极合作抗疫，在全球最早总体稳定疫情，恢复生产。2020 年，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进一步提升至 47.3%¹，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区域合作继续深化。贸易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亚洲作为全球价值链中心并未出现转移，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贸易联系增强，数字贸易在疫情下加速发展。这些互通与合作为亚洲应对疫情和经济的双重挑战提供了强大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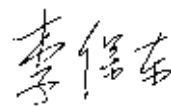
2021 年，随着疫情逐步在全球得到控制，亚洲经济复苏步伐将提速，亚洲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速预计高于全球其他地区。区域内部货物贸易、以数字贸易为引领的服务贸易、直接投资与金融市场等领域进一步融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将成为疫情后亚洲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早生效将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一系列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一起，为全方位促进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等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互联互通倡议有力对接，对于区域经贸合作、疫情后经济恢复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疫情后的世界，卫生防疫合作、贸易保护、贫富两极分化、气候变化、数字化鸿沟全球性挑战更为凸显，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新要求，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方案。贸易、投资、金融深度融合的亚洲，已通过自身实践表明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多边合作的成果与意义。相信在后疫情时代，亚洲经济体将更加积极有为，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机构改革与完善，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多做贡献。

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将迎来成立二十周年。此时，是回顾亚洲在全球化浪潮中蓬勃发展，展望亚洲在大变局下如何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时刻。论坛传统旗舰报告《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报告》也迎来发布十周年，希望此本报告能继续激发大家对亚洲前景及亚洲深度联结世界的思考与讨论。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上篇 | 亚洲经济展望



概述

新冠肺炎疫情侵袭世界，亚洲也受到严重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HO）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7日，亚洲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2,566.8万人，占全球比重为22.1%，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0万人，占全球比重为15.8%。新冠肺炎疫情给2020年亚洲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导致一些亚洲经济体长期存在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货膨胀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收入差距等问题进一步加剧。面对疫情，亚洲各经济体均采取了大规模的应对措施，但经济复苏仍很脆弱，并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征。

在经济增长上，亚洲各经济体都经历了增速的大幅下降。2021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估计，2020年亚洲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7%，较2019年下降5.7个百分点。但是，相对于-3.5%的世界经济增速，亚洲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地区，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因此进一步提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比2019年提高0.9个百分点至47.3%。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2.3%，但较2019年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作为亚洲最大的发达经济体，202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5.1%，较2019年下降5.4个百分点。

经济萎缩通常伴随着物价下跌和失业增加。2020年，中国通货膨胀率为2.5%，较2019年下降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通货膨胀率为0.8%，较2019年下降0.8个百分点。2020年10月，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状态，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下降0.4%，12月，降幅进一步扩大至1.2%，创2010年5月以来新低。尽管印度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但也呈现下降势头。2020年12月，印度通货膨胀率为4.6%，较10月7.6%的年内高点下降了3个百分点。在物价水平总体下跌的同时，亚洲各地区的失业率均不同程度上升。2020年11月，国际劳工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亚太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失业率为5.2%，较2019年增加0.8个百分点。其中，东亚地区较2019年增加0.4个百分点至4.8%，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较2019年增加0.6个百分点至3.2%，南亚地区较2019年增加1.5个百分点至6.8%，阿拉伯国家较2019年增加1.7个百分点至9.9%，中亚和西亚地区较2019年增加0.5个百分点至9.8%。

贸易与跨境投资的减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异动，亦是经济萎缩的伴生结果。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亚洲货物贸易总额为9.16万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下降7.0%。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4.77万亿美元，同比下降4.9%；货物进口总额为4.39万亿美元，同比下降9.1%。但中国等少数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逆势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5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较2019年增长1.5%。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¹有所减少。2021年1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2020年亚洲发展中经

1. 外商直接投资（也称“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wholly foreign-owned enterprise）、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合作经营企业（Chinese-foreign 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 4,760 亿美元，较 2019 年下降 4%，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降幅高达 42%。疫情也造成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跌。IMF 数据显示，2020 年 4 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32%，此后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2020 年 11 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1.6%。

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兑美元汇率走高和政府债务迅速扩张。在疫情冲击下，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股票市场曾经历猛烈下挫。为遏制股票市场指数快速暴跌的势头，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埃及、土耳其等经济体甚至相继出台禁止卖空或暂时闭市等措施。得益于亚洲地区各经济体出台的刺激政策和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股票市场出现上涨行情，且部分经济体的股票市场指数涨幅较大。其中，2020 年，伊朗的 TEDPIX 指数上涨幅度达 270.8%，尼泊尔的 NEPSE 指数涨幅为 79.0%；韩国综合指数、中国沪深 300 指数、日本日经 225 指数和印度 SENSEX 指数也分别上涨 30.8%、27.2%、16.0%和 15.8%。亚洲主要经济体汇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升值。2020 年，人民币、日元、韩元和印度卢比兑美元分别升值 6.3%、5.0%、6.0%和 2.3%。面对疫情，亚洲各经济体均采取了应急对策，从而使多数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进一步上升。据 2021 年 1 月 IMF 估计数据，2020 年亚洲地区有 41 个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上升。其中，马尔代夫、日本和巴林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分别较 2019 年上升 40.3 个百分点、28.2 个百分点和 24.9 个百分点。

为应对疫情冲击，亚洲经济体均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临时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例如，中国将 2020 年财政赤字规模在 2019 年基础上增加人民币 1 万亿元，达到 3.76 万亿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比 2019 年增加 1.6 万亿元至 3.75 万亿元，发行 1 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日本为应对疫情也加大了支持经济的政策力度，预算赤字由 2019 年占 GDP 的 2.6%大幅扩张至 2020 年占 GDP 的 11.3%。2020 年 5

月，印度推出总额 20 万亿卢比（约合 2,680 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 GDP 的 10%左右；2020 财年，印度财政赤字率达到 7.2%的较高水平。在货币政策方面，2020 年亚洲 30 个经济体央行共降息 80 次，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例如日本央行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1%。

展望 2021 年，疫情仍是直接影响亚洲经济表现的主要变量。从目前情况看，一些亚洲经济体正逐步实现新冠病毒疫苗的大规模接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但是，全球疫情的演变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和欧洲主要经济体经济仍受疫情拖累，亚洲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的改善将十分有限。但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落实将在贸易投资领域为亚洲经济带来新的积极因素。

即使全球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2021 年亚洲经济复苏仍将面临各种非疫情因素的影响。2020 年 11 月，标准普尔发布的报告指出，2021 年包括亚洲地区在内的全球银行业可能面临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该机构对全球 1/3 的银行持“负面”展望，并指出全球银行业将面临如下短期和中期风险：一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之前持续受到压力的银行的信用评级可能会下降；二是各经济体的政府将陆续结束对受疫情影响部门的援助，这些短期援助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负债，从而使它们难以在正常时期融资；三是企业债务的持续增长和更多的违约，将使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承受巨大压力；四是房地产市场潜在问题增多且其严重性被低估。除了微观层面的风险外，亚洲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蕴含的风险亦不容低估，不排除个别经济体出现严重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个别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出现因违约引发的连锁式主权债务危机。

总体来看，2021 年亚洲经济将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6.5%以上，其中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8.5%以上。

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

1.1 经济增长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疫情及防控举措导致需求收缩、供给中断、预期失稳，尽管各国采取了救助或刺激性经济政策，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经济还是陷入了深度衰退。新冠肺炎疫情事实上中断或“覆盖”了近年整体逐渐升温的“中美贸易战”，但对已经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也造成一定影响。有评估报告认为，2020年中国对美国产品的购买达到了协议金额的58%（按中国进口统计口径计算）或59%（按美国出口统计口径计算）。¹尽管如此，“中美贸易战”对2020年亚洲经济的直接影响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相对有限。2020年10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4%，2021年1月更新后的预测将2020年增长率修正至-3.5%。即便上调了0.9个百分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

率比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0.1%也要低得多，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上年报告中，我们预计2020年亚洲经济增长为负，且“如果疫情反复或经济刺激政策效果不彰”“不能排除出现更严重负增长的可能”。现在来看，据IMF预测数据计算，亚洲经济体²2020年加权实际GDP增速为-1.7%，显著低于2019年4.0%的水平，但仍然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仍在提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7年至2019年这一比重分别为45.3%、45.9%和46.4%，2020年预计进一步提升至47.3%。2021年，亚洲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据IMF数据计算，其加权实际GDP增长率为6.7%，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占世界GDP的比重将继续小幅上升至47.9%。

1.1.1 2020年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2020年，多数亚洲经济体经济较2019年出现明显负增长。具体来看，IMF有数据的47个亚洲经济体³中，除土耳其和伊朗两

1. Chad P. Bown. US-China phase one tracker: China's purchases of US goods. March 1, 2021. <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us-china-phase-one-tracker-chinas-purchases-us-goods>.

2. 亚洲经济体包括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不丹、文莱、柬埔寨、中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朝鲜、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黎巴嫩、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叙利亚、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也门。

3. IMF数据库中巴勒斯坦、朝鲜和叙利亚数据缺失。

国 2020 年实际 GDP 增长率高于 2019 年之外，其他 45 个经济体 2020 年增长表现均不如 2019 年。在 47 个经济体中，有 34 个（占 72.3%）经济体实际 GDP 在 2020 年都出现了负增长，其中 18 个（占 38.3%）经济体经济收缩的幅度超过了 5%。

分区域来看，以 IMF 在 2020 年 10 月的预测¹为基础，据其 2021 年 1 月更新的部分亚洲经济体数据²进行调整之后计算可知（见图 1.1），在亚洲各区域经济体³中，所有区域 2020 年都呈现负增长状态。其中，东亚区域的加权实际 GDP 只有 -0.2% 的微弱负增长，增速在亚洲各区域中居于首位。

作为本地区最大经济体，中国（未计入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实现了 2.3% 的增长，对避免本地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本地区缅甸（2.0%）、越南（1.6%）、文莱（0.1%）和中国台湾（0.05%）等经济体也维持了正增长。以服务业为主的小型经济体中国澳门经济出现了 52.7% 的巨大降幅，菲律宾（-9.6%）、泰国（-6.6%）、新加坡（-6.0%）、马来西亚（-5.8%）等制造业较发达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经济体也出现比较明显的经济下滑，本区域最大发达国家日本也出现 5.1% 的经济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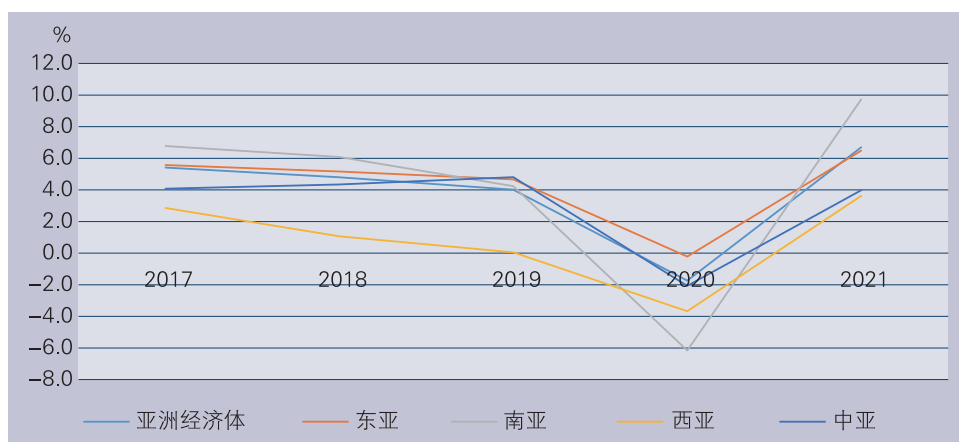


图 1.1 2017—2021 年亚洲不同地区经济体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

注：2020 年数据为估计值，2021 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据 IMF 数据计算。

中亚地区 2020 年经济表现仅次于东亚，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2.1%。该地区的塔吉克斯坦（1%）、乌兹别克斯坦（0.7%）和土库曼斯坦（1.8%）在 2020 年实现了正增长。但经济收缩最严重的吉尔吉斯斯坦，GDP

下降了 12.0%，本地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哈萨克斯坦也下降了 2.7%，对地区经济增长造成拖累。

西亚地区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3.7%，除土耳其之外，其他所有西亚经济体 2020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0.

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anuary 2021 Update.

3. 根据博鳌亚洲论坛的划分，亚洲分为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个区域：东亚包括文莱、柬埔寨、中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韩国、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和越南；南亚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亚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西亚（位于中东地区的亚洲经济体）包括巴林、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年都出现负增长，最严重的黎巴嫩下滑了25%，降幅最低的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也负增长3.9%。如果没有土耳其经济增长的拉动，西亚2020年的增长数字会更低。IMF在2021年1月的预测中，将土耳其2020年实际GDP增长率由2020年10月预计的-5.0%大幅上调至1.2%。由于土耳其经济规模占整个西亚地区三分之一左右，这一调整避免了西亚加权实际GDP增长率的进一步下探。

南亚经济整体出现显著下滑，2020年加权实际GDP增速为-6.2%。实际上，南亚各经济体中，孟加拉国(3.8%)、不丹(0.6%)和尼泊尔(0.02%)实现了正增长，但该地区最大经济体印度2020年经济增速为-7.6%，很大程度连累了地区增长。该地区以旅游业为支柱的国家马尔代夫经济下滑也较为严重，实际GDP增速为-18.6%。

1.1.2 各经济体纷纷出台救助或刺激政策

为应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大流行，亚洲经济体在2020年纷纷出台救助或刺激性政策。¹各国政策往往既有刺激总需求的需求侧举措，也有实施救助以改善供给的供给侧举措。亚洲主要国家采取的后一类措施本报告集中在“就业与收入”一节中介绍。

在东亚地区，中国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求出台抗疫举措。一是适当提高赤字率，将财政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以上²，赤字规模比2019年增加人民币1万亿元，达到3.76万亿元(约合5,800亿美元)，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二是加大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2019年增加1.6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三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设立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目标。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中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8%。五是加强预算平衡，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增强财政持续性。³韩国因为疫情突破了传统的保守型财政政策，转而采取刺激就业和增长的举措。2020年9月，韩国政府提出在2021年的国家预算中将财政支出增长8.5%，达到555.8万亿韩元，主要用于支持就业和提高社会福利。日本为应对疫情也加大了支持经济的政策力度，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019年的2.6%大幅扩张至2020年的11.3%。

在南亚地区，印度2020年经济受到“抗疫”和“抗议”的双重影响，抗疫举措效果因抗议而被打折扣。2020年3月，在全国封锁之前，印度政府宣布了1.7万亿卢比(约合23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给受封锁影响的穷人直接发放现金及粮食等生活必需品。5月，印度推出总额20万亿卢比(约合2,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GDP的10%左右)，用于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市场流动性支持、针对工人和商贩等的救济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等。⁴10月，印度借节日消费实施了针对需求端的财政刺激，但此轮规模较小。2020—2021财年，印度财政赤字率达到7.2%的较高水平，部分是因为3月至5月的全国性封锁造成直接和间接税收收入大幅减少。除疫情深重之外，印度政府对农业部门、劳动法、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引起了利益集团的不满。其中，农民对农业改革的持续抗议迫使政府推迟改革实施，并推迟土地征用改革。大规模抗议造成的疫情传播及社会失序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抗

1. 本节主要概述各区域主要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本报告有专章分析。

2.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匡算结果是2020年中国财政赤字率为5.2%。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China, Generated on February 5th 2021.

3. 财政部调研小组：2020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008/t20200806_3563343.htm。

4. 张宇燕. 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疫举措的作用。

在西亚地区，沙特面临疫情大流行和石油市场动荡的双重危机。2020 年第二季度，沙特政府的石油收入同比下降了 45%，而与疫情相关的对企业及个人的救助及刺激性支出居高不下，政府被迫出台包括将增值税从 5% 提高至 15%、取消每月支付给公共部门工人的生活补贴以及大幅削减资本支出等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反过来又损害了投资和消费。尽管如此，2020 年沙特财政赤字与 GDP 之比仍高达 10%。以色列 2020 年 4 月出台第一轮 800 亿新谢克尔（约合 224 亿美元）规模的刺激计划，其中 110 亿新谢克尔用于卫生支出，200 亿新谢克尔用于支持社会安全网，延长失业救济金和自营职业者补助金，410 亿新谢克尔用于企业流动资金援助，80 亿新谢克尔用于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为有儿童、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家庭提供一次性 500 新谢克尔补助。6 月，以色列将第一轮刺激计划规模扩展 200 亿新谢克尔，用于就业奖励金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7 月，出台 800 亿新谢克尔规模的第二轮刺激计划，9 月又追加了 105 亿新谢克尔，用于失业援助和企业支持。土耳其实施了反周期的财政支出，通过贷款担保和其他表外措施，2020 年财政支出超过 2,800 亿里拉（约合 365 亿美元，占 GDP 的 5% 左右），预计财政赤字将达到 1,727 亿里拉，约占 GDP 的 3.4%。这一水平明显高于 2019 年的 2.9%，比 2014—2018 年的平均水平 1.3% 也要高得多。疫情防控的限制性举措对收入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土耳其政府推迟了部分税收和社会保障费的征收，但间接税——主要是特别消费税（SCT）和增值税（VAT）的收入增长势头良好，避免了赤字率的进一步攀升。与其他国家相比，土耳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充足，通过延迟纳税、支持就业等系列措施，2020 年第三季度起经济活动出现强劲反弹，超过了疫情前水平。

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政府和国家银

行提出了《恢复经济增长综合计划》和“就业路线图”，其中有支持受影响最大部门的措施。政府还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降低一些哈萨克斯坦本国不能自给自足的食品的进口关税。货币当局将最终借款人的利率限定为不超过 5%。哈萨克斯坦政府还对特定行业提出支持性举措。对业务涉及大型零售设施、购物和娱乐设施、展览博览会以及健康、健身和体育设施的企业免征房产税。农业部门方面，农业生产者免交农业用地土地税，涉农个体工商户免交个人所得税；拨款 2,000 亿坚戈（约合 4.75 亿美元）用于春季农业工作，其中 700 亿坚戈用于发展种子生产，购买化肥和农药；按市场价格下浮 15% 向农业生产者出售约 39 万吨柴油。哈萨克斯坦政府还给医生、护士、警察发放了奖金，计划到 2023 年逐步将医务工作者的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的两倍，还采取措施补贴国内药品生产企业。

1.1.3 经济形势展望

整体来看，亚洲经济在 2021 年出现恢复性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据 IMF 预测数据，2021 年亚洲经济体的加权实际 GDP 增速预计约为 6.7%，将较 2020 年的 -1.7% 有明显回升。其中，南亚以 9.7% 的增速位居第一，这主要是建立在地区大国印度 2020 年经济大幅收缩的基期效应基础之上。东亚地区预计 2021 年增长 6.5%，鉴于 2020 年只有微弱负增长，2021 年如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可谓殊为不易，这与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疫情防控措施有力有效、复工复产得以有序推进有关。由于在全球疫苗分配中不占优势，而油价也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西亚经济受疫情和原油市场冲击的前景在 2021 年或将延续，IMF 预计其仅有 3.6% 的相对疲弱的增长。如果土耳其经济因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疫情反复或美国制裁趋紧而受到影响，西亚经济增速可能更低。中亚地区经济预计在 2021 年增长 4.0%。

2021 年的亚洲经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还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变。随着世界各国疫苗研发和生产的不断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景正在显现,但欧美第二波疫情高涨,病毒变异会不会令疫苗全面或较大程度失效,有效疫苗的分配会不会因为强权争夺而失序,相关支持性政策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会不会过早退出,这些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拜登政府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及双边关系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有多大程度的改善(或恶化),美国和伊朗、朝鲜的关系会否引发地区冲突,中国与印度在边界上的纷争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向经贸等其他领域扩散,这些因素也可能让2021年亚洲经济的恢复性增长蒙上阴影。

1.2 就业与收入

2020年,包括亚洲经济体在内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因疫情大流行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新冠病毒与全球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工作时间损失占总时间的8.8%,相当于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流失,大约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劳动力市场损失的4倍;工作时间的重大损失也使全球劳动力收入与2019年相比下降8.3%,相当于3.7万亿美元,约占2019年全球GDP的4.4%。不过与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遭受的工作时间损失相对较轻,2020年工作时间损失占比为7.9%,由此导致劳动力收入同比下降6.6%,而受冲击最严重的美洲,同期工作时间损失占比为13.7%,相应的劳动力收入同比下降10.3%。

据ILO预计,基准情形下,2021年全球工作时间较2019年损失3%,亚太地区工作时间损失2.1%;乐观情形下,全球工作时间损失1.3%,亚太地区工作时间损失0.8%;悲观情形下,全球工作时间损失4.6%,亚太地区工作时间损失3.7%。¹

1.2.1 疫情冲击造成失业率高企

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数据并未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冲击,但从其预测所展示的中长期趋势来看,亚洲主要地区²近年已呈现失业率上升或维持在高位的特征(见图1.2)。如,阿拉伯国家失业率2018年至2021年维持在8.1%左右水平,中亚和西亚地区失业率由2018年的8.2%上升至2021年的9.3%,东亚地区失业率由2018年的4.1%上升至2021年的4.3%,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失业率由2018年的3.0%上升至2021年的3.2%,南亚地区失业率由2018年的5.3%上升至2021年的5.4%,整个亚太地区则由2018年的4.3%上升至2021年的4.5%。

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就业造成的冲击使亚太地区失业率明显向上偏离了长期趋势。2020年11月ILO预测数据显示,全世界15岁及以上失业率由2019年的5.4%上升至2020年的6.5%;亚太地区由4.4%上升至5.2%,其中东亚地区由4.4%上升至4.8%,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由2.6%上升至3.2%,南亚地区由5.3%上升至6.8%;阿拉伯国家由8.1%上升至9.9%;中亚和西亚地区由9.3%上升至9.8%,其中西亚地区由11.8%上升至12.3%。

1.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Seventh edition. 25 January 2021. pp.8-11.

2. 国际劳工组织的区域分类如下:阿拉伯国家包括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巴勒斯坦、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亚太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南亚等三个地区,其中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日本、朝鲜、韩国和蒙古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文莱、柬埔寨、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泰国、东帝汶、汤加、瓦努阿图和越南,南亚经济体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亚和西亚经济体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塞浦路斯、格鲁吉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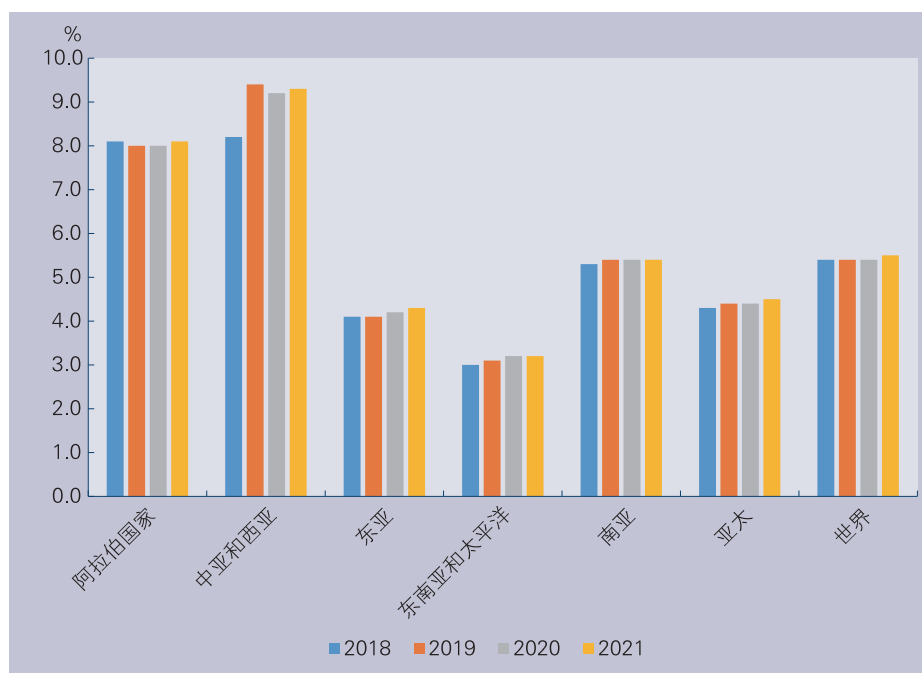


图 1.2 2018—2021 年亚洲不同地区经济体失业率

资料来源：ILO WESODATA。

1.2.2 劳动者收入增长率下行，收入不平等加剧

劳动者收入受疫情影响显著。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刚刚开始显现的 2020 年第一季度，首当其冲的是供给侧。大量劳动力受疫情影响恐慌及限制活动的防控措施影响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短缺现象突出，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率较高。从第二季度开始，疫情大流行对需求侧的影响开始呈现并逐渐取代供给侧影响成为经济影响的重心，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速明显下降，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2020 年第一季度蒙古国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 34.4%，第二季度回落至 8.8%；2020 年第一季度巴勒斯坦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 10.8%，第二季度下降至 2.6%；2020 年第一季度泰国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 2.3%，第二季度同比增长率下降至 -0.8%；2020 年第一季度越南雇员平均名义月收入同比增长 8.5%，第二和第三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下降至 -0.2% 和 -0.6%。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及收入的冲

击，亚洲经济体均采取了针对企业和劳动者的一系列政策。2020 年 2 月，中国出台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并开通了企业网上申领平台，推广“不见面”审批，尽快拨付资金，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出台了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政策。3 月，中国政府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100%；对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适当放宽其稳岗返还政策认定标准，重点向受疫情影响企业倾斜，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 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不超过 3 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确定。截至 2020 年 4 月，中国政府累计发放 37.1 亿元人民币（约合 5.24 亿美元）物价补贴，用于扶持困难群众。10 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清单》，明确企业（单位）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可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登记失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可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登记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个体经营），可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税费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登记失业人员根据参保情况和生活困难程度，可享受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一次性生活补助、临时生活补助、最低生活保障、一次性临时救助金政策。

韩国对不同行业或领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企业及就业支持政策。运输业采取降低站点租赁费，延长航空公司新产生的罚金的支付期限，延长飞机认证系统（ACS）费用的减免时间，为客货运公司发放紧急贷款等措施。旅游餐饮服务业采取为确诊者公司提供消毒服务、放宽就业稳定补贴要求、削减对住宿设施征收的资产税、延长免税店支付特许权费期限并允许分期支付、临时引入优惠的非抵押融资方式、扩大一般贷款覆盖面等举措。针对弱势群体提出稳定生计的措施，如向无薪假和休假的工人提供紧急生活援助、降低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就业补贴申请条件、向建筑工人提供零息贷款以及为参加公共服务的老年人预付促进就业补贴等。

日本也出台了大量支持企业、家庭及就业的举措。例如，为应对疫情，向居民支付现金约 12.9 万亿日元，向每个儿童发放 1 万日元津贴；向需要临时资金的人提供最高 20 万日元的无息贷款，向重建生活的人提供为期 3 个月的 45 万~60 万日元的追加无息贷款，在某些情况下，贷款还可以豁免；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租金支持，削减或豁免社会保险缴款，支持缓交水电费；建立新的覆盖短期及长期雇员的补贴制度，因业绩恶化让员工停工休息时支付的“雇用调整补贴”每天最高 8,330 日元，后调增至 1.5 万日元；对于与其他公司签订了业务委托合同等无正式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因疫情而不得不停止工作的，每天提供 4,100 日

元补贴；设立 10 万~20 万日元的紧急小额资金专项免息贷款；向中小企业和独资企业等支付现金约 2.3 万亿日元；为受影响的中小企业减免机械和建筑物的地方财产税；要求房东根据租户的情况考虑延期交租，同时要求银行对房东的债务进行重新安排等。

印度的相关政策包括：每月向穷人免费发放 5 千克大米或小麦和 1 千克绿豆；增加就业保障计划下的工资；分期向贫穷的养恤金领取者、寡妇和残疾人直接发放每人 13 美元现金，向 2 亿妇女每人发放 19.6 美元现金；向 869 万农民发放每人 26.25 美元现金；允许退休基金机构“雇员公积金组织”的 6,000 多万用户从其公积金账户中提取不超过 3 个月基本工资和物价补贴的金额备用；向就业保障计划增拨 53 亿美元，以促进就业；要求在停工期间房东不应要求劳工交纳房租；为住房计划提供 13 亿美元的额外补贴；对于雇员人数在 1,000 人以下的企业，联邦政府将提供工资的 12% 作为雇员的公积金缴款，同时提供工资的 12% 作为雇主对雇员公积金的缴款；向公共和私营机构的雇主发出咨询意见，要求他们在 21 天的隔离期内不得解雇雇员，特别是临时工和合同工，也不得降低工资；对贷款额低于 660 美元的小额贷款接收人，在 12 个月内向及时付款人提供 2% 的利息补贴；为街头小贩提供 6.63 亿美元的信贷服务，为每个企业提供最高 130 美元的初始周转资金；提供 130 亿美元用于资助开展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农场；提供 14 亿美元用于海洋、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活动，11 亿美元用于相关基础设施；为资本和工业支出提供 13 亿美元的额外预算刺激。

沙特也提出了系列企业和就业支持政策。沙特政府提供总额 90 亿里亚尔的补贴，承担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员工 3 个月工资的 60%；允许私营部门的雇主与雇员达成协议，减少工资以反映实际工作时间；推出了总规模 500 亿里亚尔的“私营部门融资支持计划”，支持中小企业运营；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发起规模超过 50 亿里

阿尔的计划，其中 20 亿支持就业，8 亿支持培训，15 亿支持新求职者，10 亿为 2019 年 7 月 1 日以来在私营部门就业的沙特人提供工资补贴；为商业、工业和农业部门的消费者提供为期两个月的电费 30% 的折扣；为自由职业者和“零工经济”从业人员提供 2 个月工资（每月最高 3,000 里亚尔）。

土耳其的企业、家庭及就业支持政策包括：分阶段向 720 万户家庭提供每户 1,000 土耳其里拉援助，最低养老金提升至每月 1,500 土耳其里拉。公共银行推出针对月收入低于 5,000 里拉的家庭的长期信贷。每月转给社会福利和团结协会的金额从 1.35 亿土耳其里拉增加到 1.8 亿土耳其里拉。232.4 万名中小学生在获得有条件的教育现金转移支付。放宽短期工作津贴（相当于最低工资的 60%）的申请条件。向因疫情而被迫休无薪假，且无法从短期工作中受益的雇员提供每月 1,170 土耳其里拉的财政支持。出台正常化支持方案，如果雇员由短期工作转为正常工作，将从雇主支付给社保局的社会保险费中扣除 1,103 土耳其里拉。向约 780 万的所有雇主提供每月 75 土耳其里拉的最低工资，支持到 2020 年底。将“投资和管理信贷”的最高限额提高到 300 万土耳其里拉，相应的，还款期从 48 个月调整为 60 个月。银行对汽车行业、建筑行业、一般消费和旅游业的信贷利率低于平均水平。因疫情而面临现金流中断的企业还贷可推迟 3 个月。手工业者和工匠向国家贷款机构的还款也可推迟 3 个月，且该期间不计利息。土耳其进出口银行推出再贴现信贷计划，向中小企业和大公司提供低息信贷，支持出口。2020 年 6 月到期的企业向商会和商品交易所缴纳的会员费推迟到 2020 年 10 月。中小企业发展组织(KOSGEB) 向企业提供最高 600 万土耳其里拉的资金支持，并将其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从 30 万土耳其里拉提高到 300 万土耳其里拉。所有企业在停业期间将免征环境卫生税和广告税。将民办学校收费的增值税税率由 8% 降至 1%。

哈萨克斯坦向因封锁措施而失去收入来源的公民提供 42,500 坚戈（约 103 美元）的一次性援助，扩大可从国家社会保险基金领取新的收入损失社会金的公民名单范围，简化其预约条件和提交的材料，并缩短办理时间。超过 460 万人在紧急状态下失去收入时得到了社会福利形式的经济援助。从预算中拨款 256 亿坚戈向 110 万社会弱势群体公民账户转账，供其购买食品和家庭用品。向多子女家庭提供补贴约 1,916 亿坚戈，惠及 38.68 万户。从 2020 年 4 月 1 日到 7 月 1 日，医疗机构为公民提供全面服务，无论其是否参加了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作为“2020—2021 年就业路线图”的一部分，雇用 15 万人实施了 6,107 个基础设施项目，用于修缮和建设社会设施、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灌溉系统、住房和社区服务，以及美化居住区。在“发展劳动技能和刺激就业”项目的框架内，对来自全国各地就业中心的 1,500 名雇员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培训，根据雇主的要求发放教育补助金。把对国家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公司登记在册，向这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避免解雇工人和削减工资。增加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担保。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 70 多万家公司和个人企业家免除 3 个月的任何类型的税收，帮助其节省约 1 万亿坚戈。延迟偿还贷款，降低和统一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160 多万市民和 1.15 万家中小企业获得了总额超过 3,600 亿坚戈的贷款和借款延期还款。取消受影响最大的经济部门所雇用的中小企业的工资单中的税款和其他款项的计算和支付，为期 6 个月。

尽管各国为应对疫情出台了企业、家庭及就业支持政策，但这些政策对国内不同群体包括收入在内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分析越南等国的政策效果后发现：第一，在实施包括工作保留计划在内的收入支助措施之后，青年人劳动收入减少的幅度比总人口大得多，在越南，这一差距高达 18 个百分点；第二，与雇员相比，自由职业者面对疫情的脆弱性更大，在考虑政府支助计划之后，越

南的自由职业者和雇员的劳动收入下降差距为5个百分点；第三，女性在支助后仍然发生的损失通常比男性更大；第四，从事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工作的人员在支助后劳动收入方面的损失最大，高技能职业人员（经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到的影响比其他人员小；第五，由于疫情造成的工作岗位流失在类型上的不均衡，疫情之中及疫后复苏阶段，收入不平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主要是因为在疫情中，劳动收入分配的低端出现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流失，而高薪工作岗位却基本保持不变，复苏阶段，在劳动收入分布的上端就业复苏势头较强，而对低薪工作的需求则继续疲软。¹

1.3 物价与货币政策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亚洲多数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出现下行，部分经济体甚

至陷入通货紧缩。但部分经济体在货币贬值、食品价格上升的推动下，通货膨胀率出现大幅上升，如黎巴嫩的通货膨胀率在2020年底超过130%。在经济大幅衰退的压力之下，多数亚洲经济体继续实施宽松性货币政策，部分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利率降至历史低位。

1.3.1 通货膨胀形势有所缓和

2020年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率总体呈下行趋势。分区域来看，东亚和南亚地区通货膨胀率在2020年不断走低，中亚地区通货膨胀率则呈快速上升而后下降然后再上升态势，西亚地区通货膨胀率在2020年上半年快速下降，但在2020年下半年又快速回升。总体来看，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地区部分经济体仍保持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东亚地区各经济体通货膨胀率总体处于低位，通货膨胀压力较小（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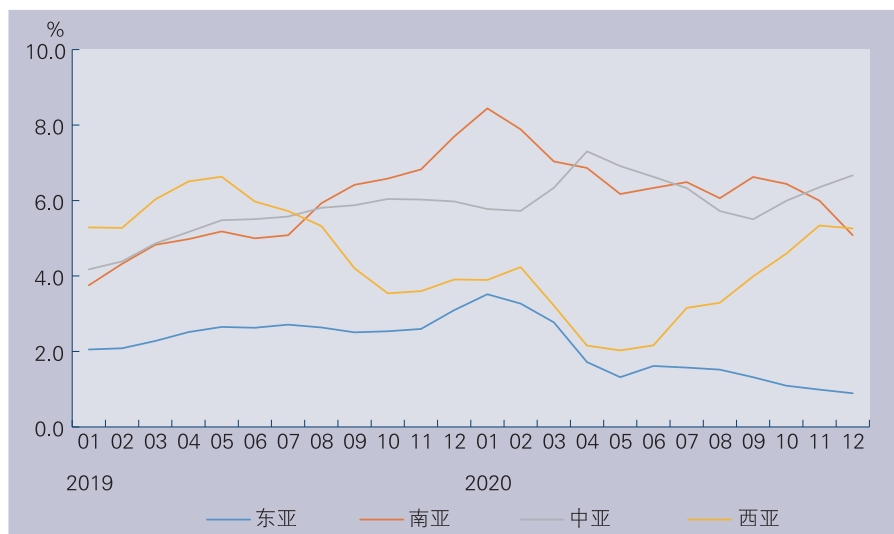


图 1.3 2019—2020 年亚洲不同地区通货膨胀率

注：东亚未包括柬埔寨、朝鲜、东帝汶；南亚未包括阿富汗、不丹、马尔代夫；中亚未包括土库曼斯坦；西亚未包括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

资料来源：CEIC，2021年2月。

部分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率在2020年出现上涨。由于货币贬值造成输入性通货

胀压力增大，黎巴嫩和伊朗两国通货膨胀率在2020年出现大幅上涨。2020年10月，

1.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Seventh edition. 25 January 2021. pp.15-17.

黎巴嫩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136.8%，而 2019 年 12 月该国通货膨胀率只有 7%。2020 年上半年，伊朗通货膨胀率在 2019 年的高位基础上有所下降，到 2020 年 4 月下降至 19.8%，但随后不断回升，到 2020 年 11 月重新升至 46.4%，12 月仍有 44.8%。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吉尔吉斯斯坦延续了 2019 年通货膨胀率不断走高的趋势，2020 年 12 月达到 9.7%，相比 2019 年同期上升 6.6 个百分点。哈萨克斯坦的情形与吉尔吉斯斯坦类似，2020 年 12 月通货膨胀率升至 7.5%，相比 2019 年 12 月上升 2.1 个百分点。2020 年前 10 月，土耳其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12% 左右，但 11 月和 12 月分别上升至 14% 以上，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部分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虽然不大，但通货膨胀率在 2020 年出现一定的上升趋势，需要引起注意。进入 2020 年，沙特阿拉伯通货膨胀率由负转正，并不断回升，2020 年 8 月上升至 6.2%，此后有所回落，但 12 月依然有 5.3%。菲律宾通货膨胀率在 2020 年下半年也有所回升，2020 年 12 月达到 3.5%。

部分经济体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2020 年大部分月份印度通货膨胀率均超过印度央行设定的 6% 通货膨胀目标上限，特别是 2020 年 10 月印度通货膨胀率达到 7.6%，创下 6 年来的最高水平，不过，2020 年 12 月降至 4.6%，通货膨胀压力稍微降低。巴基斯坦通货膨胀率虽然从 2020 年 1 月的 14.6% 下降到 12 月的 8%，但是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斯里兰卡情形与巴基斯坦类似，虽然 2020 年通货膨胀率总体走低，但 2020 年 12 月依然在 4.6%。

多数经济体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中国通货膨胀率在 2020 年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在 1 月达到相对高点（5.4%）之后便逐步下降，2020 年 11 月消费物价指数甚至同比下降 0.5%，创下近 11 年来的新低，2020 年 12 月

重新升至 0.2%，全年通货膨胀率为 2.5%，相比 2019 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如果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仅为 0.8%，相比 2019 年回落 0.8 个百分点。越南通货膨胀率走势与中国情况类似，从 2020 年 1 月的 6.4% 下降至 2020 年 12 月的 0.2%。从 2020 年 4 月开始，印度尼西亚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到 2020 年 8 月下降至 1.3%，不过此后有所回升，2020 年 12 月为 1.7%，总体仍处于低位。2020 年，韩国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低位，2020 年 5 月，其消费物价指数甚至同比下降 0.3%，此后价格指数虽有所回升，但 2020 年 12 月同比增长也仅为 0.5%。

部分亚洲经济体则陷入通货紧缩。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在 2019 年底和 2020 年曾有短暂回升，但此后逐步回落，2020 年 10 月日本再次陷入通货紧缩状态，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0.4%，2020 年 12 月进一步扩大至 -1.2%，创下 2010 年 5 月以来新低，而其核心通货膨胀率从 2020 年 4 月开始一直保持在零或负值。东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及西亚的巴林、以色列、阿曼、巴勒斯坦等经济体也从 2019 年底或 2020 年初陷入通货紧缩。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等继续维持通货紧缩状态，2020 年有所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从两方面对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疫情以及相应采取的防控措施造成经济活动减弱，企业和家庭收入下降，与此同时，疫情大流行也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造成消费和投资低迷，这些都会在短期内给总需求带来极大冲击，从而推动价格走低。疫情也造成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跌。IMF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2020 年 4 月，该指数同比下跌 32%，而 3 月和 5 月同比下跌也分别达到 21.8% 和 24.2%，此后有所好转，但直到 2020 年 11 月，该指数同比仍下跌 1.6%。¹ 这些成为拉动亚洲经济体价格指数走低的重要因素。另一

1. UNCTAD. Commodity Price Bulletin – November 2020, UNCTAD/GDS/DSI/CPB/2021/1, 22 Jan 2021.

方面，疫情引发的边境封锁和社会隔离影响某些商品的供给，从而造成部分商品价格出现上涨，特别是在医疗用品和食品方面。例如，在疫情暴发的早期阶段，医用口罩的价格上涨了200%。¹食品价格也出现类似情形。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粮食产量出现明显下滑，国际运输受阻，食品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6月起，全球食品价格不断上涨，2020年10月至12月，食品价格同比增长均超过6%。由于食品在消费品篮子中的权重较大，食品价格上涨对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影响更大。如2020年10月，印度食品价格同比上涨超过11%，为9个月以来最高，造成印度通货膨胀率在当月达到7.6%的高点。此外，疫情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体货币贬值，造成部分经济体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例如，尽管国内需求疲弱，但本国货币兑美元汇率的大幅下跌，使得土耳其通货膨胀率依然处于高位。受疫情、经济危机以及2020年8月首都爆炸等多重事件影响，黎巴嫩里拉兑美元出现大幅贬值，由于该国对食品、燃料和医疗用品等必需品严重依赖进口，本国货币的急剧贬值导致其消费价格大幅上涨。²

2021年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率预计会有所上升，个别经济体通货膨胀风险增大。虽然疫情将继续对亚洲经济体经济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亚洲经济体经济增速在2021年大概率将会有所反弹，投资和消费需求不断恢复，这将会带动物价的上涨。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因素也可能在未来加剧亚洲和全球的通货膨胀压力。一是疫情造成各经济体公共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可能加剧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二是在疫情冲击下，各经济体纷纷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

性充裕，可能在未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1.3.2 货币政策总体大幅宽松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多数亚洲经济体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共有30个亚洲经济体总计实施了80次降息（见表1.1）。2020年1月，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土耳其、马来西亚等经济体开始实施降息行动。2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暴发，更多亚洲经济体加入降息行列。受疫情突发影响，中国央行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2020年2月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降至4.05%。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也在2020年2月启动降息进程。

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全球大流行特征，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巨大冲击，世界各国央行纷纷降息加以应对。特别是3月3日和3月15日，美联储两次实施紧急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0.25%，并在随后实施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受此影响，亚洲经济体也出现密集降息潮。2020年3月16日，韩国央行宣布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将基准利率降低50个基点至0.75%，这是该国央行首次将基准利率降至1%以下。3月17日，在2020年1月、2月降息的基础上，土耳其央行再次降息100个基点。3月27日，印度央行紧急降息75个基点至4.4%，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据统计，2020年3月，至少21个亚洲经济体央行实施了降息。巴林、约旦、科威特、老挝、卡塔尔等国央行则在3月实施了2020年唯一的一次降息行动。

疫情的快速蔓延推动亚洲多个经济体在2020年第二季度继续降息。2020年4月20日，中国央行进一步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至3.85%。4月22日和5月21

1. Ehsan Ebrahimi, Deniz Igan, and Soledad Martinez Peria.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Inflation: Potential Drivers and Dynamics, IMF Special Notes Series on COVID-19, September 10, 2020.

2. UN. Diverging Inflation Rates Suggest New Risk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Monthly Briefing, No. 139, July 2020.

日，土耳其央行分别降息 100 个基点和 50 个基点；5 月 22 日，印度央行再次下调利率至 4%，达到历史最低点；5 月 28 日，韩国央行再次降息 25 个基点至 0.5%，为该国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央行在第二季度都至少实施了两次降息行动。从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始，部分是因为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部分是因为基准利率已经降至低位，亚洲各经济体降息的幅度和频率都有所放缓。进入 2020 年第四季度，只有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蒙古国、菲律宾四国央行实施了降息行动。

除了降息外，大部分经济体还采取了其他的宽松货币政策。为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中国央行在 2020 年 1 月设立 3,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的基础上，2 月又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 5,000 亿元，4 月再次增加中小银行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1 万亿元。此外，中国央行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全面或定向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2020 年，日本央行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0.1% 不变，但在疫情发生后，其也增加了对于日本政府债券的购买规模和频率，并在 4 月 27 日决定不设上限购买日本国债。印度央行也加大了疫情期间的

流动性注入力度。2020 年 4 月，印度央行实施了总额 5,000 亿卢比的长期回购操作 (LTROs)，2020 年 10 月，印度央行再次决定，实施为期 3 年、总额为 1 万亿卢比的定向长期回购操作 (TLTROs)。韩国央行也通过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参与者范围、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合格抵押品范围、购买韩国政府债券等，以此来改善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状况。

但也有少数经济体央行在 2020 年实施了加息行动，其中部分来自应对通货膨胀压力，部分是出于抑制货币贬值的需要。吉尔吉斯斯坦是唯一一个在 2020 年只进行加息的经济体。2020 年 2 月，在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情况下，吉尔吉斯斯坦央行将政策利率从 4.25% 提高到 5%。2020 年 3 月，为缓解哈萨克斯坦坚戈由于石油价格下跌所带来的贬值压力，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哈萨克斯坦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 275 个基点至 12%。不过，在疫情冲击之下，2020 年 4 月，该国央行即扭转了货币政策方向。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压力之下，土耳其央行在 2020 年 9 月、11 月、12 月分三次累积加息 875 个基点，这使得该国货币政策利率甚至高于疫情暴发之前。出于与土耳其类似的原因，亚美尼亚也在 2020 年 12 月将政策利率上调 100 个基点至 5.2%。

表 1.1 2020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基准利率调整一览表

单位：基点，%

经济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利率
亚美尼亚			-25		-25	-50			-25			100	5.25
阿塞拜疆	-25					-25	-25		-25			-25	6.25
巴林			-125										1.00
孟加拉国			-25	-50			-50						4.75
中国		-10		-20									3.85
格鲁吉亚				-50		-25		-25					8.00

续表

经济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利率
印度			-75		-40								4.00
印度尼西亚		-25	-25			-25	-25				-25		3.75
以色列				-15									0.10
约旦			-150										3.50
哈萨克斯坦			275	-250			-50						9.00
韩国			-50		-25								0.50
科威特			-125										1.50
吉尔吉斯斯坦		75											5.00
老挝			-100										3.00
马来西亚	-25		-25		-50		-25						1.75
蒙古国			-100	-100					-100		-200		6.00
缅甸			-50	-100	-150								7.00
尼泊尔					-100								5.00
阿曼	-13	-165											0.50
巴基斯坦			-225	-200	-100	-100							7.00
菲律宾		-25	-50	-50		-50					-25		2.50
卡塔尔			-175										2.50
沙特阿拉伯			-125										1.00
斯里兰卡	-50		-25	-25	-50		-100						4.50
塔吉克斯坦					-100			-100					10.75
泰国		-25	-25		-25								0.50
土耳其	-75	-50	-100	-100	-50				200		475	200	17.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75										1.25
乌兹别克斯坦				-100					-100				14.00
越南			-50		-50					-50			2.50

资料来源：CEIC，各国央行，2021年1月。

2021 年亚洲多数经济体货币政策预计仍将保持宽松立场。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亚洲各经济体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较大的压力，各经济体仍有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部分存在政策空间的经济体可能会进一步降息。但是，各经济体在货币宽松的过程中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压力将抑制部分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二是部分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已经处于低位，这也将进一步压缩其降息空间。

1.4 贸易和投资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出现大幅下降。亚洲地区也未能幸免，但总体情况仍要好于世界其他地区，部分经济体贸易和投资甚至出现逆势增长。在疫情大

流行的背景下，亚洲仍在快速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一系列重要多双边经贸合作安排的达成，有力地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亚洲力量。

1.4.1 对外贸易大幅萎缩

亚洲货物贸易出现萎缩，但占世界货物贸易的比例却有所上升。据 WTO 统计，2020 年，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继续延续 2019 年的萎缩态势。2020 年前三季度，亚洲货物贸易总额为 9.16 万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7.0%，占到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 36.3%，相比 2019 年同期上升 1.5 个百分点。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 4.77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4.9%，货物进口总额为 4.39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9.1%（见图 1.4）。



图 1.4 2019 年第一季度—2020 年第三季度亚洲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TO，2021 年 1 月。

尽管总体贸易低迷不振，但仍有少数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逆势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65 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相比 2019 年增长 1.5%，

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其中，货物出口额达到 2.59 万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增长 3.6%；货物进口额为 2.06 万亿美元，相比 2019 年下降 1.1%。越南货物

进出口也表现亮眼。据越南海关统计,2020年,越南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453.6亿美元,相比2019年增长5.4%。其中,出口额2,826.5亿美元,增长7%;进口额2,627亿美元,增长3.7%。越南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亚洲市场的拉动,2020年其对亚洲市场出口占到其总出口的49.6%,增长3.4%,自亚洲市场进口额占到其总进口额的80.8%,增长4.7%。

不过,大部分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2020年,土耳其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888.8亿美元,相比2019年下降0.6%,这主要来自出口下降的拉动,2020年除4月、5月和7月外,土耳其货物进口都保持同比增长,全年进口同比增长4.3%。2020年韩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相比2019年下降6.3%。其中,货物出口额5,128.5亿美元,连续四年保持在5,000亿美元以上,同比下降5.4%,下降幅度较2019年有所收窄;货物进口额为4,672.3亿美元,同比下降7.2%。泰国在202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下降至4,384.6亿美元,相比2019年下降9.1%,其中出口额同比下降6%,进口额同比下降12.4%。2020年,印度尼西亚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048.8亿美元,相比2019年下降9.9%,其中出口额下降2.6%,进口额下降17.1%。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统计,受汽车等产品海外需求大幅下降影响,2020年日本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27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0.7%,其中出口额同比减少9.3%,进口额同比下降12.2%。

一些经济体货物贸易出现更大幅度下降。据印度商工部(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公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为6,483.8亿美元,相比2019年大幅下降20%,其中出口额下降14.8%,进口额下降23.5%。而黎巴嫩、伊朗等国贸易萎缩幅度更大。据WTO统计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黎巴嫩货物进出口总额相比2019年下降43.9%,其中,受国内经济萎缩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其进口额同比萎缩49.6%。2020年伊朗货物贸易萎缩幅

度较2019年有所下降,但2020年前三季度相比2019年同期仍下降了29%,其中出口额同比萎缩达到41.9%。2020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同比萎缩超过20%的经济体还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菲律宾等。

新冠肺炎疫情从多个方面给亚洲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带来冲击。一是疫情造成各经济体经济增长低迷,同时加剧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和企业家信心遭受沉重打击,国内外需求萎缩造成进出口贸易陷入衰退。二是疫情及防控措施对人员、物资、资金等流动造成阻碍,部分行业国际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受到影响。作为世界三大生产和贸易枢纽之一,亚洲区域生产网络的中断也会延伸到全球贸易和生产分工的其他链条和环节。三是疫情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经济体在疫情期间纷纷推出贸易保护措施,进一步恶化国际贸易环境。

未来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恢复仍要依疫情发展的情况而定。疫情在2020年第二季度对亚洲经济体对外贸易造成严重冲击,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萎缩10.1%和16.8%,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步放松,从第三季度开始,各经济体经济活动有所好转,对外贸易也出现一定的好转,特别是出口同比增速甚至恢复至正增长。分经济体来看,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之后,中国的货物出口在2020年6月份后恢复正增长,货物进口在2020年9月份也开始恢复正增长。与中国情况类似,越南出口自2020年7月份起、进口自2020年8月份起分别恢复同比正增长。韩国出口在2020年第三季度后也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2020年下半年出口额同比增长0.4%。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经济体出口在2020年第三季度也恢复正增长。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土耳其等经济体出口在2020年第三季度虽然仍保持负增长,但相比第二季度已有好转。

亚洲服务贸易也出现大幅衰退。据WTO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已出现同比萎缩态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冲击下，2020 年第二季度，亚洲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同比萎缩分别达到 29% 和 30%，与货物贸易不同的是，2020 年第三季度，亚洲服

务贸易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好转迹象，出口额和进口额同比萎缩均在 26%（见图 1.5）。这表明疫情对服务贸易的冲击要大于货物贸易。



图 1.5 2019 年第三季度—2020 年第三季度亚洲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TO，2021 年 1 月。

分经济体来看，据 UNCTAD 的估计，2020 年前三季度，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萎缩幅度均在 10% 以上。2020 年前三季度，印度服务贸易总额 2,585.6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11.9%，其中出口同比下降 6.8%，进口同比下降 18%。同期，中国和日本的服务贸易总额分别萎缩了 17.4% 和 16.1%，其中中国的服务贸易萎缩主要来自进口下降，而日本的服务贸易萎缩主要来自出口的下降。韩国、菲律宾等国的服务贸易萎缩幅度均超过 20%，而越南、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的萎缩幅度则超过 30%。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服务贸易总额相比 2019 年前三季度分别下降 40.4% 和 43.2%，特别是在出口方面，两国萎缩幅度均超过 50%。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约旦、老挝等国服务贸易在 2020 年前三季度均下降超过 50%。

尽管总体经历了负增长，但部分亚洲经济

体的服务贸易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出现好转迹象。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速在 2020 年前三季度呈现逐季好转趋势，2020 年第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长 1%，成为亚洲经济体中少有的出口恢复正增长的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等国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速也均有所恢复。但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出口增速则进一步下降。在服务贸易进口方面，卡塔尔服务贸易出口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恢复同比增长，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印度、土耳其、越南等国家也有所恢复。但日本、沙特阿拉伯等国进口贸易增速则出现进一步下降。

多数经济体经常项目差额有所改善。2020 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 1,687.1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同期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有所扩大，服务

贸易逆差有所缩小。由于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收窄,进入2020年,印度经常账户余额由逆差转为顺差,2020年前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为353.5亿美元。2020年前三季度,韩国经常账户顺差为433.1亿美元,相比2019年同期增长3.5%。进入2020年,印度尼西亚经常账户逆差逐步收窄,并在2020年第三季度实现顺差9.6亿美元,这使其2020年前三季度经常账户逆差缩小为56.7亿美元。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的经常项目余额也有所好转。不过,部分经济体的经常项目差额有所恶化。从2019年底开始,土耳其经常项目出现逆差,2020年进一步扩大,前三季度经常项目逆差已经升至308.5亿美元。沙特阿拉伯在2020年前三季度也出现经常项目逆差。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亚洲仍在快速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2020年11月15日,包含亚洲13个经济体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RCEP,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诞生。一旦RCEP生效,协定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这必将极大促进全球

特别是亚太地区经贸发展。2020年8月1日,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越南成为亚洲第一个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贸协定最终将取消对双方99%贸易商品的关税。除此之外,中国香港与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等也于2020年生效,一系列的自贸协定谈判仍在快速推进,这有力地维护了亚洲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

1.4.2 外商直接投资小幅下降

流入亚洲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小幅下降。据UNCTAD统计,2019年流入亚洲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为5,176.9亿美元,相比2018年下降4.0%,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33.6%,相比2018年下降2.4个百分点(见图1.6)。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亚洲地区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继续萎缩。2021年1月,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中预计,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将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到8,590亿美元,同比下降42%,这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投资低谷还要低30%以上。其中,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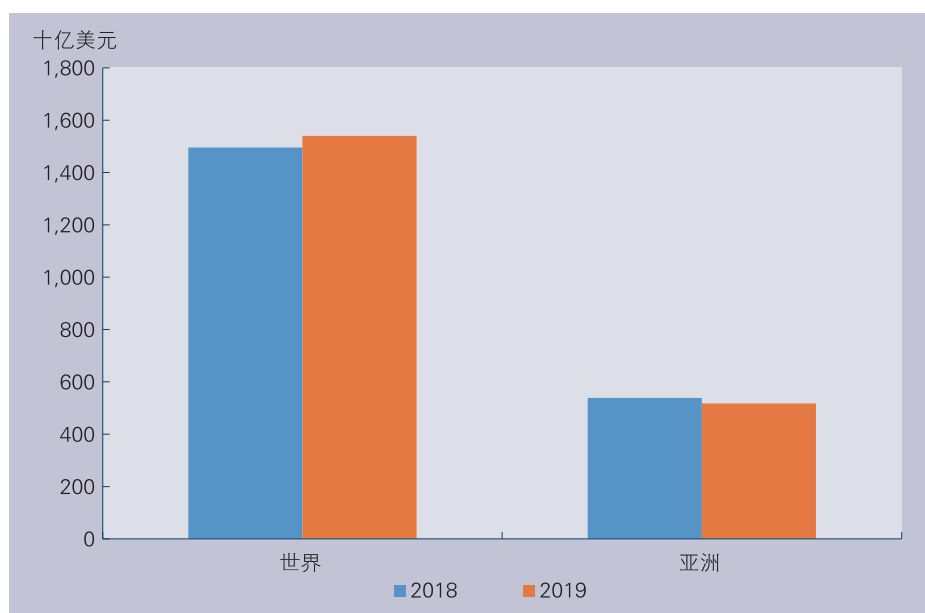


图 1.6 2018—2019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

资料来源: UNCTAD, 2021 年 1 月。

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从 2019 年的 4,950 亿美元下降至 2020 年的 4,760 亿美元，下降 4%，是 UNCTAD 所有统计地区中下降幅度最小的。¹

分经济体来看，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但仍有部分亚洲经济体吸引外资实现逆势增长。据 UNCTAD 估计，2020 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1,630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增长 4%，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以及政府实施的投资促进政策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因素。2020 年，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570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上升 13%，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并购成为推动印度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流入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从 2019 年的 150 亿美元增长到 170 亿美元，以色列也从 180 亿美元增长到 260 亿美元。流入菲律宾的外商直接投资在 2020 年达到 64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增长 29%。2020 年，流入沙特阿拉伯的外商直接投资预

计在 47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增长 4%。

但部分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2020 年，东盟国家整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 2019 年下降 31%，其中，新加坡吸引的外资为 580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下降 37%，印度尼西亚下降 24% 至 180 亿美元，越南下降 10% 至 140 亿美元，马来西亚下降 68% 至 25 亿美元。土耳其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相比 2019 年下降 19%，至 68 亿美元。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韩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 207.5 亿美元，同比减少 11.1%，实际使用外资 110.9 亿美元，同比减少 17%。自 2018 年起，流入韩国的外资额已经连续两年下降。

亚洲经济体仍是全球重要外资来源地。据 UNCTAD 统计，2019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1.31 万亿美元，相比 2018 年上升 33.2%。其中，亚洲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 5,628.1 亿美元，相比 2018 年上升 1.0%，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 42.8%，相比 2018 年下降 13.6 个百分点（见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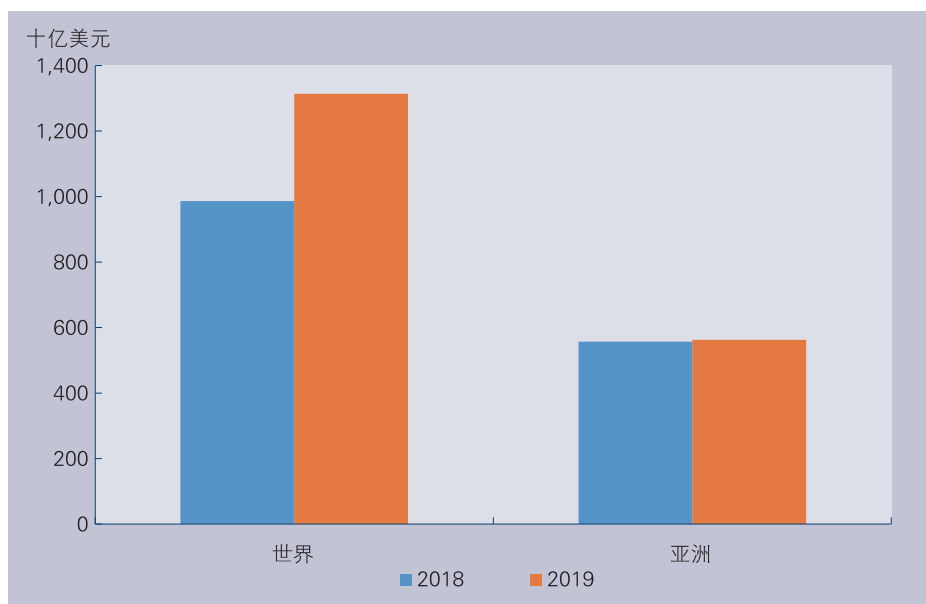


图 1.7 2018—2019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

资料来源：UNCTAD，2021 年 1 月。

1. 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No. 38. 24 January 2021.

分经济体来看,2019年日本仍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2,266.5亿美元,相比2018年增长58.3%。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对外直接投资也都有所增长。但中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等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不同程度下降。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但在疫情冲击下,预计多数亚洲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出现下降。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948.1亿美元,相比2019年同期出现大幅下降。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2020年,亚洲经济体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其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基础,促进中国实现更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疫情发生后,2月18日,中国商务部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积极支持外资企业应对疫情影响,稳定外资企业信心。8月12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宣布15条保护外贸主体和保持供应链稳定的政策。2020年6月,中国政府分别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进一步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范围。印度也进一步放宽了部分行业的外资限制。2020年3月和9月,印度政府将外资在自动审批(automatic route)下对航空和国防部门的投资限制分别提高到100%和74%。2020年6月,越南国会通过新修订的投资法(Law on Investment),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多个商业领域。

亚洲经济体持续加强国际投资合作。截

至2020年,亚洲经济体实施中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包含投资条款的协定共有1,950项,其中双边投资协定1,509项。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亚洲经济体仍达成一些重要的国际投资协定。除了上文提到的RCEP外,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将进一步深化中欧经贸联系,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除此之外,2020年亚洲经济体新签署的与投资有关的协定还包括日本—摩洛哥双边投资协定、印度—巴西双边投资协定、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双边投资协定、日本—英国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A)、新加坡—英国自由贸易协定、越南—英国自由贸易协定、土耳其—英国自由贸易协定等。

1.5 金融市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使亚洲地区股市出现剧烈波动,但得益于各经济体的刺激政策和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绝大多数股票市场出现上涨行情,且部分经济体的股票指数涨幅较大。亚洲地区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升多贬少,但个别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幅度较大。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部分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涨多跌少,且个别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涨幅较大。亚洲多数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但银行系统运行整体较为稳健。

1.5.1 股票指数剧烈波动

2020年,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股市出现剧烈波动,但得益于亚洲地区各经济体出台的刺激政策和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股票市场出现上涨行情,且部分经济体的股票市场指数涨幅较大。据CEIC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的统计数据,亚洲地区有18个经济体的股票指数出现上涨,有16个经济体的股票指数出现下跌。其中,涨幅超过10%的有14个经济体,分别是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印度、日本、中国台湾、越南、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土耳其、韩国、叙利亚、

尼泊尔和伊朗；跌幅超过 10% 的有 5 个经济体，分别是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科威特和以色列。具体来看，伊朗的 TEDPIX 指数上涨幅度最大，约为 270.8%（见图 1.8）；尼泊尔的 NEPSE 指数涨幅次之，约为 79.0%；叙利亚大马士革证券交易所的加权指数涨幅第三，为 38.5%。相

比较而言，老挝的综合指数下跌幅度最大，约为 17.8%；柬埔寨的综合指数跌幅次之，约为 14.9%；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的跌幅约为 11.8%。此外，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30.8%，中国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7.2%，日本日经 225 指数上涨 16.0%，印度 SENSEX 指数上涨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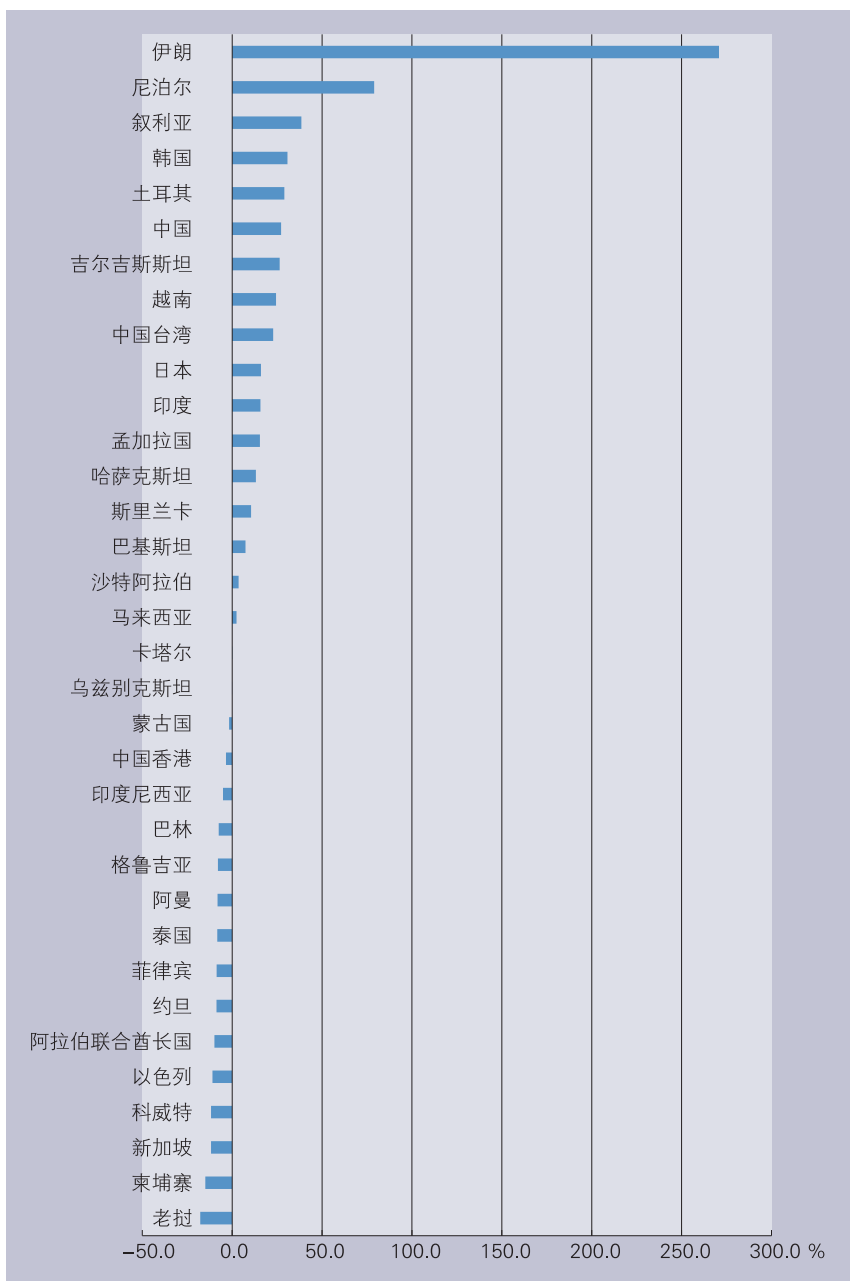


图 1.8 2020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股票指数涨跌幅

注：股票指数涨跌幅 = (2020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 2019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 100% / 2019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中国数据是沪深 300 指数。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Wind 数据库，2021 年 1 月。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与快速蔓延，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经历剧烈震动。美国股票市场自1987年引入熔断机制以来股指共发生五次熔断，仅在2020年3月就触发了四次熔断。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也曾经历猛烈下挫，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土耳其等国相继出台禁止卖空或暂时闭市等措施，以遏制股指快速暴跌的势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亚洲各经济体相继出台特殊举措，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冲力度，这对稳定经济运行、降低资本市场波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坚持底线思维和底线管理，在2020年4月将任务目标从之前的“六稳”转向“六保”，也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在经济遭受巨大不确定性冲击的条件下，出台超常规宏观政策加以支持和刺激，同时，在股票市场稳步推进注册制、常态化退市机制等基础制度改革，股票指数全年涨幅较大。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日经225指数在2020年第一季度大幅下挫，后在4月开启反

弹行情，截至2020年12月初已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新高，这主要得益于日本政府推行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冠肺炎疫苗即将开始使用、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5.2 多数亚洲经济体货币相对美元升值

亚洲地区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升多贬少，但个别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幅度较大。以本币兑美元汇率（直接标价法）来看，据CEIC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20年亚洲地区有15个经济体的货币升值，14个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另有9个经济体的货币因盯住美元而无变化（见图1.9）。在货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缅甸元兑美元的升幅最大，约为10.2%；以色列新谢克尔兑美元的升幅次之，约为7.0%；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幅第三，约为6.3%。与之相反，部分经济体货币出现贬值。土耳其里拉兑美元的贬值幅度最大，约为23.6%；吉尔吉斯斯坦索姆兑美元贬值幅度次之，约为18.7%；塔吉克斯坦索莫尼兑美元贬值幅度第三，约为16.6%。此外，日元兑美元升值约5.0%，韩元兑美元升值约6.0%，印度卢比兑美元则贬值约2.3%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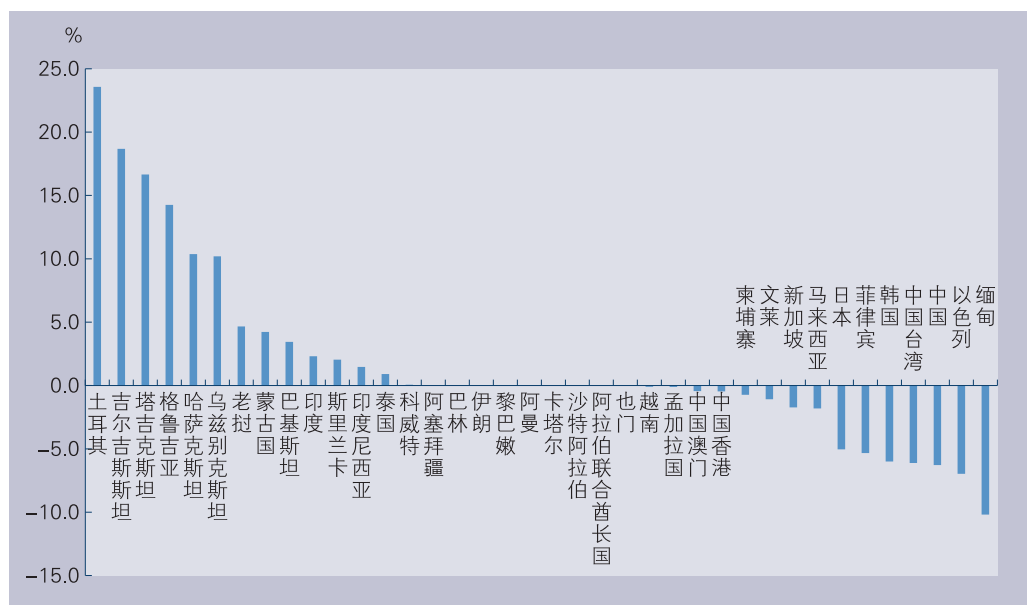


图 1.9 2020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本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直接标价法）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2021 年 1 月。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 2020 年呈现出先抑后扬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与美国的冲击存在时间差,中国及时采取强有力应对措施有效遏制住疫情蔓延,美国却深陷疫情难以自拔,中国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中美无风险利率差距扩大,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推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二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央行采取史上最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三是持续加剧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 GDP 增速创纪录下滑,无风险利率也现下行,美国与其他重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和无风险利差明显收窄,导致美元指数自 3 月下旬以来总体贬值。四是中国金融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全球主要金融指数将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产品纳入其中,外国投资者也主动或被动地加大了对中国金融资产的配置。土耳其是少有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加息的国家之一,主要目的是减缓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压力,但效果不彰。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土耳其对外介入叙利亚冲突以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冲突等,对内则面临经济严重萎缩、失业率攀升、物价上涨等问题,最终导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大幅贬值。

1.5.3 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下滑

亚洲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据 Wind 数据库和英为财经的月度统计数据,亚洲地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上涨的经济体仅有 4 个(见表 1.2),分别是土耳其、韩国、日本和中国;出现下跌的经济体有

15 个,分别是以色列、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卡塔尔、新加坡、越南、中国香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约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月度均值来看,收益率超过 5% 的经济体有 7 个,低于 5% 的有 12 个。其中,土耳其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高,基本处于 10.0% 至 14.1% 之间;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低,基本围绕零值微波动。此外,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 2.5% 至 3.3% 之间,韩国处于 1.3% 至 1.7% 之间,印度处于 5.8% 至 6.6% 之间。

一般而言,通货膨胀预期越高,国债收益率的曲线就越陡峭,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国债收益率以弥补未来通胀率升高带来的损失。土耳其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高与地缘政治风险攀升及其国内通货膨胀预期高企有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开始从 2020 年 4 月时的最低点 2.5% 逐步回升,截至 12 月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印度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相对较高。一方面,印度在 2019 年推行的“100 万亿卢比基建计划”需要政府发债支持,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令公共支出超预期增加,印度政府进一步增加发债使公共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在 2020 年 6 月相继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投资级的最低等级,且前景展望全部为负面。这些都是导致印度国债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原因。

表 1.2 2020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情况

单位: %, 百分点

经济体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变动	经济体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变动
土耳其	12.5	12.0	0.51	新加坡	0.8	1.7	-0.90
韩国	1.7	1.7	0.05	越南	2.5	3.4	-0.93
日本	0.0	0.0	0.04	中国香港	0.8	1.8	-1.04

续表

经济体	2020年12月	2019年12月	变动	经济体	2020年12月	2019年12月	变动
中国	3.2	3.2	0.03	巴基斯坦	9.9	11.0	-1.07
以色列	0.8	0.8	-0.08	印度尼西亚	5.9	7.0	-1.11
泰国	1.2	1.5	-0.33	菲律宾	3.0	4.4	-1.43
中国台湾	0.3	0.7	-0.36	约旦	4.7	6.2	-1.55
马来西亚	2.7	3.3	-0.64	斯里兰卡	8.0	10.1	-2.10
印度	5.9	6.6	-0.66	孟加拉国	5.8	9.4	-3.63
卡塔尔	1.7	2.6	-0.90				

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情况=2020年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2019年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部分亚洲经济体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英为财经（Investing.com）数据库，2021年1月。

1.5.4 个别经济体房地产市场涨幅较大

亚洲部分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涨多跌少，且个别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涨幅较大。在CEIC数据库有季度统计数据的15个亚洲地区经济体中，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有9个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同比上涨，包括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中国、中国台湾、韩国、以色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有6个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同比下跌，包括日本、菲律宾、蒙古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文莱。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较大。其中，土耳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最大，约为26.5%；哈萨克斯坦的房价涨幅次之，约为9.5%；中国的房价涨幅第三，约为6.6%。与之相反，也有部分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下跌。其中，文莱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跌幅最大，约为7.7%；中国香港的房价跌幅次之，约为1.1%；马来西亚的房价跌幅第三，约为0.9%。

土耳其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据莱坊房地产经纪公司发布的全球房价指数报告，土耳其房地产价格在2020年上涨27.3%，位居世界第一。导致土耳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土耳其政府采取包括在5月下调贷款利率在内的宽松政策，持续激发市场购房热情。二是

建筑成本上升。据土耳其统计局发布的建筑成本指数报告，2015年后的土耳其建筑成本指数始终维持稳定上升趋势，近一年来工程造价指数增幅达22.99%，建筑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是导致建筑成本上涨的主因，这必然会推升房地产价格。三是城市化进程更加凸显土地资源稀缺性，致使土地成本上升。四是人口结构更加年轻化，潜在住房需求很大。在“房住不炒”房地产政策作为主基调的条件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上半年回暖、下半年下行以及年末翘尾后，全年实现量价齐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4.14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7.0%。其中，住宅投资10.44万亿元，同比增长7.6%。商品房销售面积17.6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6%；销售均价约为9,860元/㎡，同比增长5.9%，上涨幅度相较于2019年略有收窄。展望2021年，在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三道红线”政策迫使房企财务降杠杆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房价企稳或是大概率事件。

1.5.5 多数经济体银行部门不良率上升

亚洲多数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上升。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相较于2018年，

2019 年有 18 个经济体的银行不良贷款率 (Non-performing Loan, NPL) 出现上升, 有 7 个经济体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 (见表 1.3)。具体来看, 黎巴嫩、不丹和土耳其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升幅位居前三, 分别为 4.9 个百分点、1.4 个百分点和 1.3 个百分点, 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升幅较小, 分别为 0.05 个百分点、0.02 个百分点和 0.02 个百分点。与之相反, 格鲁吉亚、文莱和孟加拉国的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幅较大, 分别为 0.8 个百分点、0.8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 新加坡的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幅最小, 约为 0.003 个百分点。2019 年, 除了黎巴嫩外, 其他经济体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均低于 10% 的国际警戒线, 这说明亚洲地区经济体的银行体系运行较为稳健, 爆发系统性

违约风险的概率较小。

中国银行业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风险抵御能力增强。中国银保监会在 2021 年 1 月 22 日发布的信息显示, 截至 2020 年末, 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 3.5 万亿元, 较年初增加 2,816 亿元; 不良贷款率 1.92%, 较年初下降 0.06 个百分点; 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例 76%, 较年初下降 5.1 个百分点。导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是中国银保监会要求银行必须加强风险管控, 严防风险; 二是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 2020 年处置了 3.02 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三是 2020 年 2.3% 的经济增速超预期, 为银行防控不良贷款大幅反弹打下很好的基础。

表 1.3 2016—2019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的银行不良贷款率

单位: %

经济体	2016	2017	2018	2019
黎巴嫩	4.9	5.7	10.3	15.2
孟加拉国	8.9	8.9	9.9	8.9
印度	9.2	10.0	9.5	9.2
马尔代夫	10.6	10.5	8.9	9.4
阿富汗	11.1	12.2	8.9	—
巴基斯坦	10.1	8.4	8.0	8.6
哈萨克斯坦	6.7	9.3	7.4	—
吉尔吉斯斯坦	8.5	7.4	7.3	7.7
不丹	7.2	8.4	7.0	8.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1	5.3	5.6	6.5
约旦	5.5	5.3	5.4	—
亚美尼亚	6.7	5.4	4.8	5.5
文莱	4.7	3.7	4.7	3.9
土耳其	3.1	2.8	3.7	5.0

续表

经济体	2016	2017	2018	2019
斯里兰卡	2.6	2.5	3.4	4.7
泰国	3.0	3.1	3.1	3.1
格鲁吉亚	3.4	2.8	2.7	1.9
印度尼西亚	2.9	2.6	2.3	2.4
柬埔寨	2.1	2.1	2.0	1.6
沙特阿拉伯	1.4	1.6	2.0	1.9
中国	1.7	1.7	1.8	1.9
越南	2.3	1.8	1.8	—
菲律宾	1.7	1.6	1.7	2.0
科威特	2.2	1.9	1.6	—
尼泊尔	1.7	1.7	1.6	—
马来西亚	1.6	1.5	1.5	1.5
新加坡	1.2	1.4	1.3	1.3
乌兹别克斯坦	0.7	1.2	1.3	1.5
以色列	1.6	1.3	1.2	1.4
中国香港	0.9	0.7	0.5	0.6
韩国	0.5	0.4	—	—
中国澳门	0.2	0.2	0.2	0.2

注：不良贷款率=银行不良贷款×100%/贷款总额，也即为不良贷款额除以贷款组合总额（包括扣除专项贷款损失准备金之前的不良贷款）。表中经济体根据2018年数据排序。其中，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的数据缺失。“—”表示数据不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数据库，2021年1月。

第2章

亚洲经济热点议题

2.1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转型

1996年，有着“数字经济之父”之称的唐·塔普斯科特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概念，并用它来指代网络智能时代的经济。¹1997年，日本通产省将这一概念引入日本政府文件中，并使日本成为较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国家之一。同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详细叙述了美国的数字革命、互联网建设、电子商务、数字时代的消费者和劳动者以及未来挑战等内容。如今，人们对数字经济有了更全面和系统的认识。2020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²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包括将数据或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也包括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数字技术为手段的经济。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十分迅速。2019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41.5%。其中，2019年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4.3%，产业数字化成为驱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大大提速。经合组织(OECD)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数字转型的所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各国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刺激了宽带通信服务的需求。在OECD成员国，估计有13亿人居家工作和学习；在整个互联网价值链上，各参与方的互联网流量比疫情暴发前增加了多达60%。⁴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大大促进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且疫情对数字化转型的长期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国际数据公司(IDC)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65%的GDP将由数字化推动；2020—2023年，直接来源于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将达到15.5%的年复合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数字化转型的直接

1.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Th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96, p. 6.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7月3日。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2020年10月。

4. OECD, *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 2020*, OECD Publishing, November 27, 2020.

投资总规模将超过 6.8 万美元。¹IDC 还预测, 2020 年全球大数据相关硬件、软件、服务市场的整体收益为 1,878.4 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 3.1%。²2019—2024 年, 大数据技术和服务相关收入将以 15.6% 的五年复合增长率增长。³

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带动下, 亚洲成为数字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2019 年, 亚洲数字经济较上年增长 7.7%, 高于同期 GDP 增速 3.4 个百分点。目前, 中国数字经济总体水平已经稳居全球第二, 数字产业化保持高速增长, 产业数字化全面推进,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日益优化。⁴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数字经济在推进复工复产和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6.9%, 增速高于第三产业 14.8 个百分点; 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117,60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9%。⁵2020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近四成, 对 GDP 贡献率近七成。

在疫情背景下, 很多亚洲经济体都出台了推动数字经济转型的新举措, 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以及国际数字合作等多个方面。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5G 建设成为新亮点。2020 年 3 月,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推动 5G 加快发展的通知》, 全力推进 5G 网络建设、应用推广、技术发展和安全保障, 2020 年, 中国新增了 58 万个 5G 基站, 累计建成 5G 基站总数达 71.8 万个, 日本、韩国等也制定了扩大数字基建投资的计划。⁶在数字产业化发展方面, 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作用凸显, 大数

据产业和物联网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 人工智能发展也驶入快车道。例如, 2020 年 8 月,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 5 个部门发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10 月, 韩国政府发布《人工智能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等。在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数字农业、数字文化产业、“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旅游”等蓬勃发展。在数字化治理方面, 数字化公共安全联防联控、数字政务规范化管理、城市设施智能化升级、数字市场竞争等稳步推进。在国际数字合作方面, 一些涵盖数字经济合作的区域和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进展。2020 年 4 月,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部长特别会议, 就运用数字技术加快新冠病毒相关研究、增强商业活动灵活性和创造就业机会等达成共识; 6 月, 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签署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6 月, 韩国与新加坡宣布启动数字伙伴关系协定 (KSDPA); 8 月, 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签署数字经济协定; 11 月, 中国、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签署包括电信服务、电子商务等内容的 RCEP。

总之, 疫情让各国更加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价值, 并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后疫情时代, 数字经济将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之后影响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关键力量, 也将与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更加紧密相连。

2.2 债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公共财政带来严峻挑战, 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开启新一轮的宽松政策。经济活动减少致使产出萎缩, 财政

1. Shawn Fitzgerald, et al., IDC Future Scape: Worldwid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2021 Predictions, October 2020.

2. IDC, 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 August 2020.

3. Chandana Gopal, et al., 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oftware Forecast, 2020–2024, August 2020.

4. 尹丽波主编:《2019—2020 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 年, 第 125 页。

5. 中国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2020—2021 年度数字经济形势分析》, 2021 年 1 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 (2020 年)》, 2020 年 10 月, 第 27–28 页。

收入下降，而应对疫情的紧急救助措施又使公共支出超常规增长，导致政府赤字率和债务升至超过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2021年1月，IMF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估算，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达GDP的98%，创历史新高；发达经济体的平均赤字率为13.3%，新兴市场 and 中等收入经济体为10.3%，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5.7%。另据2021年1月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数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债务在2020年增加了17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75万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借款大幅增加，全球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已从2019年的90%攀升至2020年的近105%。经济刺激政策为抵御新冠肺炎疫情、保护私营非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发挥某种程度的对冲作用，但在经济急剧萎缩导致财政收入明显下降的情况下，持续的财政支持引发公共债务和赤字率明显上升，这将给世界各国债务可持续性带来严峻挑战。

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总体攀升，财政赤字率普遍提高。据2021年1月IMF发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亚洲地区有41个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较2019年有所上升，仅有2个经济体的政

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出现下降。在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的经济体中，马尔代夫、日本和巴林的升幅较大，分别为40.3个、28.2个和24.9个百分点；中国香港、伊朗和文莱的升幅较小，分别为0.02个、0.6个和0.6个百分点（见表2.1）。比较而言，黎巴嫩和土库曼斯坦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出现下降，降幅分别为2.8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此外，印度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17.0个百分点，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9.1个百分点，韩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6.5个百分点。相较于2019年，2020年亚洲地区有44个经济体的财政余额占GDP的比重由正转负或财政赤字率上升，仅有2个经济体的财政赤字率出现下降。其中，伊拉克由财政盈余占GDP的0.9%变为财政赤字占GDP的17.5%，马尔代夫的财政赤字率由6.4%进一步扩大至21.9%，新加坡由财政盈余占GDP的3.8%变为财政赤字占GDP的10.8%；孟加拉国、老挝和土库曼斯坦的财政赤字率升幅较小，分别增加1.4个、1.4个和1.1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巴基斯坦和东帝汶的财政赤字率出现下降，降幅分别为1.0个百分点和14.6个百分点。

表 2.1 2018—2020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及财政赤字率

单位：%

经济体	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			经济体	财政赤字率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日本	236.6	238.0	266.2	卡塔尔	5.9	4.9	3.0
黎巴嫩	154.9	174.5	171.7	中国澳门	13.4	15.3	1.4
新加坡	110.4	130.0	131.2	土库曼斯坦	-0.2	-0.3	-1.4
巴林	95.0	103.4	128.3	柬埔寨	0.7	3.2	-2.4
不丹	110.5	104.4	121.3	阿富汗	1.6	-1.1	-2.8
马尔代夫	71.3	78.0	118.3	韩国	2.6	0.4	-3.2
斯里兰卡	83.8	86.8	98.3	乌兹别克斯坦	1.7	-0.3	-4.1
印度	69.6	72.3	89.3	中国台湾	-1.9	-1.8	-4.7

续表

经济体	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			经济体	财政赤字率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约旦	75.1	78.0	88.4	泰国	0.1	-0.8	-5.2
巴基斯坦	72.1	85.6	87.2	哈萨克斯坦	2.6	-0.6	-5.3
也门	74.5	76.5	81.7	不丹	-2.6	-1.1	-5.5
阿曼	53.2	63.1	81.5	亚美尼亚	-1.8	-1.0	-5.8
以色列	60.9	60.0	76.5	塔吉克斯坦	-2.8	-2.1	-6.0
老挝	59.7	62.6	70.9	缅甸	-3.4	-3.9	-6.0
伊拉克	48.9	46.9	68.3	越南	-1.0	-3.3	-6.0
卡塔尔	46.5	56.2	68.1	阿塞拜疆	5.5	8.1	-6.3
马来西亚	55.5	57.2	67.6	印度尼西亚	-1.8	-2.2	-6.3
中国	48.8	52.6	61.7	老挝	-4.7	-5.0	-6.4
亚美尼亚	51.2	49.9	60.7	马来西亚	-3.3	-3.7	-6.5
格鲁吉亚	40.0	42.6	58.7	孟加拉国	-4.6	-5.4	-6.8
泰国	42.0	41.1	50.4	土耳其	-3.7	-5.6	-7.9
菲律宾	37.1	37.0	48.9	尼泊尔	-6.7	-4.6	-7.9
韩国	40.0	41.9	48.4	巴基斯坦	-6.4	-9.0	-8.0
塔吉克斯坦	47.8	43.1	47.8	菲律宾	-1.6	-1.8	-8.1
越南	43.6	43.4	46.6	格鲁吉亚	-0.8	-1.8	-8.1
伊朗	40.3	44.7	45.4	科威特	9.0	5.4	-8.5
缅甸	40.4	38.8	42.4	约旦	-4.7	-6.0	-9.1
土耳其	30.2	33.0	41.7	也门	-7.8	-5.3	-9.2
孟加拉国	34.6	35.8	39.6	伊朗	-1.9	-5.5	-9.5
尼泊尔	30.2	30.1	39.2	斯里兰卡	-5.3	-8.2	-9.6
印度尼西亚	30.1	30.5	38.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9	-0.8	-9.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9	27.3	36.9	沙特阿拉伯	-5.9	-4.5	-10.6
乌兹别克斯坦	20.4	29.3	36.1	新加坡	3.7	3.8	-10.8
中国台湾	34.0	32.8	35.6	蒙古国	3.0	0.9	-11.5
沙特阿拉伯	19.0	22.8	33.4	中国香港	2.4	-1.5	-11.8
柬埔寨	28.6	28.6	31.5	中国	-4.7	-6.3	-11.9

续表

经济体	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			经济体	财政赤字率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土库曼斯坦	31.4	32.8	30.9	以色列	-3.6	-3.9	-12.9
哈萨克斯坦	20.3	19.9	23.4	印度	-6.3	-8.2	-13.1
阿塞拜疆	18.7	17.7	20.1	巴林	-11.9	-10.6	-13.1
科威特	14.8	11.8	19.3	日本	-2.5	-3.3	-14.2
阿富汗	7.4	6.1	7.8	黎巴嫩	-11.3	-10.5	-16.5
文莱	2.6	2.6	3.2	东帝汶	-28.1	-32.1	-17.5
中国香港	0.1	0.3	0.3	伊拉克	7.8	0.9	-17.5
				文莱	-3.6	-7.1	-17.9
				阿曼	-7.9	-7.1	-18.7
				马尔代夫	-5.2	-6.4	-21.9

注：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财政赤字率均按 2020 年数据排序。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的数据不详。

资料来源：IMF，2021 年 1 月。

主权信用评级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亚洲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债务可持续性。从主权信用评级来看，标准普尔在 2020 年 6 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为 A+，前景展望维持为稳定。标准普尔预计未来 3~4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高于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且财政状况逐步改善。随着中国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稳步复苏，实际人均 GDP 平均增速在 2021—2023 年预计约为 5.5%。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发展、中美关系紧张、金融风险上升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仍有减弱的风险。另据 Wind 数据库的统计数据，中资企业（评级为 A+）美元债一年期到期收益率曲线呈反“J”形走势，从 2020 年 1 月 2 日的最高点 2.316,0% 大幅下滑至 12 月 31 日的 0.916,6%，全年降幅高达 59.9%，这也体现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前景充满信心。标准普尔在 2020 年 6 月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 A+ 不变，但将其前景展

望由正面调整为稳定。日本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追加的预算支出，将使本已庞大的公共债务进一步膨胀。在 2023 财年之前，日本相对较高的财政赤字预计将刺激广义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持续上行。标准普尔在 2020 年 6 月将印度主权信用评级维持为 BBB- 的最低投资级评级，展望维持在稳定。穆迪则将印度主权信用评级从 Baa2 下调至 Baa3，评级展望维持为负面。印度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应对措施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政府在土地和劳动力等方面改革进展迟缓等因素是导致该评级结果的主要原因。此外，惠誉在 2021 年 2 月将哈萨克斯坦的主权信用评级维持为 BBB 不变，评级展望为稳定。主要依据包括哈萨克斯坦保持较低的国家债务水平和充足的储备有利于缓解现实和潜在的外部冲击，以及农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保障哈萨克斯坦经济平稳运行发挥重要作用。当月，穆迪则将哈萨克斯坦主权信用评级确定为 Baa3，评级展望为积极。

中国采取强力应对措施，较早控制住疫情蔓延，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稳步推动复工复产。虽然政府债务明显增加，但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2021 年 1 月，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政府总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为 45.8%，低于国际通行的 60% 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2020 年 11 月，印度宣布了一项新的一揽子支持计划，包括额外农业补贴、多年期投资激励、支持住房以及农村就业等若干措施。韩国和日本先后宣布关于增加绿色投资和数字化领域支出的新计划，日本还在发生第三波新冠病毒传染期间扩展了已有的支出计划，这些举措都是导致亚洲地区经济体政府债务攀升的主要原因。

展望 2021 年，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债务水平或将再创新高，进一步侵蚀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进而拖累经济复苏步伐。据 IMF 预测，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 2021 年将达到 69%，印度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攀升至 83% 的高位，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在 2021 年也将达到峰值，缅甸等部分亚洲经济体的偿债额占税收

收入的比例将超过 20%。为此，亚洲地区各经济体应就新冠病毒疫苗和治疗展开合作，为遭受疫情冲击的部门继续提供财政支持；同时，债务水平高企、融资环境趋紧或面临风险的亚洲地区经济体应建立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在管控财政和融资风险的同时，确保政府部门债务的可持续性。

2.3 推进落实亚洲区域经贸安排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断升温，逆全球化现象日趋严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趋势，并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亚洲一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重要推动者。通过加强多边双边经贸合作，亚洲不断塑造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不断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支撑和信心。

疫情也给亚洲地区的经贸发展带来严重冲击，但总体情况要好于其他地区。在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 2020 年第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均同比萎缩 21%，而亚洲地区货物出口和进口则分别萎缩 10% 和 17%，萎缩幅度远低于其他地区。服务贸易的总体形势也要好于其他地区（见表 2.2）。

表 2.2 2020 年第二季度亚洲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比增速

单位：%

贸易类型	进出口	世界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欧洲	亚洲	其他地区
货物贸易	出口	-21	-32	-19	-23	-10	-39
	进口	-21	-23	-26	-22	-17	-24
服务贸易	出口	-28	-29	—	-25	-29	-42
	进口	-31	-36	—	-29	-30	-41

资料来源：WTO，2021 年 1 月。

亚洲相对较好的经贸形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区域经贸合作上的不断推进。据 WTO 统计，截至 2021 年 2 月，亚洲经济体与区域内外经济体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共有

186 个，占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总数的 54.9%，其中大部分为自由贸易协定（FTA）或自由贸易协定与经济一体化协定（EIA）。亚洲各经济体都签署了数量不等的自由贸易协定或类

似安排。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统计,截至2020年10月,亚洲地区签署较多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包括新加坡(26个)、中国(22个)、日本(18个)、韩国(18个)、马来西亚(17个)、吉尔吉斯斯坦(15个)、哈萨克斯坦(15个)、印度尼西亚(15个)、亚美尼亚(15个)、泰国(14个)、格鲁吉亚(14个)、越南(13个)和印度(13个)等。¹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亚洲区域经贸合作协定的重要代表。2018年12月30日,由文莱、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5个亚洲经济体和其他6个亚太国家参加的CPTPP正式生效。根据协定,签署国将取消或削减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提供更多便利措施。更为重要的是,CPTPP体现了未来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是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为此,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区外经济体都表达了加入CPTPP的意愿。2020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²2020年12月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表示,考虑加入CPTPP。³

RCEP的签署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另外一个重要里程碑。2020年11月15日,RCEP正式签署,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RCEP的签署是对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支持,将为区域和全球经济

增长注入强劲动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指出,到2030年,RCEP将使全球收入每年增加1,860亿美元,并为成员国GDP增长贡献0.2个百分点。⁴与此同时,RCEP的签署也会进一步加速亚洲地区其他贸易协定的谈判。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曾表示,RCEP谈判的完成将进一步推进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谈判。⁵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也表示,RCEP的签署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提速创造了良好条件。⁶

此外,近年来亚洲经济体还达成了一批重要的双边经贸安排。2019年2月1日,欧盟与日本的自贸协定生效,双方承诺将取消99%的进口商品关税;2019年11月21日,欧盟与新加坡自贸协定生效,新加坡将取消对欧盟产品的所有剩余关税,欧盟在未来3~5年内取消新加坡所有产品的关税;2020年8月1日,欧盟与越南自贸协定生效,这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达成的最全面的贸易协定,协定最终将取消双方99%的贸易商品关税。与此同时,多个亚洲经济体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仍在谈判进程中。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生效的情况,中欧自贸协定也在谈判进程之中。

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不断推进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经济的发展。ADB报告显示,2018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其总贸易的57.5%,高于2012年至2017年的56.3%,这表明亚洲区域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⁷近年来,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加强。例

1. 相关数据见亚洲区域一体化中心(ARIC)(<https://aric.adb.org>)。

2. 习近平,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2020年11月20日。

3. Moon: S. Korea to Consider Joining CPTPP to Expand its Free Trade Network,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01208000334>, Dec 8, 2020.

4. Peter Petri and Michael Plummer. East Asia Decou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0-9, 2020.

5. Facing US Trade Uncertainty, China Seeks Closer Ties with Neighbours, <https://news.yahoo.com/facing-us-trade-uncertainty-china-seeks-closer-ties-075755330--finance.html?guccounter=1>, December 25, 2019.

6.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2020年11月19日,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01119.shtml>.

7. ADB.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9/2020: Demographic Change, Productivity, and the Role of Technology, November 2019.

如，在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2020 年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尽管受到疫情冲击，双方贸易额仍达到 6,846 亿美元，增长 6.7%。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将进一步推动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IMF 研究认为，在新的稳定状态下，进一步贸易开放和区域一体化可以将亚洲地区 GDP 总量提高至少 10%。¹

2.4 新冠肺炎疫情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使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面对疫情考验，“一带一路”建设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相关项目持续推进，合作成果亮点颇多，贸易和投资逆势增长，成为疫情阴霾中的一抹亮色。

2020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呈现新亮点。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为 1.35 万亿美元，较 2019 年增长 0.7%，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 29.1%。中欧班列的贸易大通道作用更加凸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合作规划编制等相关工作扎实推进。同时，RCEP 成功签署是东亚区域一体化 20 年来最重要的成果，RCEP 生效实施将为中国和相关国家贸易合作注入新动能。

2020 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 58 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 17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占同期总额的 16.2%，较 2019 年同期提升 2.6 个百分点，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和以色列等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1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5,611 份，新签合同额 1,414.6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5.4%；完成营业额 911.2 亿美

元，占同期总额的 58.4%。一大批境外项目和园区建设在克服疫情中稳步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铁路等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新入园企业 13 家。同时，沿线国家企业也看好中国发展机遇，在华新设企业 4,294 家，直接投资 82.7 亿美元。

自疫情暴发以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合作需求进一步上升。疫情强烈冲击着世界各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复苏经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都需要这一国际合作平台，来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与有关各方加强政策协调沟通、共享相关信息。二是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在疫情带来的种种新挑战下，“一带一路”朋友圈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进一步丰富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涵。同时，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深化。三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多元化。过去，共建“一带一路”以贸易投资和商品服务的跨国流动为主。如今，各种线上交易方兴未艾，线上线下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促进，使“一带一路”更具活力。四是合作机制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全球疫情的新形势，“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加强了政策沟通和规则对接，如签署 RECP、完成中欧投资贸易协定谈判等。这些成果都使得“一带一路”合作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 7 年多时间里，其主要作用是加强了全球的互联互通。疫情暴发以来，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在硬件方面，即促进基础设施领域互联互通。中欧班列逆势发展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中欧班列共开行 12,400 列，同比增长 50%；发送集装箱 113.5 万标箱，同比增长 56%；通达境外 21 个国家的 92 个城市，比 2019

1. Tao Zhang. Speech on the Global and Asia Economic Outlook, at Greater Bay Area Chief Economist Forum, July 10, 2020.

年底增加了37个。在软件方面，即稳定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2020年，相比全球投资贸易的大幅度萎缩，“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贸易显示出强大韧性，之前几年互联互通建设成果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有利于加快恢复受疫情破坏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大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公共产品。中国主张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目前，中国已与130多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从发展理念上看，疫情检验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和基本原则，即秉持开放包容透明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重要性。疫情使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同住地球村，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正是践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重要平台。从实际行动上看，中国行胜于言，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和技术援助，积极助力其他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疫情期间，中国成为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截至2020年12月中旬，已向各国提供了2,000多亿只口罩、20亿件防护服、8亿份检测试剂盒。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国际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亮眼成绩单，进一步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再次证明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才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下篇 |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概述

亚洲经济一体化持续向前推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亚洲贸易和投资出现负增长，但亚洲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决心未减。新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起，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亚洲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撑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亚洲货物贸易一体化水平提升。2019年，亚洲经济体的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数提高，亚洲贸易依存度保持较高水平，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自身的贸易依存度均在近50%及以上。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中国、东盟依存度普遍较高。尽管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是越南等国家的贸易增速加快。

从价值链构成看，亚洲主要经济体仍然高度依赖亚洲工厂，而且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逐年递增，印度增速最快。2019年，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对亚洲工厂依赖度最高。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亚洲工厂部分生产网络中断，但是并未使亚洲的全球价值链中心出现转移，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日本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在亚洲贸易额前22位的零部件产品中，亚洲仍有18种零部件产品主要依赖中国。亚洲工厂的存在，将带动亚洲经济体率先实现疫后经济复苏。

从最终需求看，亚洲经济体对服务业需求的增速高于对货物需求的增速。亚洲经济体之间服务贸易的联系也在增强，增速超出了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联系。这一趋势是由本区域制造业的生产分工过程中服务业参与不断增多带来的。在制造业生产分工细化后，生产性服务活动可以将分散的低

成本和高效率的制造生产环节连接在一起，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价值链，促进了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和增长。同时，这些服务本身也是创造价值和布局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

从旅游服务业看，2019年东南亚国际旅游者人数增长和南亚旅游业收入增长均居本区域之首。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旅游出口依存度的总体格局没有明显变化，周边经济体是主要的旅游贸易伙伴，这是亚洲旅游业的突出特点。2020年受到重创的亚洲旅游业正在艰难恢复中。

亚洲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亚洲数字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支撑以及各经济体的积极治理，并受数字技术引领与数字企业推动。亚洲内部不同数字贸易业态发展水平各异。计算机服务和通信服务出口最为繁荣，出口额分别占世界总额的33%和29%。新冠肺炎疫情下，为防控疫情和缓解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数字贸易成为各国与企业主体的选择，得以快速发展。在疫情催生的众多业态模式中，远程在线办公、远程教育以及远程医疗增长最为显著。

在投资领域，2019年以来，国际资本青睐亚洲市场。在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和流出方面，2019年，亚洲经济体表现稳健，流入中国、东盟和印度的FDI都创造了历史新高。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大幅增长。同时，亚洲经济体的主要外资来源地仍是亚洲内部。亚洲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自2016年至2019年已连续4年保持在50%以上。亚洲内部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波动较大。202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入下降42%，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只下降4%，而中国2020年吸引的直接

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增长，且成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

亚洲金融市场融合继续稳步推进。2019年，亚洲国家金融市场吸引的资产组合投资增长 14.24%，其中，来自亚洲自身的资金占比 22%。中国对外和接受的资产组合投资分别增长了 29.73%和 21.27%。亚洲各经济体积极推进货币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双边货币互换促进了亚洲经济体间的贸易、投资使用本币计价、结算。2021 年 1 月，用于全球支付结算前十名的货币中，亚洲货币有五种，即日元、人民币、港元、新加坡元以及泰铢；在全球贸易融资市场前十名的货币中有包括人民币、日元、印度尼西亚卢比、阿联

酋迪拉姆等在内的七种亚洲货币。亚洲继续推动金融市场联结与监管互认、支付体系与数字货币合作以及基础设施融资等。此外，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北京以及深圳等国际金融中心对促进全球资本集聚亚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支持创新发挥了重要枢纽作用。疫情后，金融全球化趋势未减。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给亚洲金融市场带来持续溢出效应。

亚洲全方位提升一体化水平，彼此合作程度、依存度均有提升，有助于提高亚洲区域内资源配置能力，增强亚洲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促进疫后的亚洲经济快速恢复与发展。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

3.1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一体化

本节的主要目的在于衡量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分别从出口依赖度、贸易依存度和贸易流向三个维度进行了阐述。我们发现，亚洲经济体的亚洲出口依赖度稳步提升，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双边贸易规模持续增加。目前，亚洲经济体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依存度普遍较高，中国和东盟是亚洲货物贸易的两大中心，并且中国对越南的出口规模将突破千亿美元。

3.1.1 亚洲出口依赖度稳步提升

本小节使用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数（Export Reliance Index on Asia, ERI-ASIA）来分析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出口依赖度指数是一个综合性指数，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对亚洲经济体的出口依赖程度，由出口份额亚洲占比、贸易开放度和出口种类集中度¹三个子指标构成。具体而言，先分别对上述三个子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取三者的几何均值，最后乘以100。该指标取值范围为0至100，该值越大，表明经济体对亚洲整体的出口依赖度越高。受篇幅所限，表3.1选取了部分经济体在2012—2019年对亚洲的出口依赖度指数进行汇报。总体而言，亚洲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这表现为亚洲经济体的ERI-ASIA在近些年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2019年这一指数为12.7（见图3.1）。

1. 出口份额亚洲占比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对亚洲整体的货物贸易依存度，以该经济体对亚洲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其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测度，资料来源为UNCTAD数据库；贸易开放度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以该经济体的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该经济体的GDP的比值来测度，资料来源为UNCTAD数据库；出口种类集中度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对亚洲出口的货物种类集中程度，以该经济体每种SITC 3位码商品出口额占其亚洲出口额的比重的平方和来测度，这和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简称HHI）的计算方式相似，资料来源为WITS数据库。为了缓解年度数据波动的问题，本文对每一个指标选取当年和前一年的均值来进行测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需要对三个子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不失一般性，本报告在数据标准化处理过程中同时将亚洲以外的其他经济体和地区（如亚洲各地区、欧盟、东盟、TPP国家、CPTPP国家等）包括在内。

表 3.1 2012—2019 年部分经济体的出口依赖度指数

经济体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	8.29	7.54	7.34	7.50	7.84	8.83	7.92	8.05
日本	5.67	5.04	5.56	6.38	6.90	8.75	8.50	8.74
韩国	16.50	15.62	15.18	15.16	15.16	18.58	21.04	20.96
中国香港	65.94	72.93	69.15	64.10	70.43	65.12	46.76	48.45
中国澳门	5.02	—	19.70	28.68	30.31	—	34.92	40.97
南亚	12.63	11.84	11.59	10.34	8.80	10.65	11.06	10.74
印度	13.81	13.15	12.51	11.04	9.41	10.94	11.15	10.93
斯里兰卡	12.77	12.62	12.72	12.93	12.89	13.70	—	—
东盟	16.95	15.72	15.74	15.94	15.86	17.65	17.94	18.28
新加坡	37.88	37.22	37.72	37.91	37.49	38.73	39.19	39.30
马来西亚	21.81	21.18	21.44	21.32	20.98	23.17	24.92	25.96
泰国	13.32	9.61	7.36	6.46	6.36	11.92	12.03	11.81
菲律宾	16.90	16.20	16.44	18.81	21.03	21.92	20.65	21.91
印度尼西亚	13.34	12.74	12.20	11.58	10.55	11.70	11.69	11.69
越南	15.83	15.83	16.38	17.37	19.29	23.87	24.16	21.83
亚洲	11.05	9.54	9.02	8.90	9.00	11.76	12.35	12.70
澳大利亚*	16.06	16.53	17.24	16.62	16.73	19.03	19.25	21.04
新西兰*	14.83	15.60	16.80	16.15	14.75	16.24	16.39	17.33
美国*	4.60	4.19	4.50	5.18	5.82	6.78	5.54	5.59
欧盟 27 国*	5.89	3.83	3.17	3.87	4.60	7.00	6.93	7.01

注：“—”表示数据不可得。带有*的国家不属于亚洲，因此与其他指标不完全可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库、UNCTAD 数据库。

对比来看，本报告所列举的亚洲经济体以及亚洲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对亚洲整体的出口依赖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是由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差异导致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新加坡对亚洲整体的出口依赖度相对最高，ERI-ASIA 分别为 48.45、40.97 和 39.3；

而中国、日本和印度对亚洲整体的出口依赖度相对最低，ERI-ASIA 分别为 8.05、8.74 和 10.93。就亚洲以外的经济体来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亚洲整体的出口依赖度相对较高，ERI-ASIA 分别为 21.04 和 17.33；美国和欧盟对亚洲整体的出口依赖度相对较低，

ERI-ASIA 分别为 5.59 和 7.01。中国澳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 ERI-ASIA 上升幅度较大,而东盟国家、中国和日本的 ERI-ASIA 上升幅度有限。中国香港的出口依赖度也较 2018 年有所回升,但仍显著低于 2017 年前的水平。但就趋势而言,表 3.1 所列举的多数亚洲经济体和欧美经济体的 ERI-ASIA 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这反映出亚洲经济体间的相互出口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并且亚洲经济体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强。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亚洲经济体的 ERI-ASIA 的差异,表 3.2 列示了 ERI-ASIA 三个子指标排在前三位和后三位的经济体。中国香

港在三个子指标上均排在前三位,这说明中国香港对亚洲的出口比例和贸易开放度相对较高,但商品出口种类相对单一,经济增长对贸易波动更为敏感。中国在三个子指标上均排在后三位,尤其是在出口种类集中度上相对最小,这说明中国的商品出口种类丰富。越南的贸易开放度相对较高,且其出口种类相对丰富;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种类相对单一,且贸易开放度不高。总的来看,经济规模相对较大的经济体的出口份额亚洲占比和贸易开放度两个子指标的取值明显较小,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来消化其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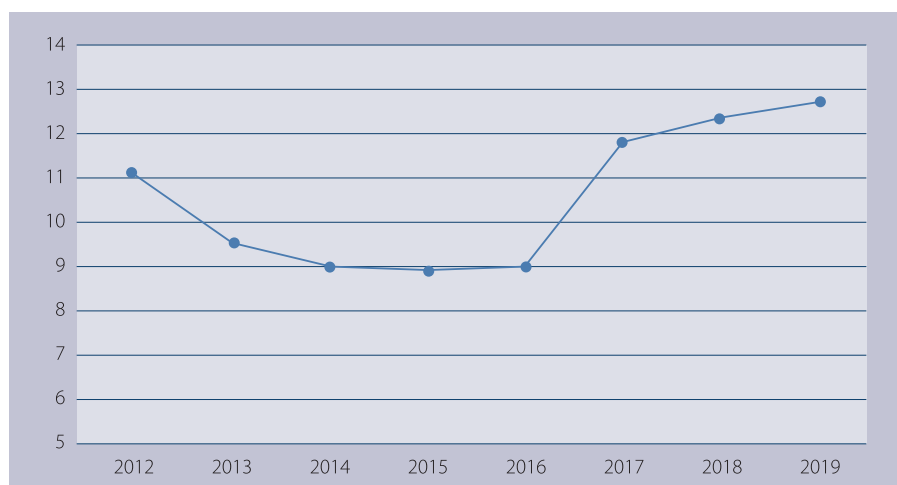


图 3.1 2012—2019 年亚洲经济体对亚洲的出口依赖度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WITS 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到。

表 3.2 2019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三个子指标的对比情况

子指标	前三位经济体	后三位经济体
出口份额亚洲占比	中国澳门	泰国
	中国香港	中国
	菲律宾	日本
贸易开放度	中国香港	日本
	新加坡	中国
	越南	印度尼西亚

续表

子指标	前三位经济体	后三位经济体
出口种类集中度	中国香港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
	马来西亚	越南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WITS 和 UNCTAD 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到。

2019 年，亚洲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多数亚洲经济体对亚洲整体的出口依赖度稳步上升，这和经济全球化向经济区域化转变的趋势是一致的。WTO 的关税统计数据显示，亚洲经济体的平均关税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中国、土耳其、以色列、哈萨克斯坦、老挝、菲律宾、不丹等经济体下降幅度相对明显，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等经济体则保持在零关税水平，这拉动了亚洲区域内货物贸易的增长。

面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冲击，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往来将变得更为紧密。2020 年，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逆势增长，双方第一次互为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建立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其正式签订将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提供新的机遇，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望进一步加快。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内外供应链出现中断。展望 2021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是影响全球贸易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新冠肺炎疫苗的成功研制与使用纵然是一大利好消息，但新冠肺炎疫苗的全球生产与分配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亚洲经济体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共享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成果，促进区域内

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恢复与融合。

3.1.2 亚洲贸易依存度保持较高水平

本报告提出的衡量贸易依存度¹的指标，可用于度量亚洲经济体间的贸易依存程度，其值分布于 0 和 100% 之间，其值越大表示贸易依存度越高。本小节对该指标进行了更新，动态监测亚洲经济体间的贸易依存程度。

表 3.3 为 2019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依存度现状。亚洲经济体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普遍较高，亚洲贸易份额均占到一半及以上，区域化特征明显。东盟国家对亚洲整体的依存度相对最高，依存度高达 70% 以上；其次是韩国和日本，分别为 63% 和 58%。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东盟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较高，表明中国和东盟在亚洲贸易中居于核心位置。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依存度相对最高，依存度高达 22.35%；中国、日本和韩国对东盟的依存度则在 15% 左右。韩国和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在 20% 以上，而东盟和 CPTPP 国家、TPP 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则在 15% 以上。根据 WTO 发布的《2019 年世界贸易概览》，2018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以及 TPP 成员国中的多个国家都以中国为其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见表 3.4)。此外，尽管印度对东盟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相对不高，却表现出上升的趋势。

1. 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等于 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贸易额（出口加进口）除以 X 经济体对世界的贸易总额。该指标衡量了与 X 经济体对世界的密切程度相比，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依赖程度。通常情况下，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不等于 Y 经济体对 X 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

表 3.3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间贸易依存度指标

单位：%

X 对 \ Y 依赖	东盟	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	亚洲	TPP	CPTPP
东盟	22.35	18.07	2.75	7.98	5.6	70.12	34.57	24.01
中国	14.05	—	2.03	6.89	6.23	49.05	35.25	23.39
印度	11.38	10.68	—	2.19	2.59	55.64	24.57	13.45
日本	15	21.3	1.15	—	5.32	58.22	30.59	15.05
韩国	14.47	23.29	1.98	7.27	—	62.85	37	24.02
TPP	10.36	16.22	1.88	4.55	4.05	45.61	42.38	25.87
CPTPP	12.49	17.55	1.63	3.95	4.52	50.03	43.63	15.71

资料来源：WITS 数据库、UNCTAD 数据库。

表 3.4 2018 年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

1	安哥拉	20	印度尼西亚	39	菲律宾
2	澳大利亚	21	伊朗	40	卡塔尔
3	孟加拉国	22	伊拉克	41	俄罗斯
4	巴西	23	日本	42	卢旺达
5	柬埔寨	24	肯尼亚	43	沙特阿拉伯
6	喀麦隆	25	朝鲜	44	塞拉利昂
7	智利	26	韩国	45	新加坡
8	中国香港	27	科威特	46	所罗门群岛
9	中国澳门	28	吉尔吉斯斯坦	47	南非
10	中国台湾	29	黎巴嫩	48	南苏丹
11	刚果	30	马来西亚	49	苏丹
12	科特迪瓦	31	马绍尔群岛	50	坦桑尼亚
13	古巴	32	蒙古国	51	泰国
14	埃及	33	缅甸	52	多哥
15	厄立特里亚	34	新喀里多尼亚	53	阿联酋
16	埃塞俄比亚	35	新西兰	54	美国
17	加蓬	36	巴基斯坦	55	乌干达
18	德国	37	巴拿马	56	乌兹别克斯坦
19	印度	38	秘鲁	57	越南

资料来源：WTO 《2019 年世界贸易概览》。

图 3.2 为各经济体间相互货物贸易依存度的动态变动情况。总体而言，亚洲主要经济体以及 CPTPP 国家和 TPP 国家对亚洲整体的货物贸易依存度普遍保持在较高水平，但较往年出现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美国掀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以及日韩双边关系紧张，而中日韩三个经济体在亚洲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和东盟两个经济

体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相互间的货物贸易依存度进一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跨国企业不断将产能由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国家，进而导致了双边货物贸易的增加。此外，其他亚洲主要经济体以及 TPP 国家对东盟国家的货物贸易依存度进一步提升，这反映出东盟国家的亚洲贸易地位在不断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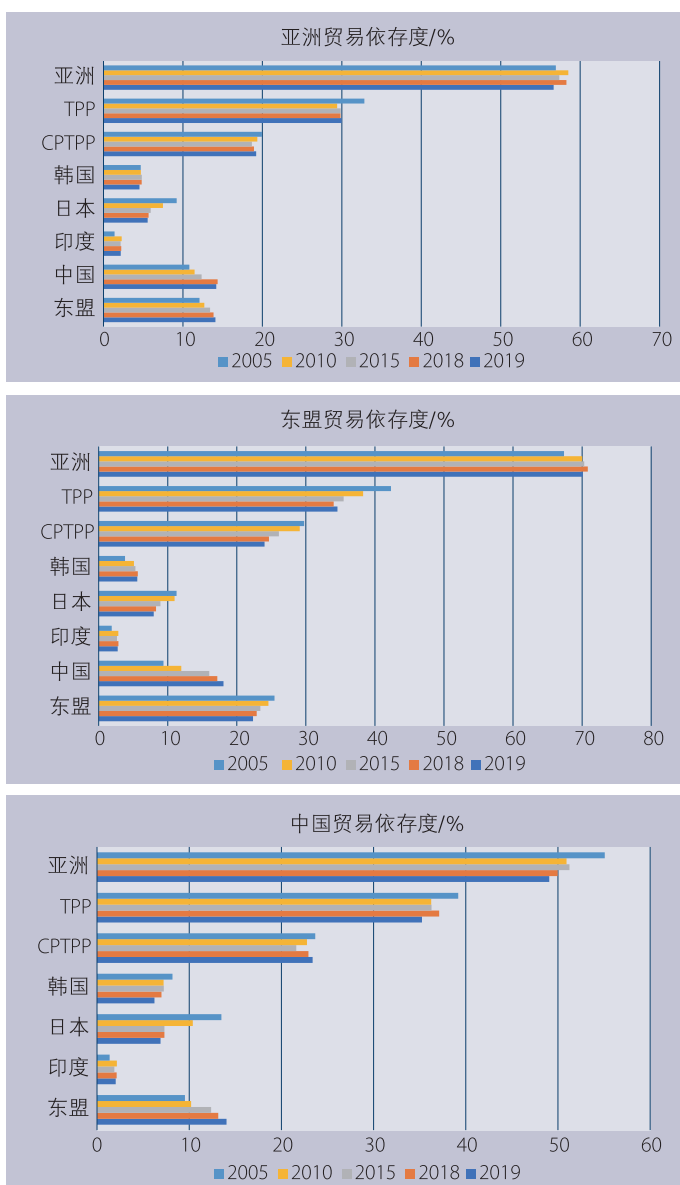


图 3.2 部分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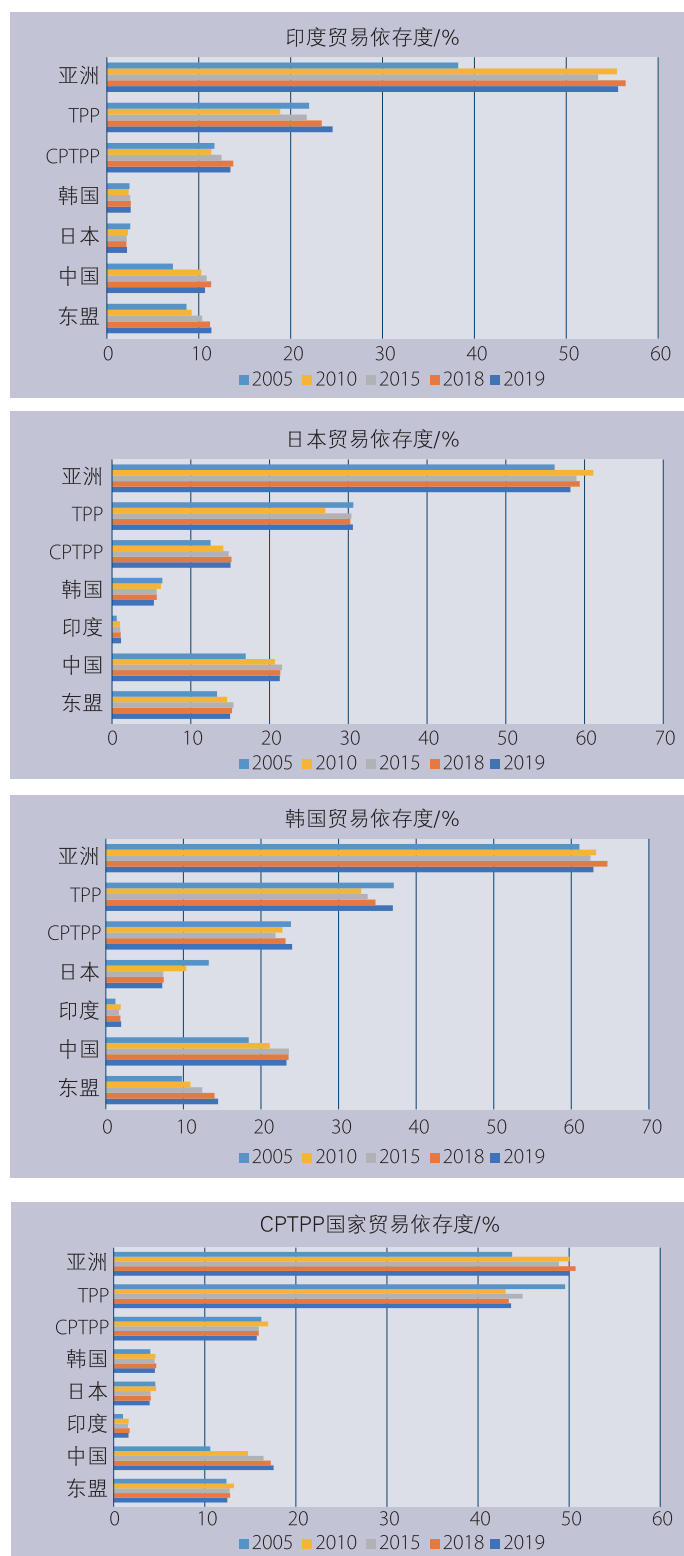


图 3.2 部分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指数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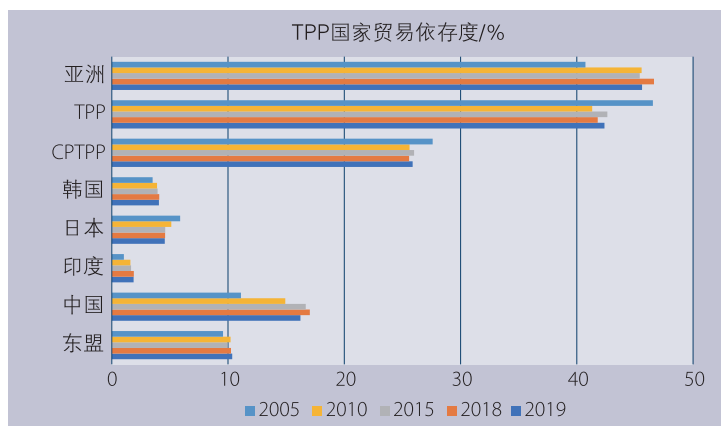


图 3.2 部分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指数 (续)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WITS 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到。

受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不利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出现下降。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双边贸易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不过，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双边经贸关系有望回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经贸关系出现摩擦，但是不包括美国在内的 CPTPP 国家整体对中国的依存度却有所上升。

综上所述，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保持在高水平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CPTPP 国家对亚洲的依存度有所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地位不断提升。RCEP 的成功签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东盟国家的地位。由于东盟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贸易规模不断增加，东盟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3.1.3 中国和东盟稳居货物中心位置

表 3.5 给出了 2019 年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流向矩阵¹。数据显示，亚洲主要经济体同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相对更大。东盟对中国的进口额高达 3,606 亿美元，比其区域内进口规模还大，而东盟对中国的出口额则为 2,038 亿美元。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双边出口规模也达到 1,057 亿美元。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额分别达到 1,433 亿美元和

1,111 亿美元；中国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额分别为 1,347 亿美元和 1,362 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 1,030 亿美元；而中国对越南的出口额已经增长至 981 亿美元，2020 年则有望超过 1,000 亿美元。

表 3.6 为 2019 年亚洲不同地区按 SITC 1 位码进行分类的商品出口额。东北亚地区为亚洲地区的制造业中心，机械及运输设备 (SITC 7) 出口额高达 22,949 亿美元，占亚洲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SITC 5) 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SITC 6) 则占到一半以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为机械及运输设备 (SITC 7)，占亚洲出口总额的 20% 左右。此外，东南亚在初级产品出口上存在比较优势，其中动、植物油脂及蜡制品 (SITC 4) 出口额为 342 亿美元，占亚洲出口总额的近 90%；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 (SITC 0)、饮料及烟草类 (SITC 1) 和非食用原料 (SITC 2) 的出口额分别为 960 亿美元、99 亿美元和 460 亿美元，均为亚洲最高。西亚地区主要出口矿物燃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SITC 3) 出口额占亚洲出口总额一半左右。南亚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为按原料分类的制

1. 横向表示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的出口额 (单位：十亿美元)，如东盟向东盟、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等经济体的出口；纵向则表示一个经济体从其他经济体的进口额，如东盟从东盟、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等经济体的进口额。

成品 (SITC 6) 和机械及运输设备 (SITC 7), 这两种产品的出口额为 1,471 亿美元, 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 42%。中亚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为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SITC 3), 该产品的出口额为 592 亿美元, 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 60%。

总的来看, 中国和东盟目前是亚洲货物贸易的两大中心, 亚洲各地区的贸易结构存在一定差异。作为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 日本在亚

洲货物贸易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单个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 但越南等国家的贸易增速相对较快。目前, 东北亚地区为亚洲的制造业中心, 东南亚的制造业规模将持续增加, 且在初级产品出口上具有一定优势, 中亚和西亚地区在矿物燃料出口上具有明显优势。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冲击, 加速了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 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将会变得更为紧密。

表 3.5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间贸易流向矩阵

单位: 十亿美元

到 \ 从	东盟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东盟	319.8	203.8	51.8	46.5	105.7	57.2	62.2	30.6	48.4	37.6	34.2	5.7
中国	360.6	—	75.0	45.7	143.3	111.1	52.5	40.8	45.7	98.1	48.1	5.7
印度	34.2	17.3	—	4.5	4.8	4.7	6.3	1.6	4.3	5.5	3.0	0.4
印度尼西亚	41.6	27.9	11.8	—	15.9	7.2	8.9	6.8	6.2	5.2	2.3	0.4
日本	106.2	134.7	11.0	14.0	—	46.3	13.3	10.7	30.2	16.5	14.5	2.3
韩国	95.1	136.2	15.1	7.7	28.4	—	8.8	8.4	7.8	48.2	7.9	1.4
马来西亚	68.6	33.7	9.1	7.4	15.8	8.1	—	4.4	13.5	8.4	6.9	1.1
菲律宾	10.8	9.8	0.5	0.8	10.7	3.2	1.8	—	3.0	1.3	0.4	0.1
泰国	59.9	28.1	7.1	8.5	23.1	4.5	10.0	6.5	—	11.6	9.5	1.4
越南	24.9	41.4	6.7	3.4	20.4	19.7	3.8	3.7	5.1	—	3.5	0.5
澳大利亚	28.0	103.0	9.7	4.1	39.5	17.5	6.2	1.9	3.1	4.2	—	7.1
新西兰	4.0	11.2	0.5	0.7	2.4	1.2	0.7	0.6	0.7	0.5	5.5	—

资料来源: WITS 数据库, UNCTAD 数据库。

表 3.6 2019 年亚洲不同地区的商品出口额

单位: 十亿美元

SITC 分类	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亚	西亚	亚洲
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 (SITC 0)	86.8	96.0	34.5	5.3	26.7	249.4
饮料及烟草类 (SITC 1)	8.5	9.9	1.2	1.3	5.4	26.3
非食用原料 (SITC 2)	37.5	46.0	11.1	6.5	11.0	112.2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SITC 3)	107.3	141.7	44.9	59.2	337.2	690.3

续表

SITC 分类	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亚	西亚	亚洲
动、植物油脂及蜡制品 (SITC 4)	1.6	34.2	1.4	0.2	1.6	39.0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SITC 5)	330.1	115.5	54.1	3.5	79.9	583.2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SITC 6)	592.9	128.0	85.2	11.9	82.4	900.3
机械及运输设备 (SITC 7)	2,294.9	583.4	61.9	1.8	78.1	3,019.9
杂项制品 (SITC 8)	737.5	201.5	51.8	1.1	47.1	1,039.1
未分类的其他商品 (SITC 9)	92.7	53.9	0.3	7.7	227.4	382.0
合计	4,289.8	1,410.2	346	98.5	896.8	7,041.7

资料来源: WITS 数据库。

3.2 亚洲工厂一体化

世界大多数产品的生产遍及众多国家和地区, 每个国家和地区只从事生产流程的特定阶段。尽管国际生产网络先在欧洲和北美出现, 但如今亚洲的生产网络更加活跃, 并已成为亚洲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区域内零部件产品贸易一直是近十年来亚洲工厂经济体之间贸易增长的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亚洲工厂部分生产网络中断, 加剧了对亚洲全球价值链的破坏, 并存在发达经济体将生产活动 (或价值链) 迁移回本国的情况, 亚洲工厂很可能受到严重打击。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当前阶段, 预测影响亚洲工厂的深度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进展的可能情况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应各不相同, 总体上看, 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的生产一体化构成了巨大挑战。

本节继续依据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零部件产品贸易关系, 分析亚洲工厂内部相互依存度与亚洲工厂一体化进程。

3.2.1 亚洲工厂依存模式保持稳定

2019 年, 美国与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紧张, 亚洲工厂与北美 (USMCA) 工厂的自身依存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表 3.7 与表 3.8 可以看出, 2018 年至 2019 年, 亚洲工厂自身依存度指数从 0.60 下降到

0.57, 北美工厂自身依存度略有加强, 从 0.41 上升为 0.42, 欧洲 (EU27) 工厂自身依存度仍为 0.60。

表 3.9 显示, 亚洲主要经济体都高度依赖亚洲工厂。2019 年, 对亚洲工厂依赖程度最高的依然是中国香港, 高达 0.78, 且长时间内其依赖指数一般都在 0.7 以上并呈上升趋势。其他依次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日本、新加坡等, 其依存度为 0.73、0.69、0.67、0.64、0.64、0.64、0.59、0.59。对亚洲工厂依存度低于 0.5 的只有中国和印度, 都为 0.44。从 2001 年至 2019 年看, 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都是逐年递增的, 如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特别是印度, 它从低水平的依存开始, 积极参与了亚洲的全球价值链, 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从 2001 年的 0.26 增加到 2019 年的 0.44。

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特别是 2001 年以后, 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亚洲工厂快速发展, 2019 年, 仅从零部件产品贸易看, 中国是韩国的 3.6 倍、日本的 2.9 倍、东盟的 1.5 倍。

从表 3.7 与表 3.8 还可以看出, 2018 年至 2019 年, 越南对中国工厂依存度指数由 2018 年的 0.25 上升到 2019 年的 0.28, 而北美工厂对中国工厂依存度指数由 2018 年的

0.19 下降到 2019 年的 0.16。相似的，中国对北美的工厂依存度指数也由 0.15 下降到 0.13，对亚洲工厂依存度保持不变，对欧洲的依存度小幅上升，2019 年，中国对其他经济体工厂依存度普遍低于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工厂依存度。2019 年，中国对亚洲工厂依存度最高的依次为中国香港、韩国和日本，其依存度指数为 0.10、0.09 和 0.07。东盟各国主要零部件贸易主要依赖中国、日本和韩国，远超过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

亚洲工厂经济体在零部件产品贸易中高度依赖中国。尽管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但迄今为止亚洲工厂的相互依存模式仍保持稳定。如图 3.3 所示，2019 年亚洲工厂对中国、

美国和日本的依存度略有下降，然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亚洲工厂的依存模式，中国在亚洲工厂中的主导地位保持不变。同时，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造成重大冲击，但此冲击是全球系统性的，可能不足以吸引投资者在地理上重新分配其生产并将目标对准最终销售的新市场。在过去十年中，在中国经济前景乐观和近年来改革加速的鼓舞下，全球投资者倾向于将投资转移到中国，而没有迹象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会扭转这一趋势。中国经济已引领世界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这将大大增强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导致更多的投资流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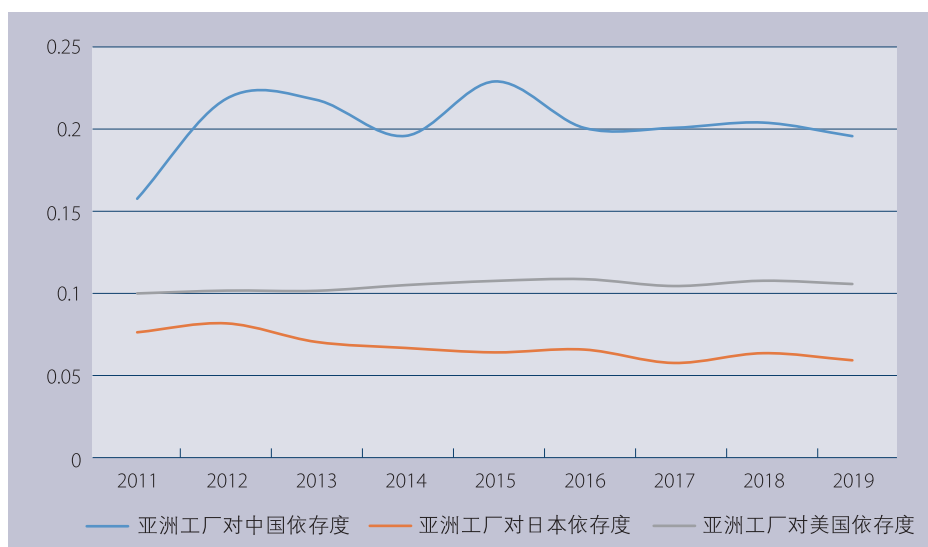


图 3.3 2011—2019 年亚洲工厂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依存度变迁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7 2019 年亚洲工厂依存度指数

Y 依赖 X 对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中国	—	0.10	0.01	0.02	0.07	0.09	0.04	0.02	0.02	0.02	0.06	0.44	0.12	0.13	0.22	0.34
中国香港	0.54	—	0.00	0.03	0.03	0.04	0.03	0.02	0.05	0.02	0.02	0.78	0.05	0.05	0.15	0.75
印度尼西亚	0.27	0.03	—	0.03	0.13	0.06	0.04	0.01	0.06	0.05	0.04	0.73	0.06	0.06	0.31	0.69

续表

Y 依赖 X 对	中国	中国 香港	印度 尼西 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 宾	新加 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印度	0.15	0.11	0.01	—	0.03	0.04	0.01	0.00	0.03	0.02	0.03	0.44	0.15	0.17	0.12	0.33
日本	0.29	0.03	0.03	0.01	—	0.06	0.02	0.02	0.01	0.07	0.04	0.59	0.07	0.18	0.12	0.56
韩国	0.32	0.07	0.01	0.02	0.07	—	0.02	0.02	0.01	0.01	0.11	0.67	0.08	0.13	0.24	0.58
马来西亚	0.18	0.09	0.02	0.01	0.06	0.04	—	0.02	0.14	0.05	0.03	0.64	0.09	0.13	0.25	0.55
菲律宾	0.18	0.13	0.01	0.00	0.13	0.07	0.03	—	0.07	0.05	0.02	0.69	0.09	0.12	0.27	0.56
新加坡	0.14	0.11	0.03	0.02	0.05	0.05	0.11	0.03	—	0.03	0.02	0.59	0.08	0.14	0.21	0.47
泰国	0.18	0.04	0.03	0.03	0.18	0.03	0.05	0.03	0.02	—	0.04	0.64	0.08	0.12	0.31	0.60
越南	0.28	0.02	0.01	0.02	0.07	0.17	0.02	0.01	0.01	0.02	—	0.64	0.09	0.13	0.12	0.61
亚洲	0.20	0.07	0.02	0.02	0.06	0.07	0.03	0.02	0.03	0.02	0.05	0.57	0.09	0.12	0.20	0.50
EU27	0.08	0.01	0.00	0.01	0.01	0.01	0.01	0.00	0.01	0.00	0.01	0.16	0.60	0.08	0.05	0.14
USMCA	0.16	0.01	0.00	0.02	0.04	0.03	0.03	0.01	0.01	0.01	0.02	0.35	0.11	0.42	0.34	0.32
CPTPP	0.20	0.04	0.02	0.01	0.04	0.06	0.04	0.01	0.02	0.03	0.02	0.49	0.08	0.30	0.15	0.45
RCEP	0.13	0.08	0.02	0.02	0.07	0.07	0.04	0.02	0.02	0.03	0.05	0.54	0.10	0.14	0.21	0.4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8 2018 年亚洲工厂依存度指数

Y 依赖 X 对	中国	中国 香港	印度 尼西 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 宾	新加 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中国	—	0.10	0.01	0.02	0.07	0.10	0.03	0.02	0.02	0.02	0.05	0.44	0.11	0.15	0.21
中国香港	0.54	—	0.00	0.03	0.03	0.05	0.03	0.01	0.05	0.02	0.02	0.78	0.05	0.06	0.15
印度尼西亚	0.27	0.02	—	0.03	0.15	0.06	0.04	0.01	0.06	0.06	0.04	0.74	0.06	0.05	0.30
印度	0.16	0.11	0.01	—	0.03	0.04	0.01	0.00	0.03	0.02	0.02	0.43	0.16	0.16	0.11
日本	0.29	0.03	0.03	0.01	—	0.06	0.02	0.02	0.02	0.06	0.04	0.60	0.08	0.18	0.12
韩国	0.32	0.09	0.01	0.02	0.07	—	0.01	0.02	0.02	0.01	0.10	0.67	0.07	0.13	0.22
马来西亚	0.19	0.10	0.02	0.01	0.06	0.04	—	0.01	0.14	0.05	0.03	0.64	0.10	0.12	0.25
菲律宾	0.17	0.11	0.01	0.01	0.13	0.11	0.03	—	0.07	0.04	0.02	0.69	0.08	0.11	0.26
新加坡	0.14	0.12	0.04	0.02	0.05	0.05	0.12	0.03	—	0.03	0.02	0.62	0.08	0.12	0.21
泰国	0.18	0.04	0.03	0.03	0.18	0.03	0.05	0.03	0.03	—	0.04	0.64	0.08	0.10	0.32
越南	0.25	0.08	0.02	0.02	0.09	0.21	0.03	0.01	0.03	0.03	—	0.63	0.16	0.14	0.20

续表

X 对 \ Y 依赖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亚洲	0.20	0.08	0.02	0.02	0.06	0.07	0.04	0.02	0.03	0.02	0.04	0.60	0.09	0.13	0.20
EU27	0.08	0.01	0.00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1	0.15	0.60	0.07	0.05
USMCA	0.19	0.01	0.00	0.02	0.04	0.03	0.03	0.01	0.01	0.01	0.01	0.36	0.10	0.41	0.32
CPTPP	0.20	0.05	0.02	0.01	0.03	0.04	0.04	0.02	0.02	0.03	0.02	0.48	0.08	0.32	0.1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9 2001—2019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工厂依存度情况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	0.51	0.52	0.51	0.49	0.48	0.47	0.46	0.45	0.46	0.46	0.45	0.46	0.46	0.45	0.52	0.45	0.45	0.44	0.44
中国香港	0.67	0.70	0.73	0.73	0.74	0.74	0.75	0.75	0.76	0.77	0.76	0.77	0.77	0.77	0.78	0.76	0.78	0.78	0.78
印度尼西亚	0.57	0.58	0.60	0.60	0.62	0.58	0.59	0.68	0.67	0.69	0.69	0.69	0.68	0.70	0.69	0.72	0.74	0.74	0.73
印度	0.26	0.25	0.29	0.28	0.32	0.32	0.34	0.35	0.38	0.35	0.35	0.35	0.36	0.37	0.41	0.41	0.43	0.43	0.44
日本	0.45	0.48	0.51	0.52	0.52	0.52	0.53	0.54	0.57	0.58	0.58	0.60	0.60	0.60	0.59	0.58	0.60	0.60	0.59
韩国	0.49	0.52	0.55	0.53	0.54	0.55	0.55	0.56	0.57	0.58	0.58	0.60	0.61	0.61	0.63	0.63	0.66	0.67	0.67
马来西亚	0.55	0.57	0.57	0.57	0.58	0.57	0.59	0.58	0.63	0.63	0.63	0.65	0.64	0.62	0.63	0.62	0.64	0.64	0.64
菲律宾	0.50	0.51	0.55	0.57	0.58	0.57	0.58	0.60	0.58	0.49	0.32	0.64	0.65	0.64	0.64	0.68	0.69	0.69	0.69
新加坡	0.59	0.61	0.64	0.63	0.63	0.63	0.65	0.65	0.67	0.66	0.65	0.64	0.63	0.63	0.65	0.65	0.65	0.62	0.59
泰国	0.57	0.60	0.64	0.64	0.66	0.66	0.66	0.66	0.66	0.67	0.67	0.67	0.66	0.66	0.66	0.66	0.70	0.64	0.64
越南	0.65	0.63	0.65	0.67	0.69	0.73	0.73	0.72	0.69	0.71	0.71	0.66	0.66	0.64	0.63	0.63	0.63	0.63	0.6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3.2.2 零部件产品竞争优势依然在东亚

本小节描述了亚洲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产品中的竞争优势的演变。使用了 22 种最主要的零部件产品，计算了一个经济体进出口的特定中间产品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份

额。如果一个经济体在此中间投入中具有较高的贸易份额，则表明该经济体在该产品上可能具有竞争优势，表 3.10 和表 3.11 显示了 2019 年和 2018 年的计算结果。

2019 年，排名前 22 位零部件产品出现

了一些变化，其中，SITC 77812（蓄电池）和 SITC 8931（货物运输或包装用塑料制品）是新进入到排名前 22 位零部件产品中，而 SITC 7239（土木工程和建筑承包业务机械和设备）和 SITC 7788（未另列明的电动机械和设备及零件和附件（如电磁铁等）这两种零部件产品退出排名前 22 位。

表 3.10 和表 3.11 显示珠宝（SITC 667）主要依赖印度和中国香港，这可能意味着印度和中国香港在该产品类别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中具有竞争优势，但是，从 2017 年到 2019 年，SITC 667 对印度的依存度从 0.28 下降到 0.19，对中国香港的依存度也从 0.22 下降到 0.15。

新加坡仍是 SITC 714（涡轮喷气发动机或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及其零件）和 SITC 7929（飞机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2018 年至 2019

年，SITC 714 对新加坡的依存度从 0.09 上升到 0.10，其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新加坡在 SITC 7929（飞机零部件）的竞争优势也在提高，从 2018 年的 0.07 上升到 2019 年的 0.08。总体上看，SITC 7929 主要依赖欧盟，其依存指数为 0.34。2019 年，日本、韩国在亚洲工厂中的主导地位仍然非常有限。如表 3.10 所示，只有 SITC 713（活塞内燃机）是唯一对日本的依赖程度最高的产品，该指数为 0.06。然而，与 2018 年相比，日本零部件产品的竞争优势分布没有变化。

在 22 种最主要的零部件产品中，2019 年中国有 18 种零部件产品占据主导地位（见表 3.12）。这表明，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在零部件贸易中往往具有广泛的竞争优势。

表 3.10 2019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EU27、USMCA、CPTPP 的依存度

Y 依赖 X 对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625	0.10	0.00	0.01	0.01	0.04	0.03	0.01	0.00	0.00	0.04	0.01	0.27	0.36	0.19	0.15	0.27
641	0.06	0.00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19	0.47	0.16	0.13	0.18
65	0.25	0.02	0.02	0.04	0.03	0.03	0.01	0.00	0.00	0.01	0.05	0.46	0.24	0.11	0.13	0.42
667	0.04	0.15	0.00	0.19	0.01	0.00	0.00	0.00	0.01	0.02	0.00	0.43	0.11	0.18	0.04	0.10
67	0.10	0.00	0.02	0.03	0.05	0.05	0.01	0.01	0.01	0.02	0.02	0.32	0.37	0.10	0.14	0.30
691	0.15	0.01	0.01	0.01	0.03	0.03	0.01	0.01	0.01	0.01	0.01	0.28	0.40	0.11	0.12	0.28
699	0.12	0.01	0.01	0.02	0.02	0.02	0.01	0.00	0.01	0.02	0.01	0.26	0.39	0.18	0.13	0.25
713	0.06	0.00	0.01	0.01	0.06	0.02	0.00	0.00	0.02	0.02	0.00	0.22	0.39	0.25	0.20	0.21
714	0.04	0.06	0.00	0.02	0.04	0.01	0.00	0.00	0.10	0.00	0.00	0.28	0.31	0.19	0.21	0.20
747	0.14	0.00	0.01	0.02	0.04	0.02	0.01	0.00	0.02	0.01	0.01	0.27	0.35	0.21	0.14	0.26
748	0.11	0.00	0.01	0.02	0.06	0.02	0.01	0.00	0.01	0.01	0.00	0.26	0.40	0.21	0.17	0.25
759	0.22	0.19	0.00	0.01	0.02	0.07	0.02	0.02	0.04	0.02	0.01	0.61	0.14	0.20	0.14	0.42
764	0.23	0.12	0.01	0.02	0.03	0.03	0.01	0.00	0.02	0.01	0.06	0.53	0.19	0.15	0.17	0.41

续表

Y 依赖 X 对	中国	中国 香港	印度 尼西 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 宾	新加 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772	0.16	0.08	0.01	0.01	0.04	0.04	0.02	0.01	0.02	0.02	0.02	0.42	0.31	0.17	0.18	0.34
773	0.11	0.03	0.01	0.01	0.04	0.02	0.01	0.02	0.01	0.01	0.03	0.30	0.33	0.21	0.18	0.27
776	0.29	0.19	0.00	0.01	0.04	0.08	0.05	0.02	0.09	0.01	0.03	0.82	0.09	0.08	0.24	0.62
77812	0.19	0.06	0.01	0.02	0.05	0.07	0.01	0.00	0.01	0.01	0.03	0.47	0.31	0.13	0.16	0.40
784	0.07	0.00	0.01	0.01	0.05	0.03	0.00	0.00	0.00	0.02	0.00	0.21	0.43	0.25	0.18	0.20
7929	0.03	0.01	0.00	0.01	0.04	0.01	0.02	0.01	0.08	0.00	0.01	0.22	0.34	0.19	0.21	0.22
813	0.34	0.01	0.00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1	0.41	0.29	0.18	0.09	0.40
8211	0.17	0.00	0.01	0.00	0.02	0.01	0.01	0.00	0.00	0.01	0.02	0.26	0.37	0.26	0.15	0.26
8931	0.10	0.01	0.01	0.01	0.03	0.02	0.01	0.00	0.01	0.02	0.02	0.24	0.38	0.21	0.17	0.2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1 2018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EU27、USMCA、CPTPP 的依存度

Y 依赖 X 对	中国	中国 香港	印度 尼西 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 宾	新加 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625	0.10	0.00	0.01	0.01	0.04	0.03	0.01	0.00	0.00	0.03	0.01	0.26	0.38	0.19	0.14
641	0.06	0.00	0.02	0.02	0.02	0.02	0.01	0.00	0.01	0.01	0.01	0.19	0.48	0.16	0.12
65	0.26	0.03	0.02	0.04	0.03	0.03	0.01	0.00	0.00	0.01	0.04	0.47	0.27	0.12	0.08
667	0.04	0.15	0.00	0.19	0.01	0.00	0.00	0.00	0.01	0.02	0.00	0.42	0.12	0.18	0.03
67	0.10	0.00	0.02	0.03	0.05	0.05	0.01	0.01	0.01	0.02	0.01	0.31	0.39	0.11	0.12
691	0.13	0.01	0.01	0.01	0.03	0.03	0.01	0.01	0.01	0.01	0.01	0.26	0.42	0.11	0.11
699	0.12	0.01	0.01	0.02	0.02	0.03	0.01	0.00	0.01	0.02	0.01	0.26	0.42	0.18	0.12
713	0.06	0.00	0.01	0.01	0.07	0.02	0.00	0.00	0.01	0.03	0.00	0.22	0.40	0.25	0.19
714	0.03	0.04	0.00	0.02	0.05	0.01	0.00	0.00	0.09	0.01	0.00	0.25	0.31	0.18	0.21
7239	0.10	0.00	0.02	0.02	0.05	0.04	0.01	0.00	0.05	0.01	0.00	0.30	0.31	0.20	0.20
747	0.14	0.00	0.01	0.01	0.04	0.02	0.01	0.00	0.01	0.01	0.01	0.27	0.36	0.22	0.14
748	0.12	0.00	0.01	0.02	0.06	0.02	0.01	0.00	0.01	0.01	0.00	0.27	0.41	0.21	0.17
759	0.28	0.19	0.01	0.02	0.04	0.06	0.02	0.01	0.03	0.02	0.00	0.66	0.16	0.13	0.11
764	0.22	0.11	0.00	0.01	0.03	0.02	0.01	0.00	0.02	0.01	0.05	0.48	0.22	0.21	0.13

续表

Y 依赖 X 对	中国	中国 香港	印度 尼西 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 亚	菲律 宾	新加 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772	0.16	0.08	0.01	0.01	0.05	0.04	0.02	0.01	0.02	0.02	0.01	0.43	0.32	0.17	0.16
773	0.12	0.03	0.01	0.01	0.04	0.03	0.01	0.01	0.01	0.01	0.02	0.29	0.35	0.22	0.16
776	0.27	0.19	0.00	0.01	0.04	0.10	0.06	0.02	0.10	0.01	0.01	0.82	0.09	0.08	0.22
7788	0.16	0.04	0.01	0.02	0.04	0.02	0.02	0.01	0.01	0.02	0.01	0.37	0.32	0.17	0.15
784	0.08	0.00	0.01	0.01	0.05	0.03	0.00	0.00	0.01	0.02	0.00	0.21	0.44	0.25	0.17
7929	0.03	0.01	0.00	0.01	0.03	0.01	0.02	0.01	0.07	0.00	0.00	0.21	0.36	0.18	0.18
813	0.31	0.01	0.00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38	0.30	0.20	0.09
8211	0.17	0.00	0.01	0.00	0.02	0.01	0.01	0.00	0.00	0.01	0.01	0.24	0.38	0.28	0.1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2 2019 年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零部件产品清单

序号	SITC 编码	零部件产品名称
1	625	各种车轮用的橡胶轮胎、可换外胎、轮胎垫带及内胎
2	641	纸和纸板
3	65	纱线、纺织品及制成品材料
4	67	钢铁材料
5	691	未另列明的钢铁或铝结构物及其部件
6	699	未另列明的贱金属制品及零件
7	747	管子、锅炉外壳、槽、桶及类似物品用的龙头、旋塞、阀门等
8	748	传动轴和曲柄，轴承箱和普通轴承；齿轮和齿轮装置等
9	759	办公用机器和其他器材零件和附件
10	764	电信设备的零部件
11	772	开关装置零部件
12	773	未另列明的配电设备如电线、电缆、绝缘配件等
13	776	电子元件如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
14	77812	蓄电池
15	784	汽车及零部件
16	813	照明设备及配件
17	8211	座具（如飞机、汽车座位等）
18	8931	货物运输或包装用塑料制品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http://unstats.un.org/unsd/>。

第4章

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

4.1 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情况

本章旨在分析亚洲服务贸易一体化情况。本节使用基于增加值服务出口的分解模型进行分析。资料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2020年版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采用增加值分解方法对25个经济体¹的服务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探讨服务行业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由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殊性,服务业间接的增加值出口既是当今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在制造业的生产分工和产品的出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首先对所选取的经济体服务业的出口情况进行简要的分析,然后分别从需求和制造业生产分工的视角,研究服务业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

表4.1为利用两种统计口径(通常统计和增加值)核算出的25个经济体2019年服务业的出口及其目的地的构成,同时也列出

了2010—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在此,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把25个经济体内部之间的出口简称为区域内出口,对其他经济体的出口简称为区域外出口。首先,从服务业出口额来看,2019年25个经济体合计出口服务17,946亿美元,其中出口到区域内4,133亿美元(占23.0%),出口到区域外13,813亿美元(占77.0%)。但出口到区域内服务在2010—2019年年均增长5.4%,比出口到区域外的增长率4.3%高出1.1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区域外而言,通过服务贸易这25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在加强。其次,从增加值贸易角度来看,25个经济体总计出口到区域内的服务业增加值为7,670亿美元,是服务出口额的1.86倍。而出口到区域外的服务业增加值为17,240亿美元,是相应的服务出口额的1.25倍。如果考察增长率和份额,出口到区域内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5%,比后者高出1.6个百分点,而且份额上升明显,提升到了30.8%。

1. 25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孟加拉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老挝、文莱、不丹、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马尔代夫、尼泊尔、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以及与亚洲经济体有密切贸易联系的澳大利亚。

表 4.1 2019 年 25 个经济体服务业出口总额及增加值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经济体	服务业出口总额						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总额					
	出口		区域内出口		区域外出口		增加值出口		区域内出口		区域外出口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澳大利亚	877	4.7	423	6.5	454	3.3	1,444	4.6	774	5.4	671	3.7
中国	4,689	5.2	675	3.3	4,013	5.5	9,055	8.1	2,114	9.2	6,941	7.8
印度尼西亚	111	-3.6	75	0.7	36	-9.1	361	1.0	199	3.7	161	-1.5
印度	1,444	0.3	275	4.4	1,170	-0.5	2,059	3.5	506	6.6	1,552	2.7
日本	1,526	-2.5	279	-0.9	1,247	-2.8	2,912	-0.7	1,018	1.1	1,894	-1.6
韩国	850	5.1	348	6.6	502	4.1	1,580	4.4	721	6.5	859	2.9
中国台湾	796	5.1	281	6.6	515	4.3	804	3.4	336	4.8	469	2.6
孟加拉国	61	11.9	2	18.1	59	11.7	138	9.1	17	14.0	121	8.6
马来西亚	409	2.1	82	0.1	327	2.6	617	4.0	185	5.6	433	3.4
菲律宾	489	11.0	163	8.2	326	12.7	431	8.3	157	7.3	274	8.9
泰国	1,013	12.2	464	11.9	549	12.5	1,107	10.8	560	11.7	547	9.9
越南	695	22.8	146	9.8	549	31.6	772	23.6	231	16.8	542	28.2
哈萨克斯坦	186	3.6	9	2.3	178	3.7	230	2.2	33	2.9	197	2.1
蒙古国	19	12.1	3	10.8	16	12.4	22	12.3	9	13.3	13	11.7
斯里兰卡	60	6.4	13	7.0	47	6.2	61	6.0	15	8.0	46	5.4
巴基斯坦	59	2.2	26	3.9	33	1.1	77	1.4	29	3.9	49	0.2
老挝	13	23.0	3	17.3	11	25.0	13	20.1	4	17.9	10	21.1
文莱	6	-0.7	5	-0.5	1	-1.5	5	-2.5	4	-2.1	2	-3.5
不丹	3	8.5	1	6.2	2	11.1	2	7.6	1	6.5	1	8.8
吉尔吉斯斯坦	7	9.2	2	9.8	5	8.9	8	7.9	2	10.5	6	7.1
柬埔寨	44	11.1	6	7.9	38	11.7	35	12.0	7	13.5	28	11.7
马尔代夫	34	7.7	5	9.0	28	7.4	21	7.4	5	9.9	16	6.8
尼泊尔	11	5.3	6	5.7	6	5.0	9	4.6	5	5.4	5	3.8
新加坡	2,680	7.7	537	8.3	2,144	7.6	1,747	7.7	462	8.7	1,286	7.4
中国香港	1,862	4.3	304	3.7	1,558	4.5	1,397	4.4	277	5.7	1,120	4.1
合计	17,946	4.5	4,133	5.4	13,813	4.3	24,910	5.4	7,670	6.5	17,240	4.9

注：年均增长率为 2010—2019 年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0 年版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计算。

从各经济体的数据来看，出口到区域内的服务业出口额的增长率中只有 14 个经济体的增长率高于出口到区域外的增长率。当以增加值口径来衡量时，却有 21 个经济体的（出口到区域内的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率高于出口到区域外的同一指标。

依据对表 4.1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出口额口径还是从增加值口径，25 个经济体服务贸易相互间联系在增强，其增速超出了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联系。服务业的间接增加值贸易在这一联系增强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下将分别从需求和生产分工合作的视角对服务业这种作用做出较为具体的分析。

表 4.2 和表 4.3 分别是对最终产品（或服务）和制造业出口额进行增加值分解的主

要结果。首先，我们对这两个表进行简单的说明。表 4.2 为 25 个经济体 2019 年的最终需求总额及其中对服务业的需求总额，同时又单独列出了对境外服务的需求及其区域构成情况。在这里，最终需求总额直接取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而对服务的需求则是以增加值为基准，即是对最终需求总额进行增加值分解得到的服务业增加值。通过对表 4.2 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从需求的视角来了解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的一体化程度。对上述 25 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出口额进行增加值的分解，提取出其中所包含的服务业增加值并列在表 4.3 之中。通过对表 4.3 中数据的解读，我们可以从制造业生产分工的视角了解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表 4.2 2019 年 25 个经济体对服务的需求及其构成

单位：亿美元，%

经济体	最终需求总额		对服务的需求		对海外服务的需求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区域外份额	区域内份额
澳大利亚	12,708	0.6	10,194	1.1	1,143	3.6	62.2	37.8 (-1.3)
中国	142,324	10.8	86,786	13.0	8,514	10.0	74.5	25.5 (-7.0)
印度尼西亚	11,092	4.9	6,634	6.1	729	4.7	53.3	46.7 (1.2)
印度	28,652	5.6	17,880	6.5	1,662	4.9	67.6	32.4 (4.4)
日本	50,762	-0.5	38,222	-0.7	2,822	4.0	58.6	41.4 (5.3)
韩国	15,420	5.2	10,608	5.7	1,679	6.8	66.2	33.8 (-1.5)
中国台湾	5,308	3.2	3,721	3.2	727	4.2	64.8	35.2 (-3.4)
孟加拉国	3,109	11.4	1,932	11.6	208	10.1	35.6	64.4 (6.6)
马来西亚	3,334	5.3	2,042	5.5	552	4.8	58.3	41.7 (7.4)
菲律宾	4,027	7.9	2,566	9.0	502	12.9	56.5	43.5 (-1.5)
泰国	5,062	4.9	3,215	6.5	540	1.8	60.3	39.7 (-0.1)
越南	2,416	8.2	1,114	8.2	594	15.7	48.8	51.2 (-1.5)
哈萨克斯坦	1,494	2.5	999	2.8	177	1.5	77.4	22.6 (1.3)
蒙古国	136	6.8	70	7.1	29	13.1	56.0	44.0 (-0.3)

续表

经济体	最终需求总额		对服务的需求		对海外服务的需求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区域外份额	区域内份额
斯里兰卡	889	5.0	583	5.3	68	3.8	37.3	62.7 (2.6)
巴基斯坦	2,749	4.7	1,548	4.9	181	6.1	49.8	50.2 (6.9)
老挝	195	12.7	112	14.2	31	23.6	41.7	58.3 (-2.7)
文莱	126	4.8	74	4.2	25	9.4	71.1	28.9 (-7.4)
不丹	29	4.3	16	4.8	5	3.5	52.3	47.7 (-6.0)
吉尔吉斯斯坦	94	5.3	55	6.1	17	4.9	68.5	31.5 (6.6)
柬埔寨	272	10.0	149	12.8	35	12.0	33.3	66.7 (10.6)
马尔代夫	56	10.5	38	9.2	14	8.6	59.7	40.3 (4.3)
尼泊尔	350	7.0	188	7.7	48	11.8	32.9	67.1 (1.9)
新加坡	2,501	5.0	1,682	4.4	674	9.0	59.1	40.9 (4.5)
中国香港	3,491	5.3	3,076	6.0	1,004	5.4	46.6	53.4 (4.6)
合计	296,599	5.8	193,505	6.2	21,979	7.0	65.1	34.9 (-1.3)

注：年均增长率为 2010—2019 年年均增长率；“区域内份额”一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 2019 年的份额相对 2011 年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0 年版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计算。

表 4.3 2019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出口服务业增加值的含量及其构成

单位：亿美元，%

经济体	制造业出口总额		服务业增加值含量		海外服务业增加值含量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区域外份额	区域内份额
澳大利亚	714	-1.0	250	1.4	46	1.9	62.4	37.6 (2.6)
中国	20,917	4.8	6,558	8.0	887	1.5	64.2	35.8 (-0.7)
印度尼西亚	1,633	3.5	338	3.8	94	5.3	58.0	42.0 (-4.2)
印度	2,797	7.2	930	8.9	186	7.5	71.0	29.0 (1.6)
日本	7,333	1.5	2,028	1.5	395	5.2	60.8	39.2 (2.8)
韩国	5,678	2.3	1,477	3.4	519	3.0	59.9	40.1 (-1.9)
中国台湾	3,108	1.9	542	1.1	312	1.6	45.8	54.2 (5.6)
孟加拉国	400	11.0	115	9.9	31	18.5	46.4	53.6 (-6.2)
马来西亚	1,836	1.2	502	3.1	172	-1.4	56.6	43.4 (9.5)

续表

经济体	制造业出口总额		服务业增加值含量		海外服务业增加值含量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区域外份额	区域内份额
菲律宾	569	6.6	116	4.5	52	12.9	50.8	49.2 (1.0)
泰国	1,555	3.8	476	4.3	142	0.8	58.9	41.1 (-0.2)
越南	1,197	12.3	270	14.9	119	13.8	40.9	59.1 (1.8)
哈萨克斯坦	153	1.4	34	4.0	4	5.2	81.6	18.4 (-0.2)
蒙古国	4	11.0	1	12.2	0	16.5	51.4	48.6 (1.5)
斯里兰卡	61	-0.6	13	-0.2	3	-3.8	38.3	61.7 (10.5)
巴基斯坦	168	1.5	30	0.7	5	4.9	54.5	45.5 (3.0)
老挝	10	16.4	2	20.0	0	13.6	32.2	67.8 (24.6)
文莱	29	-2.0	2	-0.8	1	5.3	69.6	30.4 (5.5)
不丹	1	0.1	0	-0.8	0	0.8	42.1	57.9 (2.5)
吉尔吉斯斯坦	13	3.3	2	6.8	1	-0.6	58.3	41.7 (13.2)
柬埔寨	67	13.7	13	13.0	8	14.7	18.9	81.1 (20.9)
马尔代夫	1	22.0	0	27.5	0	21.6	66.4	33.6 (-17.2)
尼泊尔	4	3.2	1	1.0	0	5.7	32.3	67.7 (-0.1)
新加坡	2,026	3.7	515	4.3	285	1.5	57.0	43.0 (6.0)
中国香港	167	0.8	83	0.7	67	2.9	51.7	48.3 (2.7)
合计	50,439	3.6	14,299	5.4	3,330	2.8	58.7	41.3 (2.0)

注：年均增长率为 2010—2019 年的年均增长率；“区域内份额”一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 2019 年的份额相对 2011 年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0 年版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计算。

表 4.2 的最后一行的合计显示，2019 年 25 个经济体的最终需求总额为 296,599 亿美元，其中对服务业的需求额为 193,505 亿美元，对境外服务业增加值的需求额为 21,979 亿美元，相应的（2010—2019 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5.8%、6.2% 和 7.0%。可以看出，在整个最终需求中，对服务业需求的增速高于对货物需求的增速，对境外服务需求的增速高于对本地服务需求的增速。然而，在对境外服务的需求中对区域内服务需求所占的份

额在 2019 年为 34.9%，相对于 2010 年减少了 1.3 个百分点。

在表 4.3 最后一行的合计中，制造业的出口总额、服务业增加值含量和境外服务业增加值含量三项在金额上都分别低于表 4.2 最后一行的最终需求总额、对服务业（增加值）的需求和对境外服务业增加值的需求，其相应的年均增长率也相应地低了不少。但是，在整个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境外服务业增加值当中，区域内服务业增加值所占的份额

为 41.3%，相对于 2010 年提高了 2 个百分点。

通过表 4.2 和表 4.3 的对比分析，可以知道 25 个经济体区域内的服务贸易相互之间的联系在加强，而且这种加强的趋势是在本区域内制造业的生产分工过程中服务业的参与不断增多所导致的结果。

上面是基于 2019 年的数据所做出的分析。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贸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今后一两年时间内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服务贸易能否继续维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在世界经济体增长受阻或衰退的情况下，很难期待需求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增长能有多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疫情仍在持续的背景下，旅游业这类直接的服务贸易属于受到严重冲击的行业。相对来讲，参与制造业分工的那些间接的服务贸易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小些。在以往正常情况下，间接的服务贸易本身就是带动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疫情期间也是

维持服务贸易和国际分工以及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的关键所在。在制造业生产分工细化后，生产性服务活动可以将分散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制造生产环节连接在一起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促进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和增长。同时，这些服务环节本身也是创造价值，甚至是布局、形成或掌控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另外，能否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是其制造业能否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制造业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制造生产环节的成本很难再降低的情况下，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

4.2 亚洲数字贸易发展

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数字革命”，在国际贸易领域，国际分工不断从物理世界延伸到数字世界，数字贸易¹变得愈加重要。数字贸易的分类与解释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数字贸易的分类与解释

	产业类别	具体解释
数字贸易	保险服务	保险载体及相关活动、直接保险（航空险、生命险）、辅助保险等
	金融服务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金融中介服务和其他金融服务等
	知识产权使用费	特许经营权和商标使用费、调查研究结果的使用权、复制和使用计算机软件、视听产品的使用权以及教育服务等
	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	软件、社交媒体、通信、数据处理服务（云计算）、卫星定位和其他信息服务等
	其他商业服务	其他通过互联网交付的商业服务，如科学技术支持服务、其他管理咨询服务等

注：参考美国政府机构美国经济分析局（USBEA，2016）的做法，并由作者整理得到。

近年来，数字贸易高速增长，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2020 年）》，2019 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规模

达到 4,914.7 亿美元，占服务出口额的 52.0%，占全部出口额的 12.9%。在 2018 年以前，亚洲数字贸易逐渐觉醒，并且随着亚洲

1. 目前对于数字贸易，主要认为其是指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如下几类：（1）保险服务；（2）金融服务；（3）知识产权使用费；（4）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5）其他商业服务。具体如表 4.4 所示。

地区数字技术不断突破与高科技企业的不断涌现,亚洲的数字贸易业态与应用场景也逐渐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亚洲数字贸易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亚洲也孕育并诞生了一些科技独角兽企业,它们不断助推亚洲数字贸易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也加速了亚洲贸易的数字化进程,各经济体与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亚洲数字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巨大机会。数字贸易增强了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力与发展动力,极大地推动了亚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数字贸易还增进了亚洲各经济体间的相互关联,进而提升了亚洲内部成员间的合作潜力。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的数字连接使得区域间的贸易合作更加顺畅与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深度。

4.2.1 亚洲数字贸易快速发展

亚洲的数字贸易实践发展较快,亚洲数字贸易业态在全球单边主义思潮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仍然具有相对旺盛的生命活力。数字贸易主要表现为数字产品与服务,以及新兴变革型数字技术等内容,例如,应用程序、软件、视频服务、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以及大数据等,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亚洲地区2019年计算机服务出口额约为1,721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31.52%,增长率为12.21%;在通信服务出口方面,2019年亚洲的出口额约为258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量的28.85%,增长率为11.03%;在信息服务出口方面,2019年亚洲的出口额约为48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量的11.34%,增长率约为12.85%。以上数据充分表明亚洲数字贸易在整体上有较好的发展。从具体应用场景方面来看,亚洲数字贸易也有多元、快速的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亚洲区域科技金融不断突破,贸易融资数字化程度飞速提升;在生活领域,在线视频、游戏音乐等线上娱乐进一步发展,亚洲对包括直播在内的订阅服务的使用越来越密集,亚洲消费者对直播和流媒体的

服务需求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而在传统生活领域,在线医疗、在线教育与在线咨询等也都迎来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亚洲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亚洲数字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支撑以及各经济体的积极治理。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不断演化发展,最终在国际贸易领域自然延展的结果,伴随着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普及,亚洲数字经济增长在全球表现良好。亚洲地区已经逐渐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数字工厂转变为依靠创新产业的数字中心,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相对应,数字贸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淡马锡、谷歌以及贝恩咨询发布的《2020年电子经济之海:东南亚全速发展》显示,在东南亚的六个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中,互联网用户已经从2015年的2.6亿扩大到2020年的5亿;在人口数量方面,亚洲地区稠密的人口数量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支撑,它拥有全世界近60%的人口,亚洲地区具有大量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例如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绝对用户数量很高,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将会释放出更大的数字贸易市场潜力,进而助推亚洲数字贸易发展;最后,亚洲经济体政府层面积极推进数字贸易治理,这极大推动了亚洲数字贸易发展,在亚洲区域的互联网提供商越来越发现,随着规范其商业行为的监管与规则更加统一、公开与透明,亚洲的数字贸易活动也相应地更加活跃。

4.2.2 亚洲内部数字贸易发展差距较大

亚洲数字贸易总量上的发展并没有解决区域内部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亚洲内部各经济体在数字贸易发展方面具有较大差距。数字贸易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规模状况息息相关。尽管亚洲整体的数字经济增长较快,在数字经济的规模上仅次于美国,但是亚洲区域存在

的“数字鸿沟”现象仍然严重。一方面，亚洲区域地理庞大，内部经济体在众多方面存在差异，由于民族文化与习惯等多方面影响，亚洲一些经济体缺乏基本的数字经验，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技术焦虑，最终形成了对于数字技术与数字贸易的心理接触鸿沟；另一方面，一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决定民间社会拥有的数字基础设施，亚洲区域内部的一些经济体仍存在接触电脑、智能手机与互联网等基本数字设备的物理障碍，物理接触鸿沟也限制了数字贸易的发展。具体而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是支撑数字贸易规模的重要产业，是数字经济不断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但是亚洲区域内部仍有很多地区没有建成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比如中亚五国以及南亚大部分国家等。

在亚洲区域内“数字鸿沟”的背景下，亚洲内部的数字贸易发展差距也相应较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南亚与东亚的计算机服务出口在亚洲区域数额较大，在2019年，南亚与东亚的计算机服务出口额分别为638亿和629亿美元，与之相比，西亚与东南亚地区的计算机服务出口则要少了许多，二者在2019年以计算机服务出口来衡量的数字贸易额分别为240亿和211亿美元，仅约占南亚与东亚地区的三分之一。中亚地区的数字贸易额则是更少。从增长率角度来看，东亚地区的2019年数字贸易出口增长最为迅速，高达16%，而东南亚地区的增长率只有2%。

此外，亚洲内部数字贸易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区域层面，更加体现在单个经济体层面。以计算机服务出口为例，印度、中国、新加坡、菲律宾、日本和韩国六个经济体在2019年的出口额均超过10亿美元，其中，印度和中国高达618亿和513亿美元，然而，其余的亚洲经济体均不超过10亿美元，由此可见，亚洲内部数字贸易发展差距确实较大。在亚洲众多经济体中，新加坡是全球的贸易和金融枢纽，其一直处于贸易数字化的最前

沿，在数字贸易的实践与治理方面均高度发达，走在亚洲乃至世界前列。例如，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与新加坡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IMDA）签署意向备忘录（MOA），来加速全球贸易数字化，并与国际上的多个合作伙伴合作，开发一个互操作性框架TradeTrust，以在不同社区之间无缝有效地交换数字化贸易文档，进而提升贸易效率。

4.2.3 亚洲不同数字贸易业态发展水平各异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即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其发展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从业态角度可以分为：一是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包括软件、社交媒体、搜索引擎、通信、云计算、卫星定位等内容；二是数字内容服务贸易，包括金融保险、知识产权、数字传媒、数字娱乐、数字学习、数字出版等内容。据此，数字贸易可进一步简单概括为计算机服务、通信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方面。亚洲数字贸易整体具有较为稳定的增长，但其不仅在地理区域层面具有发展差异，在数字贸易的具体业态方面也具有一定差异。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亚洲地区计算机服务出口最为繁荣，出口额占世界总量的约三分之一，其次是通信服务出口，在2019年出口数额为258亿美元，约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8.85%，出口增长率达到11.03%，并且从具体国家来看，印度、中国、新加坡、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以及泰国在通信服务出口方面具有较好表现。

与计算机服务出口和通信服务出口相比，亚洲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出口相对较弱。

在知识产权使用费方面，其包含商标使用权、软件以及视听产品使用权等内容，是数字贸易的重要表现领域，亚洲2019年在此方面的出口额约占世界的19.50%，总出口数额达到797亿美元，但是亚洲2019年在此领域的增长较为缓慢，仅有3.7%，其中，

东亚地区是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的主要贡献者，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是此领域的亚洲引领者。

在信息服务出口方面，数字贸易依托于量级巨大的跨境数据流动，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信息服务出口，亚洲的信息服务出口部门发展相对缓慢，2019年出口数额只占世界总额的10%左右，具体为48亿美元，由此可知，亚洲数字贸易在信息产业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上升空间，从具体经济体来看，韩国的信息服务出口在亚洲遥遥领先，新加坡与日本也有相对较好的发展，但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信息服务贸易还有待提升。

在金融服务方面，亚洲出现了越来越多解决数字金融问题的手段与程序，亚洲的金

融银行业在数字贸易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亚洲的贸易融资部门长期以来一直拥护数字化与自动化转型，例如，贸易融资网络Voltron更名为Contour，选择新加坡作为基地并开始商业化运营；渣打银行投资了中国的区块链供应链平台Linklogis。此外，在数字贸易的支付方面，亚洲地区使用数字支付解决方案的人数激增，凯捷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世界支付报告》显示，2019年亚太地区超过欧洲和北美，成为非现金交易额的领先者，高达2,346亿美元，并预计2023年将达到4,932亿美元。其中，受智能手机、数字钱包以及二维码支付使用的增加，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经济体将成为数字支付领域的主要推动者。

亚洲数字贸易发展的推动因素¹

一、数字技术进步不断引领亚洲数字贸易

数字贸易发展需要具有较强的数字技术支撑，并且随着数字贸易深入发展，数字技术也需要不断更新迭代。TradeTech是指与国际贸易高度相关的数字科技，其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来促进贸易活动发展。与数字贸易高度相关。目前，TradeTech主要包括的技术有区块链、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金融科技（FinTech）以及5G等。目前亚洲的数字技术不断进步，TradeTech具有较好发展基础。亚洲具有较强的数字创新活力，科技创新研究一直是新加坡、新西兰、韩国与中国等国家的优先事项。并且，亚洲拥有充足的风险投资来支持科技创新与创业，在创业风险投资方面，中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亚洲的风险投资约占全球的一半，是虚拟现实、无人驾驶、3D打印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风险投资的最重要来源地和目的地之一。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正在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开创全新的产品与服务。

亚洲地区的TradeTech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引领亚洲的数字贸易进程。首先，互联网作为最底层的数字技术，对亚洲贸易的形式产生了极大改变，其在服务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了亚洲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例如金融、物流以及教育服务等领域。此外，互联网简化了亚洲区域的贸易与供应链，极大提升了贸易的效率。新加坡政府启动了网络化贸易平台，该平台旨在成为供物流公司、供应商、金融机构以及客户等各方参与者进行观察分析的一站式平台，并可以管理与数字贸易有关的任务。其次，在区块链技术方面，区块链可以极大推动贸易融资数字化，其可以用来制作“智能合约”，以取代贸易融资中的纸质文件，实现实时可视性，并提供安全、数字化、去中心化的文档交换平台，进而降低贸易风险。

1.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绘制贸易科技：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贸易》，2020年12月。

对于区块链计划，亚洲正在引领潮流。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启动了基于区块链的贸易融资平台 eTradeConnect，该平台旨在将贸易文件数字化并实现贸易融资流程数字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参与开发的基于区块链的全球贸易连接网络（GTCN），旨在建立跨边界的区块链基础设施，以帮助降低贸易融资的成本。

在人工智能方面，AI 涉及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虚拟助手等多项认知技术，其在分析数据和识别模式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可以在贸易中识别交易的合法性，并对贸易流量进行检测分析，在未来的数字贸易中将会具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在 AI 发展运用方面，中国已将发展人工智能作为重要战略之一；韩国与新加坡也在国家层面推进人工智能的能力培养；土耳其则建立了基于人工智能的 Easy Export 平台，来为潜在出口商提供针对主要目标市场的方案建议，进而对其出口的产品进行评估；新加坡还与渣打银行启动了 Trade AI Engine 项目，这是与 IBM 合作开发的联合解决方案，其旨在提高贸易运营效率以及加强运营控制，进而增强客户在贸易文件处理方面的经验，并且，该方案目前主要在亚洲实施。5G 也将极大推动亚洲数字贸易发展，下一代无线网络 5G 的特点是大规模的机器通信、增强的移动宽带以及降低延迟等，5G 的部署将会显著改善在线服务的体验，极大促进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给零售、娱乐以及教育、医疗等各领域都带来贸易效率提升，亚洲地区的数字贸易量将会随着 5G 的部署而进一步增加。

二、数字科技企业推动亚洲数字贸易发展

数字科技企业是拉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动力源，亚洲具有孕育数字科技企业的良好基础。亚洲充足的风险投资催生了众多数字科技企业，其中包含大量的科技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许多数字贸易应用场景。同时，由于亚洲地区人口稠密，这使得新数字技术有广泛的市场空间去推广与发展，数字科技企业更容易生存下去。重要的是，与政府在数字技术方面的推动作用相比，企业在市场化原则的驱使下，更加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例如，亚洲贸易中心发布的《亚太数字贸易：2020 年及以后的问题》报告显示，总部位于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研发公司占了全球顶级人工智能专利的 70% 左右，这极大推动了亚洲数字贸易发展。

亚洲数字科技企业正在不断崛起，其在数字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9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发展报告》，位于亚洲的中国，其企业数量与估值均位列第一，从亚洲整体来看，亚洲独角兽企业强势崛起，亚洲一共有 258 家企业入选，数量占全球的 51.60%，并且估值突破万亿美元的大关，超过其他地区的总和，这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高度吻合。其中，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位居世界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列，具有许多优秀的数字科技企业，不断建立起支付、物流与金融等方面的数字平台。中国的阿里巴巴（Alibaba）正在大力投资云计算技术；百度（Baidu）还积极从事图像和语音识别技术、机器人以及大数据的研究；腾讯（Tencent）则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数字生态系统，微信（WeChat）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促进了广泛的商业交易与数字贸易。亚洲独角兽企业在不断推进亚洲数字贸易的发展，不断将亚洲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些公司在亚洲内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且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亚洲各经济体内部与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发展。例如，新加坡市值最大的公司为 Sea，该公司主要提供三个关键的互联网平台，包括用于在线游戏和出版行业的 Garena、在线购物网站 Shopee 以及一个名为 SeaMoney 的金融服务部门，均在亚洲区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其是推动亚洲数字贸易发展的一个企业缩影。

4.2.4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亚洲贸易的数字化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亚洲乃至全球的数字化进程,在贸易领域,则是极大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发展。一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严重的物理隔绝,促使经济产业加速“云上搬迁”,贸易活动更不例外,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各国所采取的旅行限制以及港口关闭等措施迫使参与全球贸易的人员进行在线远程工作,并采用虚拟方式签署交易,进而极大提升了数字贸易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数字贸易是全球经济中最活跃的部门之一,其对于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数字自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中断,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除了防控疫情本身,为了缓解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各经济体与企业主体的选择,并且在疫情期间,企业看到了巨大的数字贸易机会,新业态新模式的开辟可以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痛苦。

疫情对亚洲数字贸易的推动主要体现在贸易内容数字化与贸易技术数字化两个方面。在贸易内容数字化方面,疫情导致的相关封锁措施与贸易中断改变了许多长期存在的商业模式,促使亚洲的企业迅速扩大数字化能力,开辟许多新的业态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数字贸易的前进与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众多业态模式中,远程在线办公、远程教育以及远程医疗增长最为显著。直播、在线视频以及流媒体服务等数字技术使人们可以在不同经济体进行远程工作,在疫情背景下具有更大安全性。同时,这也为一些自由职业者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服务机会,例如编写、编辑、法律以及图形设计等服务行业;疫情期间远程教育需求激增,亚洲各经济体纷纷以数字方式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和教育,这不仅使得教育在疫情期间得以维持,还极大促进了教育资源共享,进而提高亚洲整体的劳动素质;最后,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泛滥的背景下,远程医疗得到亚洲各国高度重视,进而迎

来飞速发展,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亚洲各国政府都积极鼓励通过远程医疗方式来减缓疫情的传播。在贸易技术数字化方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进一步发展,疫情使得亚洲各国深刻认识到,海关和所有供应链相关方迫切需要将贸易程序进一步数字化,运用更加前沿的数字科技来应对疫情造成的现实难题,通过加大数字贸易的比重,可以实现更加高效的连接与协作,并维持贸易数据的稳定;此外,3D打印由于其技术特点,在疫情造成的物理隔断中得到了较快速的发展,尽管在过去30年里,3D打印一直以较快速度增长,但是3D打印应用场景还不够广泛,其收入占全球制造业收入比重依然较小。疫情增加了对3D打印的需求,尤其是个人防护用品的3D打印生产激增,并且事实也充分表明,3D打印有助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防控措施而造成的供需失衡以及供应链延误等问题,其在疫情期间极大推动了数字贸易发展。

4.3 亚洲重点服务行业依存度分析

本节分析亚洲重点服务行业——旅游业的最新依存度情况。2019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数达到14.59亿人次,达到了历史性的峰值,实现十连涨,增长了3.7%。中东地区(8.3%)、亚太地区(4.1%)以及欧洲(3.9%)的国际旅游人数增长超过了全球增长率(3.7%)。

与全球旅游市场创下历史纪录的情况一致,亚太地区国际旅游人数也实现历史新高,达到3.61亿人次,仅次于欧洲地区,国际旅游人数位居全球第二。亚太地区的东南亚地区国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7.7%,位居本区域之首;南亚地区明显低于2018年的增长率(18.8%),同比增长7.5%。

2019年全球国际旅游收入为14,870亿美元,同比上涨1.64%。亚太地区国际旅游收入为4,446亿美元,同比增长1.8%,占到全球国际旅游收入的30%。东北亚是亚太地区国际旅游收入唯一一个负增长的区域,2019年同比增长-2.71%。南亚地区的国际

旅游收入的增长幅度达到 7.77%，居亚太地区增长率之首。

以下是对亚太旅游依存度指数的更新。与本报告前 9 年（2012—2020）中选取的经济体保持一致，考察图 4.1 所示的经济体对亚

洲旅游市场依存度的情况，该图中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通过计算某经济体来自亚太经济体的国际游客人数占该经济体来自全世界的国际游客人数的比例而得出，用来显示某经济体旅游市场对亚太地区的依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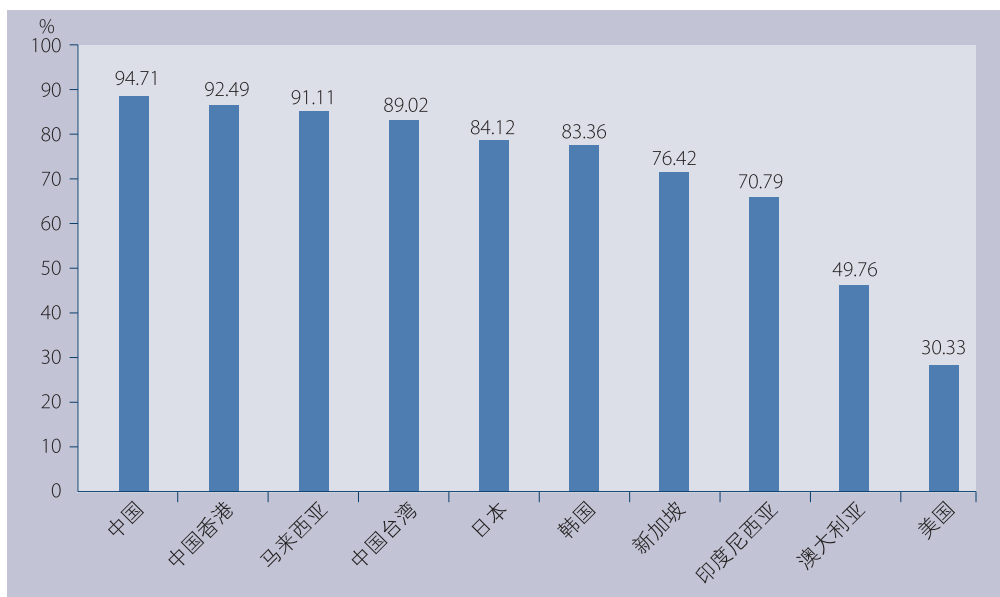


图 4.1 2019 年亚太部分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排序

资料来源：主要数据来自各经济体旅游官方机构及统计机构。

2019 年，中国香港入境旅游市场对亚洲的依存度又一次超过马来西亚，达到了 92.49%，基本与 2018 年持平（见表 4.5）。2019 年，中国香港社会的动荡对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 2018 年相比，中国香港国际旅游人数增长率为 -14.2%。本报告中涉及

的重要的亚太经济体访港游客人次均有较大幅度的负增长，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的下跌幅度均超过 20%，中国内地访港游客人数下降 14.2%，只有中国澳门的访港游客人数为正增长。

表 4.5 2017—2019 年亚太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

单位：%

序号	经济体	2017	2018	2019
1	中国	92.45	91.25	94.71
2	中国香港	92.01	92.62	92.49
3	马来西亚	92.55	91.24	91.11
4	中国台湾	89.26	88.97	89.02
5	日本	84.00	84.60	84.12

续表

序号	经济体	2017	2018	2019
6	韩国	80.79	82.11	83.36
7	新加坡	77.47	76.90	76.42
8	印度尼西亚	79.44	71.48	70.79
9	澳大利亚	51.63	49.73	49.76
10	美国	31.53	29.77	30.33

资料来源：主要数据来自各经济体旅游官方机构及统计机构。

2017—201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亚洲旅游出口依存度持续下降（见表4.5），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降幅接近10%。2019年，印度尼西亚旅游部推出了旅游4.0政策，以吸引千禧年代出生人群以及顺应自驾游等旅游趋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际游客有所增加。但受自然灾害和大选造成的不稳定因素等的影响，中国赴印度尼西亚游客在2019年为207.2万人次，出现负增长，明显低于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门预计的350万人次。与此相反，韩国对亚

洲旅游出口依存度则以每年高于1%的幅度稳步上升，2019年达到83.36%。

表4.6是2019年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旅游市场的相互依存度。各经济体之间旅游出口依存度的总体格局没有明显变化，周边经济体是主要的贸易伙伴，这是亚洲旅游业的突出特点。国际旅游市场依然保持着对中国的极高依赖。中国香港对内地入境旅游的依存度为78.29%，马来西亚对中国旅游出口依存度再次刷新历史纪录，将近12%的入境游客来自中国。

表4.6 2019年亚太主要经济体旅游相互依存度

单位：%

甲对乙依存度	中国	马来西亚	中国香港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印度尼西亚	中国台湾	美国	澳大利亚
中国（VF）	—	—	55.4	—	—	—	—	4.22	—	—
马来西亚（TF）	11.93	0	0	3.9	2.58	1.63	13.88	1.47	1.03	1.41
中国香港（TF）	78.29	0.7	0	0.81	1.86	1.93	0.67	2.75	1.98	0.9
新加坡（VF）	18.97	6.39	2.56	0	3.38	4.63	16.27	2.23	3.82	5.98
韩国（VF）	34.41	2.33	3.97	1.41	0	18.69	1.59	7.2	5.96	0.99
日本（VF）	30.09	1.57	7.19	1.54	17.52	0	1.29	15.34	5.41	1.95
印度尼西亚（TF）	12.86	18.51	0.31	12.01	2.41	3.23	0	1.29	2.84	8.61
中国台湾（VF）	22.88	4.53	14.82	3.88	10.47	18.23	1.94	0	5.1	0.94
美国（TF）	7.01	0	0.38	0.46	5.69	9.29	0	1.24	0	3.27
澳大利亚（TF）	15.38	4.02	3.26	4.73	2.98	5.18	2.23	2.09	8.88	0

注：“—”表示未得到数据；TF：国际入境旅游人数（不包括一日游游客）；VF：国际入境游客人数（包括旅游者和一日游游客）；中国未公布2019年分国别（地区）数据。

资料来源：主要数据来自各经济体旅游官方机构及统计机构。

关注 2017—2019 年的三年中 7 个经济体的旅游出口贸易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见图 4.2），可以发现“两升两降”的特征。两升，即日本和马来西亚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持续上升；两降，即中国台湾和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持续下降。2019 年赴日本中国游客出现明显增长，比 2018 年增加 120 万人次，2019 年日本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发放

条件这一举措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与赴日本中国游客大幅度增加的情况相反，2019 年中国游客减少 16 万人次，继续维持赴美游客人数下降的趋势。2019 年，美国暴力犯罪日益增长，多国发出赴美旅行警告，而且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对赴美游客频繁骚扰等原因使中国游客对美国望而却步，赴美旅游不断降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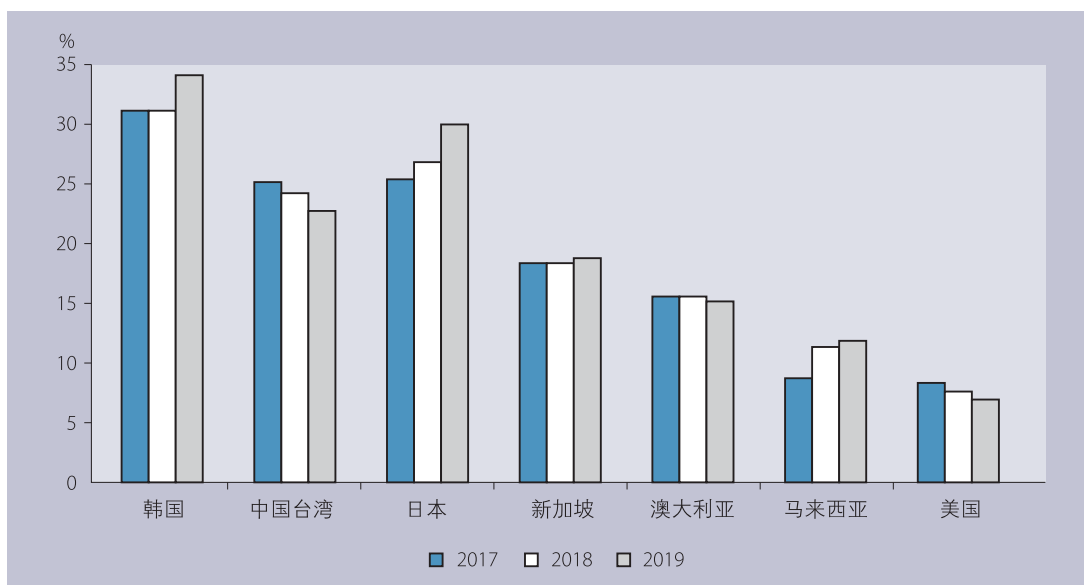


图 4.2 2017—2019 年部分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中国的依存度

资料来源：主要数据来自各经济体旅游官方机构及统计机构。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的脚步丝毫没有放缓，各个经济体均采取了严格的交通运输管制和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在“史上最严的国际旅行限制令”下，国际旅游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继续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以全球航空运输业为例，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的报告指出，预计 2020 年将出现 1,185 亿美元净亏损，客运方面比 2019 年下降 60.5%。世界旅游组织指出，受到 2020 年的严重打击，全球旅游业下降了 70%，回到了 1990 年的水平。

世界旅游组织发出了“胸怀同一地球的愿景，负责任地恢复旅游”的倡议，提出负责任地复苏旅游业，推荐了六条行动路线，

即公共卫生、社会包容、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行动、循环经济以及治理和财政。同时，全球旅游危机委员会联合旅游部门制定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全行业对策。亚洲各经济体也在积极地谋求重回正轨的对策，例如，2020 年 7 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开始接待国内游客；马尔代夫开始接待外国游客，推出的“一岛一酒店”政策，强调低密度旅游环境；中国恢复了跨省团队游。新加坡于 2020 年 11 月推出了针对外国游客的新冠肺炎疫情旅游保险，这一创新举措被认为亚洲将走在全球旅游业复苏的前列。

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融合度

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方面，**在**2019年亚洲经济体¹表现稳健。特别是，流入中国、东盟和印度外国直接投资都创造了新的纪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也大幅增长。

亚洲的主要外资来源地仍是亚洲内部。亚洲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自2016—2019年已连续4年保持在50%以上，而亚洲内部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波动较大，在2017年和2018年超过50%后，2019年又跌落到50%以下，使得亚洲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对亚洲自身的依存度上有所下降。

5.1 亚洲直接投资融合度现状

5.1.1 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外国直接投资依存度高

一个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FDI）依存度指数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一个经济体对另一经济体流入和流出的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计算方法是报告方从某一个经济体（其伙伴方）流入以及对该经济体流出的FDI占其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比值。一个经济体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依存度的计算方法是该经济体从亚洲流入以及对亚洲流出的FDI占其

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比值。亚洲直接投资对自身的依存度衡量所有亚洲经济体（利用可得数据）在亚洲内部的FDI流入和流出占其全球FDI流入和流出总额的比重。

表5.1显示了2019年亚洲部分经济体（报告方）对其伙伴方的直接投资依存度指数。在双边跨境投资依存方面，中国内地与香港相互依赖程度最高。中国内地对香港的FDI流入和流出依存度指数接近70%，中国香港对内地的FDI依存度达45%。新加坡在促进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投资流动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2019年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对新加坡的依存度指数分别为29.11%和22.12%。

对亚洲FDI流量高依赖的经济体主要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中国对亚洲FDI的依存度最高，达到83.73%，与2018年的指数基本持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对亚洲FDI的依存度在2019年上升到60%以上。印度对亚洲FDI的依存度超过40%。除日本外，主要亚洲经济体对亚洲FDI的依存度都超过了30%。

亚洲内部FDI对中国香港、东盟和中国依赖程度较高，分别为16.11%、11.76%和9%。亚洲直接投资对自身的依存度2019年

1. 本章所称亚洲经济体包括了与亚洲经济体有密切贸易联系的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为 47.83%，与 2018 年相比降低了 9 个百分点。亚洲直接投资对亚洲自身依存度的降低主要是由于亚洲内部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的大幅下降，从 2018 年的 63.42% 降到 2019 年的 44.78%（见表 5.4），即亚洲资金投资目的地更加多元化。2019 年亚洲直接投资对美国的依存度与中国基本持平，比 2018 年呈现负值的亚洲直接投资对美国的依存度高得多，这主要得益于总部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跨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增长¹。

5.1.2 亚洲内部引进外资依存度保持稳定

引进外资依存度指数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一个经济体对另一经济体流入的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计算方法是东道方从一个经济体（其伙伴方）流入的 FDI 占其外资流入总额的比值。

表 5.2 显示了 2019 年亚洲部分经济体以及美国的直接投资流入相互依存格局。中国香港仍是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所占份额接近 70%。同样，中国内地也是香港的外资重要来源地，同时中国也是印度尼西亚外资重要来源地。新加坡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日本和韩国更依赖于来自美国和欧盟的资金。

美国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出现负值之后，2019 年恢复了正的流入，表明双边投资开始恢复。2019 年中国

对美国的引进外资依存度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为 1.94%，与 2018 年基本一致。

2019 年东盟外资最大来源地是美国。东盟内部仍然是东盟 FDI 重要来源地，但东盟内部资金的重要性在 2017—2019 年已连续三年小幅下降。对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参与的 15 国——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内部引资指数为 27%，比上一年有所上升。如印度加入 RCEP，即 RCEP（16）内部引资指数为 29%，比上一年上升超过 2 个百分点。

每个经济体对亚洲的引进外资依存度的计算方法是该经济体从亚洲流入的 FDI 占其引进外资流量总额的比值。2019 年中国、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对亚洲内部资金的依赖程度达到历史最高值，如表 5.3 所示。印度尼西亚对亚洲内部资金的依赖度保持在 70% 以上。东盟从 2016 年对引进亚洲资金的依赖度达到峰值之后，已连续 3 年明显下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参与国对亚洲内部的资金依存度也有所下降。

亚洲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在 2017 年 54.65% 的峰值后有所下降，但 2019 年仍然达到了 52.93%，为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高位。

1. 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第 65 页。

表 5.1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依存度指数

单位：%

报告方 (X) 对	伙伴方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香港	印度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东盟	RCEP ^g (15)	RCEP ^h (16)	亚洲	欧盟	美国	其他
中国	0	1.60	2.22	67.93	0.20	0.91	0.81	4.51	6.53	11.28	11.48	83.73	6.48	2.36	7.42
日本	5.70	0	1.15	1.58	1.77	4.10	2.95	5.99	13.21	24.26	26.03	28.58	27.85	21.93	21.64
韩国 ^a	8.01	2.99	0	5.98	0.29	0.88	1.27	4.38	13.29	27.09	27.38	35.56	24.01	21.58	18.85
中国香港 ^b	45.35	-0.22	3.35	0	0.93	0.58	1.80	6.22	13.56	62.60	63.53	64.40	14.98	4.15	16.47
印度 ^c	0.54	5.44	0.79	2.33	0	-0.04	0.03	29.16	29.81	36.55	36.55	41.24	24.40	9.22	25.14
澳大利亚 ^d	3.93	4.95	0.58	0.07	0.38	0	0.87	4.15	6.23	33.39	33.76	35.39	39.34	1.09	24.19
印度尼西亚 ^e	16.96	12.31	3.05	8.16	0.19	1.00	0	22.12	27.50	60.96	61.15	70.18	24.44	2.93	2.46
新加坡 ^f	4.99	9.59	1.15	6.23	1.19	-1.10	-0.57	0	6.93	21.98	23.17	30.24	3.31	54.08	12.36
亚洲	9.01	3.46	1.37	16.11	0.94	1.35	1.14	6.72	11.76	29.09	30.03	47.83	21.34	9.13	21.70

注：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 $(FDI_{XY}) = FDI_{XY} / FDI_{WX}$ ，其中 FDI_{XY} = 从 Y 经济体流入 X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 FDI_{WX} = 从全球流入 X 经济体及 X 流出到全球的直接投资总额。

^a 韩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

^c 印度直接投资流入的数据只包括股权投资。

^d 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数据为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资料来源为澳大利亚统计局，按 2019 年平均汇率 1 澳元=0.847 美元换算。

^f 新加坡直接投资数据为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资料来源为新加坡统计局，按 2019 年平均汇率 1 新加坡元=0.743 美元换算。

^g RCEP (15) 指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 15 国，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h RCEP (16) 指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 16 国，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资料来源：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协调的直接投资调查 (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CDIS) 数据库以及各国和地区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表 5.2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引进外资依存度指数

单位: %

报告方 (X) 对	伙伴方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香港	印度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东盟	RCEP (15)	RCEP (16)	亚洲	欧盟	美国	其他
中国	0	2.69	4.01	69.71	0.02	0.31	0.01	5.50	5.70	12.75	12.77	84.96	5.29	1.94	7.80
日本	5.14	0	2.25	5.62	-0.01	1.13	0.10	3.91	8.08	16.60	16.59	25.31	18.45	38.80	17.44
韩国 ^a	1.45	8.03	0	13.37	-1.77	-0.93	-0.11	1.94	2.94	22.71	20.94	40.29	54.64	10.52	-5.45
中国香港 ^b	37.23	-13.62	13.32	0	2.52	3.50	-0.10	7.71	16.93	57.36	59.88	64.20	13.69	22.18	-0.07
印度 ^c	0.33	6.45	1.58	1.39	0	0.06	0.02	29.36	29.85	38.27	38.27	40.95	24.91	8.45	25.69
澳大利亚 ^d	16.71	27.71	2.81	-7.15	0.99	0	0.07	13.20	15.74	60.01	60.99	57.63	53.88	-56.80	45.30
印度尼西亚	16.82	15.28	3.79	10.25	0.21	1.23	0	23.08	29.14	66.28	66.49	77.78	12.21	3.51	6.50
新加坡 ^e	2.24	8.44	2.22	8.00	1.41	-0.91	0.67	0	2.81	14.75	16.16	25.67	-18.46	75.16	17.62
东盟	5.67	12.68	1.59	6.91	1.26	1.70	0.35	9.94	13.93	35.50	36.76	31.41	10.07	15.23	43.28
RCEP (15) ^f	4.07	8.47	2.54	28.84	0.54	1.64	0.16	7.71	10.09	26.98	27.52	52.83	13.45	7.55	26.17
RCEP (16) ^g	3.63	8.24	2.43	25.64	0.48	1.46	0.15	10.23	12.39	28.29	28.78	51.45	14.78	7.66	26.11
亚洲	5.47	6.59	2.79	22.20	0.87	1.63	0.12	9.13	11.57	28.19	29.06	52.93	15.68	7.60	23.79
美国	1.63	14.74	2.04	0.29	0.02	6.20	0.02	1.12	1.00	25.70	25.72	26.32	40.75	0	32.93

注: 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 (IFDI_{XY}) = IFDI_{XY}/IFDI_{WX}, 其中 IFDI_{XY} = 从 Y 经济体流入 X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 IFDI_{WX} = 从全球流入 X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总额。

百分比为负值表明当年 Y 经济体流入 X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为负值, 即从 Y 经济体到 X 经济体资金净流出。

^a 韩国和中国香港直接投资流入的数据为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

^b 印度直接投资流入的数据只包括股权投资。

^c 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流入额为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为澳大利亚统计局, 按 2019 年平均汇率 1 澳元=0.847 美元换算。

^d 新加坡直接投资流入额为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为新加坡统计局, 按 2019 年平均汇率 1 新加坡元=0.743 美元换。

^e RCEP (15) 指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 15 国, 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f RCEP (16) 指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 16 国, 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资料来源: 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以及各国和地区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表 5.3 2013—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内部投资的依存度指数

单位：%

经济体	200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	61.50	80.51	82.75	82.80	78.67	83.56	76.97	84.96
日本	14.91	53.95	65.65	—	23.57	31.42	50.86	25.31
韩国	34.90	51.60	35.70	—	51.72	40.55	80.11	40.29
中国香港	43.56	14.86	42.58	18.20	34.49	39.74	36.02	64.20
印度	18.11	27.74	33.84	44.14	44.66	35.28	16.26	40.95
澳大利亚	22.77	30.64	20.30	20.30	25.28	41.80	29.04	57.63
印度尼西亚	61.31	—	76.88	51.41	72.87	72.73	79.32	77.78
新加坡	21.12	24.47	38.50	85.80	8.87	15.87	28.27	25.67
东盟	—	49.41	44.61	55.76	58.81	52.77	40.05	31.41
RCEP (16)	—	56.32	54.04	61.08	56.25	58.22	57.64	51.45
亚洲	38.28	41.86	38.01	43.86	51.78	54.65	52.02	52.93

注：“—”表示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和各国和地区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5.1.3 亚洲经济体对外投资依存度波动较大

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显示了一个经济体作为投资目的地对另一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其计算方法是从一个经济体流出到某一目的地（其伙伴方）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占其向全球投资流出总额的比值。

表 5.4 显示了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对其伙伴方的直接投资流出依存度指数（OFDII）。中国和中国香港分别把超过 80% 和 60% 的资金注入亚洲市场，但与上一年相比，2019 年两者对亚洲的依赖有所下降。中国香港仍是亚洲直接投资最受青睐的目的地，接受了 12.48% 的来自亚洲的直接投资。中国内地对香港依赖程度最高，来自中国内地的 2/3 的投资都进入了香港。

近期的一些事件影响了亚洲内部对外投资依存度。第一个主要因素，2016 年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悲观预期引发了大量资本外逃，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强对资本账户交易的控制。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 2016 年的 1,960 亿美元降到 2019 年的 1,170 亿美元，远低于 2016 年前的水平。第二个主要因素是 2018 年下半年爆发的中美经贸摩擦。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投资所谓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流向产生了抑制作用。第三个主要因素是 2019 年中国香港发生的政治动荡。由于中国香港是再配置来自内地投资的中心，香港的政治动荡对于区域投资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内亚洲内部对外投资依存度波动较为剧烈。

表 5.4 201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

单位：%

报告方 (X) 对	伙伴方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香港	印度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东盟	RCEP ^a (15)	RCEP ^a (16)	亚洲	欧盟	美国	其他
中国	0	0.49	0.41	66.14	0.39	1.52	1.62	3.52	7.35	9.79	10.18	82.49	7.68	2.78	7.04
日本	5.78	0	0.99	0.97	2.04	4.55	3.37	6.30	13.97	25.40	27.44	29.06	29.25	19.41	22.27
韩国	9.36	1.95	0	4.45	0.72	1.25	1.55	4.89	15.43	27.99	28.71	34.58	17.68	23.87	23.88
中国香港 ^a	47.02	2.54	1.30	0	0.61	-0.02	2.19	5.92	12.86	63.67	64.28	64.44	15.24	0.44	19.87
印度 ^b	1.73	-0.09	-3.52	7.47	0	-0.55	0.11	28.10	29.60	27.14	27.14	42.79	21.61	13.45	22.15
澳大利亚 ^c	1.31	0.28	0.12	1.55	0.25	0	1.03	2.30	4.28	27.92	28.18	30.82	36.35	12.97	19.86
印度尼西亚 ^d	17.54	0.12	0.00	-0.40	0.11	0.06	0	18.18	20.77	39.11	39.22	38.92	74.67	0.57	-14.16
新加坡 ^e	11.92	12.50	-1.53	1.77	0.64	-1.57	-3.70	0	17.32	40.21	40.85	41.76	58.18	0.95	-0.89
亚洲	11.12	1.59	0.52	12.48	0.98	1.18	1.74	5.28	11.87	29.63	30.61	44.78	24.71	10.05	20.45

注：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出依存度 (OFDI_{XY}) = OFDI_{XY} / OFDI_{WX}，其中 OFDI_{XY} = 从 X 经济体流出到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OFDI_{WX} = 从 X 经济体流出到全球的直接投资总额。

^a 百分比为负值表明当年从 X 经济体流出到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为负值，即从 Y 经济体到 X 经济体资金净流入。

^b 中国香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直接投资流入的数据为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

^c 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流出额为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资料来源为澳大利亚统计局，按 2019 年平均汇率 1 澳元=0.847 美元换算。

^d 新加坡直接投资流出额为 2019 年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减去 2018 年存量计算得出，资料来源为澳大利亚统计局，按 2019 年平均汇率 1 新加坡元=0.743 美元换算。

^e RCEP (15) 指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 15 国，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f RCEP (16) 指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 16 国，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资料来源：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UNCTAD FDI/TNC、OECD.Stat 双边投资流量数据以及各国（地区）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5.2 亚洲跨境投资展望

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亚洲经济体跨境投资恢复较快。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和2021年全球直接投资预计都有大幅萎缩。202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入下降42%，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只下降4%，原因主要是流入中国香港的资金从2019年异常低值大幅反弹以及流入中国和印度的资金保持稳定¹。中国2020年吸引的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皆出现增长，且成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将进一步增加对亚洲和全球的投资。2020年1—12月，中国对韩国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承诺投资额累计增长37.0%，达到18亿美元，对韩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承诺投资额增长29.2%，达到36亿美元²。2020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8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³。预计亚洲经济体跨境投资在近期仍能保持较稳定增长，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和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带来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仍会产生负面影响。

亚洲经济体稳定投资和投资便利化措施的实施，有利于跨境投资的增长。中国《外商投资法》2020年1月起施行，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营造了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投资环境。2020年10月，印度尼西亚通过《创造就业综合法》，将通过简化法规、削减繁琐手续，吸引更多外国的直接投资。其他亚洲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等也采取了放松和便利外资的政策措施。中国及部分亚洲经济体实施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措施将进一步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使得亚洲继续成为让投资者青睐的市场。

亚洲经济体区域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亚洲区域内投资的增长。RCEP的签署及逐步实施，促使区域内采用统一的经贸投资规则，将进一步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这将吸引区域内及区域外投资进一步向该区域聚集，有助于各个经济体企业在区域内进行供应链、产业链的高效布局，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2019年，RCEP（15）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接近30%（见表5.2），但与其他主要区域经济集团相比还是相对较低，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⁴。

1. 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第38期，2021年1月。

2.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向韩国承诺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六年达到200亿美元”，2021年1月12日。

3. 中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202101/20210103033292.shtml>，2021年1月22日。

4. 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第37期（RCEP协定特刊），2020年11月。

亚洲经济体金融融合进程

金融融合是亚洲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区内贸易、生产、投资一体化是区域金融业不断融合的基石；区域金融行业互联互通也为各项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促进了亚洲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亚洲金融融合与金融全球化高度相关。主要储备货币国的政策溢出效应、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各类资本全球配置使全球金融条件趋同，国际金融市场高度联动，资本流动羊群效应更为显著。亚洲各经济体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教训，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与开放，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保持了较强韧性，从金融全球化中获益。

疫情下，各国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央行为市场提供大量流动性，政府债务规模急剧上升，资产价格上扬。全球多数经济体都在经历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债务、高资产价格的阶段，金融全球化持续。全球股市“同涨同跌”，多国金融市场联动更加显著。过去20年，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与英国富时100指数、日本日经225指数和中国沪深300指数月回报率的相关度分别为0.82、0.67和0.34；但同样指标近2年的数据分别

为0.84、0.85和0.64。

疫情后，全球贸易、投资恢复仍需时日，全球贸易摩擦仍将存在和国际贸易规则不断变化，贸易投资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美国等主要经济体金融监管变化可能导致资本流动变化异常。由此，金融全球化可能会进一步呈现区域化的新特点，亚洲、欧洲等区域更加注重本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基础设施的连通，金融融合的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本章主要从亚洲金融市场开放、货币合作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国际金融中心作用三方面来分析亚洲的金融融合程度。

6.1 亚洲金融市场开放

本节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产组合协助调查(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 CPIS)统计的跨境金融市场投资组合数据¹来分析亚洲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产组合协助调查数据，2019年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总额为66.6万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13.18%，扭转了2018年全球经济放缓、贸易摩擦等引起的全球资产组合投资下降的局面。其中，亚洲经济体对外金融组合投资增长率为16.73%（见表6.1），亚洲经济体金融市场吸引外国

1. 数据包括各经济体债务以及所有权不足10%的股权投资，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或储备资产中的跨境债务或股权投资。

金融资产增长率为 14.24% (见表 6.2), 均高于全球资产组合投资增长率 13.18%。

从亚洲内部看, 全球资产组合资本流出增长值最高的经济体是日本(5,421 亿美元); 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29.73%)、韩国(23.02%)、西亚(21.37%)、东南亚(19.76%)。在全球资产组合流入亚洲新增的 9,663 亿美元中, 日本和中国市场分别贡献了 2,836 亿美元(增速 11.43%)和 2,504 亿美元(增速 21.27%)。东南亚、西亚、南亚、韩国也成为 2019 年全球金融资本追逐的国家和地区, 增长率分别为 10.82%、

17.34%、11.17%、8.68%。

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流向及来源结构(见表 6.3)显示, 2019 年流入亚洲的资产组合投资共计 7.75 万亿美元, 其中 1.68 万亿美元(22%)来自亚洲自身, 1.89 万亿美元(24%)来自欧盟 15 国, 2.63 万亿美元(34%)来自北美(主要是美国), 1.55 万亿美元(20%)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说明在亚洲资产组合投资中, 尽管北美和欧盟仍是投资亚洲金融资产的主要投资方, 二者合计 58%, 但亚洲人投资亚洲的比例也超过了五分之一。

表 6.1 2017—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资本流出

单位: 百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全球资产组合资本流出						
	存量			流量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增长		2019 年增长	
中国	497,735	497,957	645,981	223	0.04%	148,024	29.73%
日本	4,106,257	4,068,775	4,610,836	-37,482	-0.91%	542,061	13.32%
韩国	424,647	464,979	572,011	40,332	9.50%	107,032	23.02%
东南亚	1,450,918	1,426,707	1,708,570	-24,211	-1.67%	281,862	19.76%
中亚	64,015	60,675	70,358	-3,339	-5.22%	9,683	15.96%
西亚	419,854	428,522	520,109	8,667	2.06%	91,587	21.37%
南亚	7,323	9,582	5,630	2,260	30.86%	-3,953	-41.25%
亚洲	8,777,608	8,634,220	10,078,927	-143,388	-1.63%	1,444,708	16.73%
美国	12,391,814	11,282,286	13,125,226	-1,109,528	-8.95%	1,842,940	16.33%
欧盟 15 国	25,539,866	23,730,346	26,996,369	-1,809,520	-7.09%	3,266,023	13.76%
全球总量	62,000,753	58,875,740	66,636,897	-3,125,013	-5.04%	7,761,157	13.18%

资料来源: 资产组合协作调查, 作者统计。

表 6.2 2017—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资本流入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全球资产组合资本流入						
	存量			流量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增长		2019 年增长	
中国	1,158,037	1,177,199	1,427,607	19,162	1.65%	250,408	21.27%
日本	2,631,344	2,481,903	2,765,505	-149,440	-5.68%	283,601	11.43%
韩国	664,791	599,321	651,329	-65,470	-9.85%	52,007	8.68%
东南亚	1,006,325	862,760	956,123	-143,565	-14.27%	93,363	10.82%
中亚	27,702	23,044	28,508	-4,658	-16.82%	5,465	23.72%
西亚	434,293	428,309	502,585	-5,984	-1.38%	74,276	17.34%
南亚	628,883	571,869	635,766	-57,015	-9.07%	63,897	11.17%
亚洲	7,231,599	6,787,002	7,753,310	-444,597	-6.15%	966,308	14.24%
美国	14,592,613	14,404,142	16,485,171	-188,471	-1.29%	2,081,029	14.45%
欧盟 15 国	25,246,840	23,587,399	26,571,531	-1,659,442	-6.57%	2,984,132	12.65%
全球总量	62,000,753	58,875,740	66,636,897	-3,125,013	-5.04%	7,761,157	13.18%

资料来源：资产组合协作调查，作者统计。

表 6.3 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流向

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流向（美元价值）

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 \ 流向	亚洲	欧盟 15 国	北美	其他国家	接受投资合计
亚洲	1,678,652	1,886,163	2,633,658	1,554,838	7,753,310
欧盟 15 国	1,875,926	15,200,397	5,087,742	4,407,467	26,571,531
北美	3,257,085	6,233,524	2,391,272	6,583,412	18,465,291
其他国家	3,267,265	3,676,284	4,995,478	1,907,736	13,846,763
投资合计	10,078,927	26,996,368	15,108,149	14,453,452	66,636,895

2019 年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流向（来源占比）

单位：%

来源 流向	亚洲	欧盟 15 国	北美	其他国家	合计
亚洲	22	24	34	20	100
欧盟 15 国	7	57	19	17	100
美国	18	34	13	36	100
其他国家	24	27	36	14	100

资料来源：IMF 资产组合投资协作调查，作者统计。

中国是亚洲金融合作的受益者，更是积极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力度，放宽外资机构准入，降低和取消外资持股限制。2019 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当年世界各国对中国金融资产投资组合产品的持有占比（2.14%）已高于中

国香港（1.15%），中国成为国际资本流入偏好的目的地。

由表 6.4 和图 6.1 可见，中国对外和投入中国的资产组合投资数额自 2015 年至 2019 年均波动上涨。中国对亚洲地区的金融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表 6.4 2015—2019 年中国对外和投入中国的资产组合投资

中国对外资产组合

单位：百万美元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亚洲	80,964	119,099	188,160	187,803	270,161
欧盟 15 国	37,444	43,861	58,481	60,410	73,813
美国	111,144	125,687	145,249	132,022	162,830
总量	280,830	359,659	497,735	497,957	645,981

投入中国的资产组合

单位：百万美元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亚洲	491,041	457,765	572,387	541,895	616,907
欧盟 15 国	131,127	123,103	179,526	173,783	215,567
美国	107,725	101,350	162,282	159,127	233,063
总量	817,520	833,451	1,158,037	1,177,199	1,427,607

资料来源：IMF 资产组合投资协作调查，作者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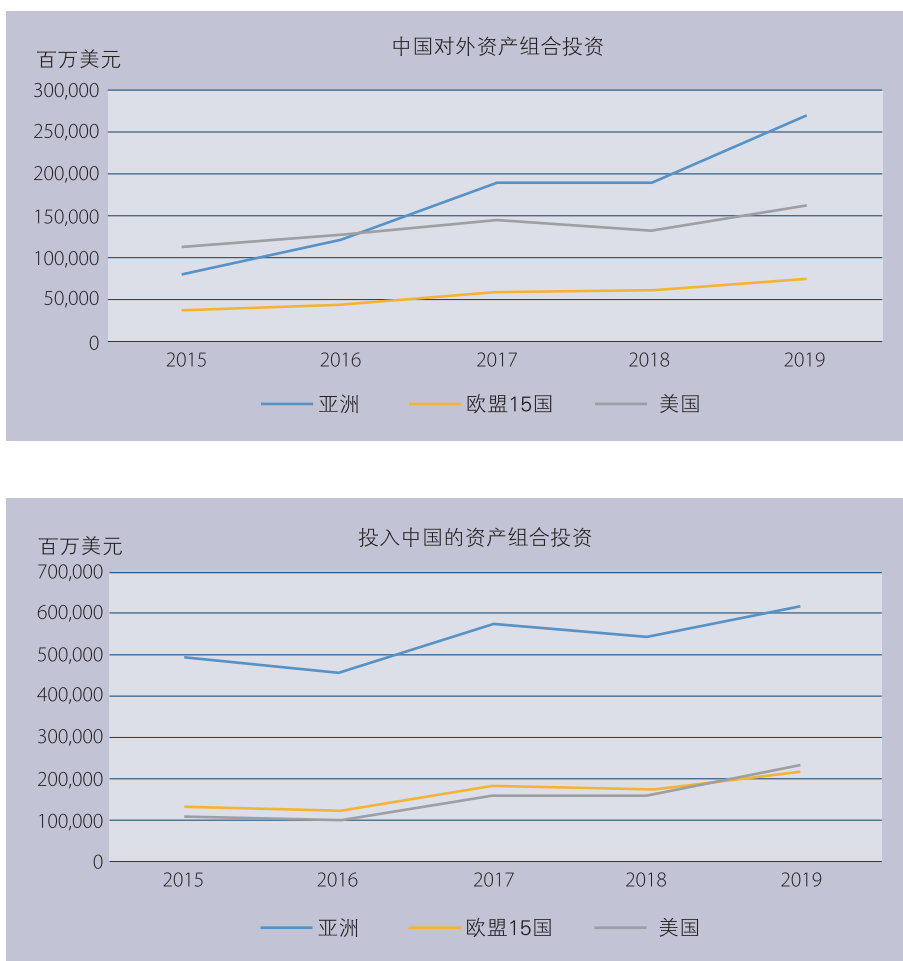


图 6.1 2015—2019 年中国对外和投入中国的资产组合投资走势

资料来源：IMF 资产组合投资协作调查，作者统计。

2019 年，中国所有对外资产组合投资（6,460 亿美元）中，投入亚洲其他经济体的（2,702 亿美元）占 41.8%。在所有投入中国的资产组合投资（1.43 万亿美元）中，来自亚洲其他经济体的（6,169 亿美元）占 43.2%，可见亚洲金融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2018 年 6 月，中国 A 股正式纳入 MSCI 指数。自 2019 年以来，中国加速深化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推出“沪伦通”等金融开放措施。监管方面，不仅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限制，同时还在信

用评级等方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在 2020 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中国金融市场正在以更快速度开放，进一步加深与亚洲的金融融合，促进金融全球化。

6.2 亚洲货币合作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6.2.1 亚洲货币合作

国际金融危机后，亚洲各经济体在货币合作上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央银行间本币互换安排日益增多。除“清迈倡议”下的双边货

币互换安排建立起的 2,400 亿美元储备库以外，中国、日本、印度等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均与区内其他经济体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日本与新加坡、中国、澳大利亚、泰国等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金额总计 660 亿美元左右，并与印度等经济体签署了本币与美元互换协议。印度中央银行自 2012 年起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的中央银行签署了总额约 20 亿美元的本币、美元和欧元混合的货币互换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蒙古国、卡塔尔、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等 16 个亚洲经济体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 16,600 亿元人民币，约合 2,400 亿美元。

本币互换安排不仅为有关央行提供了国

际收支项下的流动性支持，而且对促进亚洲经济体间贸易、投资使用本币计价、结算发挥了积极作用。从 SWIFT 的最新统计看，2021 年 1 月，用于全球支付结算前十名的货币中，亚洲货币有五种，即日元 (3.49%)、人民币 (2.42%)、港元 (1.42%)、新加坡元 (0.99%) 以及泰铢 (0.94%) (见图 6.2)。在全球贸易融资市场前 10 名的货币中，除了排在第一位的美元 (87.04%)、第二位的欧元 (6.45%) 和第八位的英镑 (0.27%) 外，其余全是亚洲经济体货币，即人民币 (2.15%)、日元 (1.59%)、印度尼西亚卢比 (0.39%)、阿联酋迪拉姆 (0.36%)、沙特里亚尔 (0.29%)、巴基斯坦卢比 (0.17%) 和越南盾 (0.15%) (见图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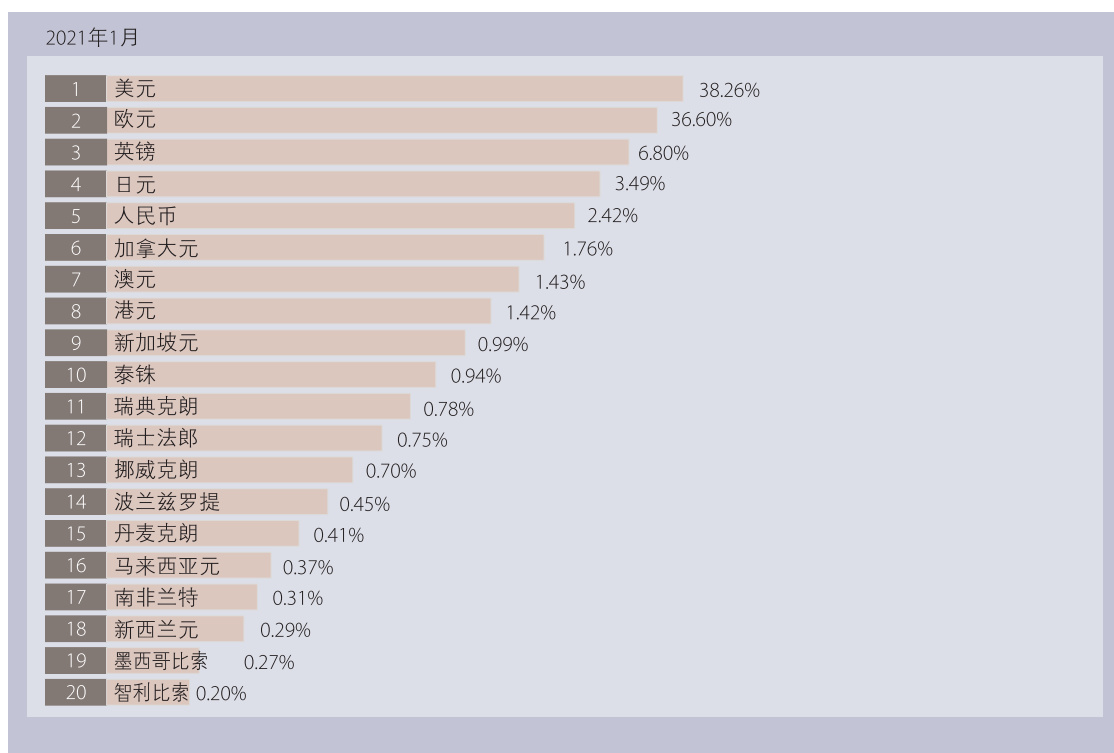


图 6.2 全球支付结算货币占比排名

资料来源：SWIFT Wat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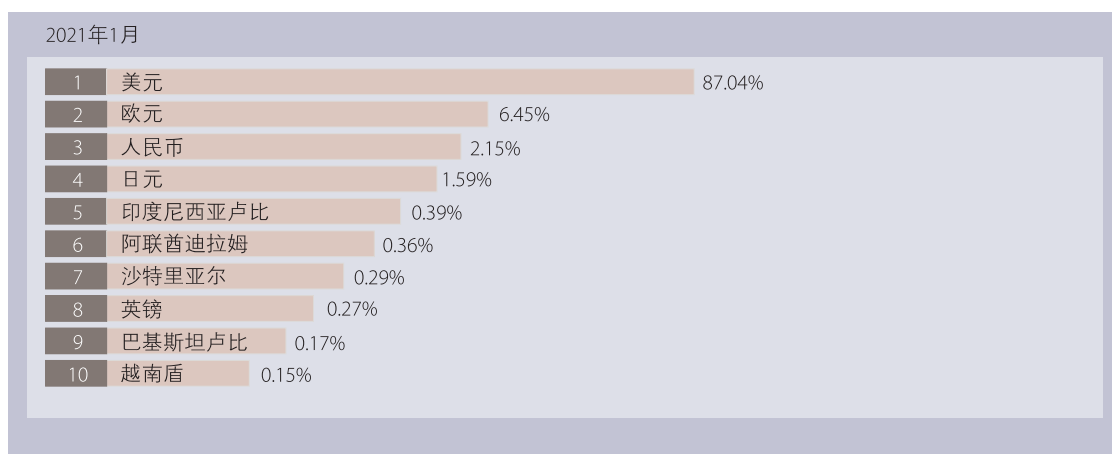


图 6.3 全球贸易融资市场货币占比排名

资料来源：SWIFT Watch。

6.2.2 亚洲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6.2.2.1 市场联结

2003年，东盟十国和中日韩财长会决定从市场基础设施层面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2010年还建立了为本币债券提供担保的专门机构，建立亚洲债券发布网站并协同债市标准。2005年，国际清算银行亚洲顾问委员会配合东亚及太平洋行长会议机制，先后启动了两期亚洲债券基金，推动亚洲本地债券市场的发展。

2014年，东盟发起“东盟银行一体化框架”（ABIF）动议，力争到2020年促成各成员国建立“合格的东盟银行”制度（QABs）。2016年，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推动下，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签署的亚洲地区基金护照（ARFP）计划开始实施。

2015年7月，中国的内地与香港建立了基金互认安排。2014年、2016年和201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建立起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安排，逐步打通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间的资金流动。2019年1月，中国印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加强与东盟地区证券、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合作，推动境内外交易所市场联结，推进与东盟地区证券交易所品种互认。

202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居民可通过“南向通”和“北向通”购买内地和港澳地区合格的投资理财产品。

为更高水平地聚集国际资本，共同发展，2017年1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巴基斯坦哈比银行组成的联合体收购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40%的股权；2017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局共同投资建设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目前，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正在推动中阿两国共建一个辐射中东、北非的国际交易所，通过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等多种产品，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标的，帮助中阿两国企业在该地区进行投融资。

6.2.2.2 支付体系与数字货币合作

亚洲各经济体官方机构和非官方企业积极推出了多种支付系统及服务，共同推进了区域内的支付结算互联互通。目前，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新加坡快速安全转账系统（FAST）、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通信媒体发展局联合发布的快速反应编码系统（SGQR）、印度国家支付公司开发并由印度

央行监管的统一支付接口 (UPI) 是亚洲几家主要的官方跨境支付系统。中国银联是亚洲国家中网络发展最广、发卡量最大的银行卡组织。中国的支付宝 (Alipay)、新加坡的 Nium、印度的支付宝 (Paytm) 以及马来西亚的 MOLPay 等则是亚洲具有代表性的非银行支付平台。

进入 2020 年,亚洲各经济体央行加速研发和落地各经济体的央行数字货币 (CBDC)。目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导的 Ubin 项目已进入第五阶段,并在 2019 年与加拿大央行的 Jasper 项目成功联通,尝试进行了跨境的央行数字货币付款。2020 年 1 月,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与泰国央行合作了 Inthanon-LionRock 项目。从 2020 年 3 月起,中国的数字人民币 (e-CNY) 项目已在全国 11 个地区开展试点。日本央行于 2020 年 7 月发布研究报告,表示开始深入研究 CBDC。2021 年 2 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 (m-CBDC Bridge), 将通过开发试验原型,进一步研究分布式账本技术 (DLT), 实现央行对数字货币的跨境交易全天候同步交收 (PvP) 结算,便利跨境贸易场景下的本外币兑换。

6.2.2.3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与机构

为推动亚洲区内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融资,从 2014 年起,中国设立了丝路基金,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先后设立了香港基础设施融资促进办公室 (IFFO) 和“基础设施亚洲”专门机构。2015 年 12 月,以亚洲为主的 57 个成员共同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亚投行”) 正式成立。2020 年,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MCDF) 基金正式建立。2018 年,中国的中投公司还与日本野村证券、大和证券等五大日本金融集团成立中日产业合作基金,投资于中日两国及第三方国家的制造业、通信传媒、医疗、消费等企业。

6.3 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

本节探讨金融中心在促进亚洲金融融合中所发挥的作用。金融中心可以聚集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吸引大量金融人才,活跃资本市场交易,低成本、高效率地促进资金流动。同时,人才、资金和技术资源集聚形成金融产业规模,通过对外扩散在区域内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周边城市的经济产生需求关联和资本溢出效应。例如,中国的上海、北京和深圳吸引国内外各类资金进入,带动形成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核心城市群;香港是多国公司在亚太上市的首选地,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投融资门户,迪拜是中东国家国际自由贸易的窗口。正是通过对金融资源的集聚、扩散和辐射,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以点带面地推进了亚洲区域金融融合。然而,正是因为对金融资源的连接和枢纽作用,让金融中心与全球的资本市场有着高度的关联。区外的货币、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都会对区内金融市场发展产生影响。

6.3.1 六个亚洲城市跻身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

2020 年 9 月,英国 Z/Yen 集团与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了第 28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 28)。该指标根据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声誉 5 个方面对全球 111 个金融中心进行排名。亚洲城市共入围 38 个,占比达到 34.2%。前 10 名中,亚洲占据了 6 个,分别是上海 (第 3 名)、东京 (第 4 名)、香港 (第 5 名)、新加坡 (第 6 名)、北京 (第 7 名)、深圳 (第 9 名)。

从 GDP 体量 (见图 6.4) 看,东京 2020 年 GDP 为 9,879.9 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一,为北京 (5,232.3 亿美元) 或上海 (5,608.8 亿美元) 的近两倍,为深圳 (4,101.4 亿美元) 的 2.4 倍、新加坡 (3,464.7 亿美元) 或香港 (3,467.6 亿美元) 的 2.8 倍。

从发展速度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处于

高速增长阶段,近10年GDP年均增速在8%左右;香港和新加坡经济从2010年以来年均增速在3%到4%之间。东京GDP近年来小幅回升,从2015年的8,635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9,879.9亿美元。

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见图6.5)来看,2020年中国GDP为101.5万亿元,全国金融业增加值8.4万亿元,GDP占比达8%;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这一比例都在13%以上。其中,北京金融业GDP占比在2020年第三

季度已达20.4%,较2011年提高了6.7个百分点,与香港、纽约和伦敦等国际级金融中心基本持平¹,金融业已逐步发展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对京津冀区域产生了强有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从2011年的11.8%提升至2019年的17.3%,深圳近10年来则维持在13%左右,东京在8%左右。相较之下,东京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较低,支柱行业主要是零售商贸、旅游餐饮和房地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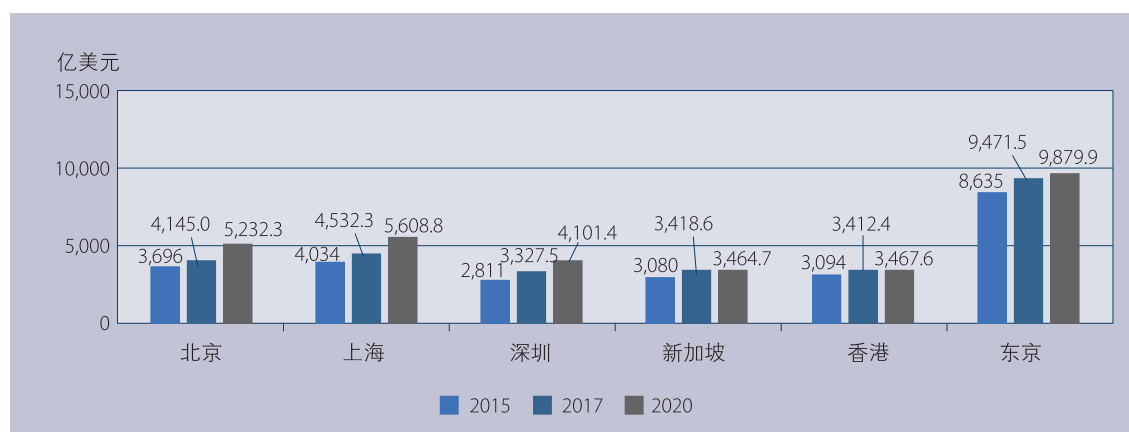


图 6.4 亚洲金融中心城市 GDP²

资料来源:Wind 数据库,作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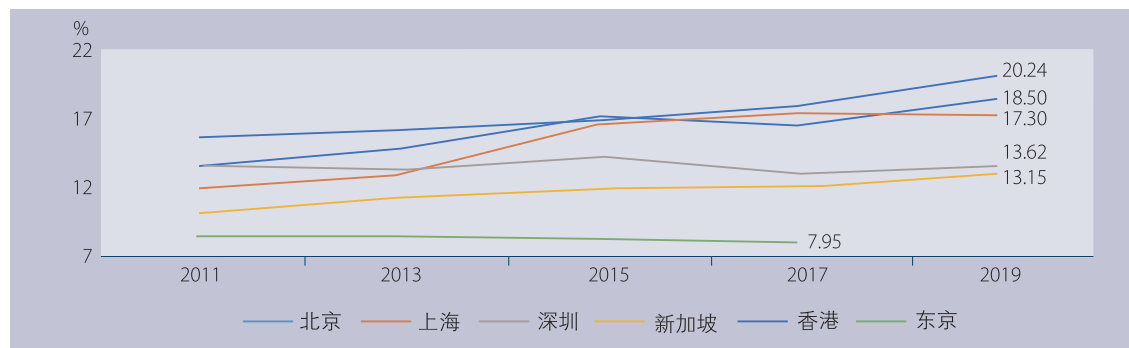


图 6.5 金融业增加值占城市 GDP 比重

资料来源:Wind 数据库,作者整理。

1. 香港2019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2%,伦敦2012年这一比例超过18.6%,纽约2019年金融和房地产合计占比24.4%。
2. 新加坡和香港2020年GDP根据报道预测,东京2020年GDP为2019年数据,2020年数据不可得。

6.3.2 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聚集

“金融行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亚洲的金融中心城市对金融人才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高端的金融人才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力资本指数 2020 显示，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包揽了全球前 4 位，中国澳门排名第 7 位，中国排名第 45 位。该指标用受教育年数和质量、孩童和成人成活率、考试成绩

等指标综合评估，体现了亚洲的几大重要经济体在人才教育上的投入力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就中国而言，2019 年内地金融业从业人数共 826 万人，其中北京 64.5 万人、上海 37.9 万人、深圳 23.8 万人，合计占比达 15.3%；香港的金融就业人数超 31 万人。日本东京在 2014 年金融从业人数就超过了 40 万人（见表 6.5）。

表 6.5 亚洲金融中心城市人力资本情况

城市	金融从业人数/万人	2019 年城市常住人口/万人	2020 年人力资本指数（排名）
北京	64.5	2,153.6	0.65（45）
上海	37.9	2,428.1	0.65（46）
深圳	23.8	1,343.9	0.65（47）
香港	31.0	752.0	0.81（2）
新加坡	—	570.0	0.88（1）
东京	40.0	1,396.0	0.8（3）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北京、上海、深圳城市年鉴，香港、新加坡统计局，世界银行 HCI 指数，作者整理。

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集聚，为金融人才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2019 年，上海各类持牌金融机构 1,600 多家，其中外资金金融机构 517 家，占比 31%，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 758 家、外资研发中心 475 家，“世界 500 强”中有 1/4 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成为内地跨国公司总部最集中的城市。截至 2020 年上半年，北京拥有的持牌法人金融机构超过 700 家，金融资产占全国的 45%，拥有 2.75 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加坡共有各类金融机构 1,800 余家，其中有 128 家外资银行、191 家保险公司、850 家各类金融市场的服务机构和 287 家资管公司。接近 1/3 的世界 500 强企业将其亚洲总部设在新加坡，还有 400 多家知名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或办事处。香港 2019 年有保险机构 2,800 家，银行 225 家，其他各类金融机构 8,900 家。

阿联酋的迪拜和阿布扎比主要依靠自贸区来带动金融业。截至 2020 年 11 月，阿联酋自由贸易区的数量超 44 个，大部分位于迪拜和阿布扎比，自贸区内运营的公司达 5.86 万家。比较著名的自贸区有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DMCC），入驻企业超过 1 万家，企业总营业额超过迪拜 GDP 的 10%。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是中东地区最大、最发达的金融中心。世界 500 强公司中有 138 家公司于此注册其分支机构，以此覆盖中东和非洲的业务。

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努尔苏丹）是中亚五国重要的金融枢纽。其中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金融资源最集中、发展业务和吸引投资最便利的城市，汇聚了哈萨克斯坦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大部分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公司。阿斯塔纳则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截至 2020 年 9 月，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IFC)吸引了全球42个经济体的545家企业入驻,累计吸引投资4.44亿美元,意向投资额超过35亿美元。

政府的人才引进和各类优惠政策,为金融人才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例如,香港从2006年开始通过“优才计划”引进高端人才,金融和会计服务行业人才一直占总配额的20%以上;北京在2018年准许符合条件的创投和基金高管直接落户;深圳在2020年2月颁布政策,支持高端金融人才外出学习培训,资助高校学生来深圳实习。此外,香港的个人所得税率最高档为17%,新加坡的个税最高不超过20%,且没有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

6.3.3 股票市场健全且发展迅速

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资金流动的重要场所,引领了亚洲资本市场发展。位于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区域性交易所,如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和孟买交易所等,为区域内的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撑和保障。2020年疫情下,亚洲的主要交易所更是发挥了在低利率和美元汇率走低的背景下,吸引全球资金进入亚洲的重要作用。

从上市公司看,亚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全球占比从2010年的42.6%增加到2020年的58.7%。中国是过去10年中首次公开募股(IPO)数量最多的国家,新增上市公司数量是美国的3倍¹。印度、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的IPO在过去10年中也排在全球前十。2019年,A股正式设立科创板,并于2020年率先在科创板和创业板试点了注册制,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IPO数量快速增加,2020年分别达到234家和161家。受中国概念股回归等因素推动,2020年香港证券交易所的IPO数量也达到了144家。东京证券交易所和韩国证券交易所IPO数量分别达92家和61家。从总量看,香港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和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均超过2,000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1,800家和696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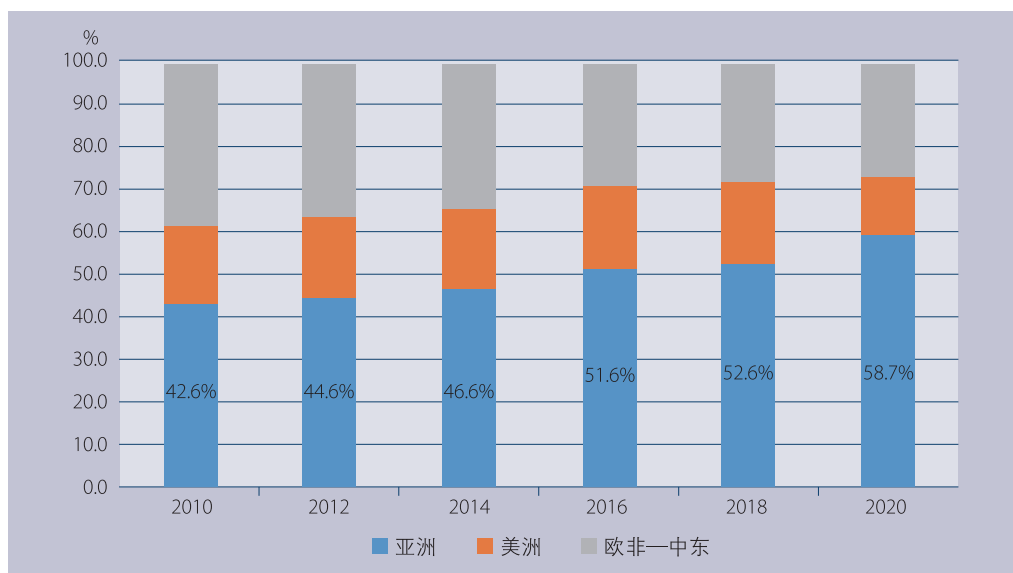


图 6.6 亚洲上市公司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交易所联合会。

1. 过去20年,美国的上市公司数量从8,000家减少到4,000家,而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也有相同的趋势。

从募资金额上来看，2020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募资金额达到 1,393 亿美元(见表 6.6)，较 2019 年增长 88.5%，排名亚洲第一。香港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分列二至六位，募资金额均达到百亿美元以上。印度孟买的国家证券交易所曾经是除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之外的世界第三大交易所，2020 年募资 324 亿美元，凸显出孟买作为南亚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

从总市值和交易量上来看，2020 年全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量达 18.8 万亿美元，市值 5.2 万亿美元，中小板和创业板等小市值股票较多且交易活跃；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量 12.8 万亿美元，市值近 7 万亿美元，主板蓝筹股较多。东京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也均超过 6 万亿美元，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和全年交易量基本持平，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全年交易量只有总市值的一半左右，交易不算活跃。

表 6.6 2020 年亚洲主要证券交易所数据

城市	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数量/ 家	IPO 数量	募资金额/ 十亿美元	交易量/ 十亿美元	总市值/ 十亿美元
香港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2,538	144	95.9	3,145.2	6,130.4
深圳	深圳证券交易所	2,354	161	86.4	18,750.1	5,238.5
釜山	韩国交易所	2,340	61	4	5,221.9	2,176.2
孟买	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1,959	18	32.4	1,844.9	2,552.5
上海	上海证券交易所	1,800	234	139.3	12,830.5	6,976
新加坡	新加坡交易所	696	6	10.8	271	652.6
东京	东京证券交易所	3,758	92	30	6,337.9	6,718.2

资料来源：世界交易所联合会，作者整理。

其他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中，位于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达到 122 家，总市值 449.7 亿美元。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IFC) 国际交易所 (AIX) 上市公司也超过 20 家，包括中信证券 (CITICS)、复星资本 (Renaissance Capital)、中金公司 (CICC)、申万宏源 (SWHY)、Wood、Univer 等证券公司，累计吸引股金 2.91 亿美元，累计发行私募债券 46 亿美元，公共债券 29 亿美元。2019 年，阿拉木图 GDP 占整个哈萨克斯坦 GDP 的 20.9%，哈萨克斯坦国内和独联体等周边国家的金融机构呈现向阿拉木图集聚的趋势，其影响和辐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西亚的纳斯达克迪拜交易所所有 63 家上市公司，投资者中约 30% 来自中东和非洲，30% 来自欧洲，曾为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中国企业发行过总价值 101 亿美元的债券。迪拜商品交易所 (DME) 是中亚地区主要的国际能源期货和商品交易所，也是世界第三大原油基准，平均每日的原油交易量在 597 万桶，年交易量超过 6 亿桶，每月可输送 15 万至 2,200 万桶阿曼原油。迪拜黄金和商品交易所 (DGCX) 2020 年交易了 2,000 万张清算的合约，名义价值超过 8,260 亿美元，日均资产交易量为 15 亿到 40 亿美元之间。

6.3.4 信贷发达助力良好营商环境

从贷款规模(见表6.7)上看,东京的信贷规模2018年接近2,000亿美元,上海、北京和香港在2019年也都超过了1,000亿美元,深圳为861亿美元,新加坡则为510亿美元。从贷款结构上看,上海、北京和深圳的贷款主要流向国内,境外贷款比例在2%到5%之间,而新加坡和香港境外贷款比例分别达到了30%和12%(见表6.8)。新加坡和香港的银行业非常发达,国际性银行众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信贷业务,在国际金融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信贷/GDP比例是“金融中心指数2020”中相关度最高的指标,国内外学者通常用该

指标来衡量信贷效率,从而反映一个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从这一比例来看,2019年,香港信贷/GDP超过300%,达到364%,上海、深圳、北京和东京(2018年数据)也都超过了200%,而新加坡则为137%(见表6.9)。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了其成员每个季度的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的比例,2020年第二季度,这一比例的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国香港、中国、韩国、新加坡和日本,且均高于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的平均水平,而印度则为60%(见表6.10)。这说明重点关注的几大金融中心银行信贷业务均较为发达,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表 6.7 2015—2019 年金融中心信贷规模

单位:十亿美元

城市	信贷规模—各项贷款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上海	850.1	903.3	993.8	1,108.5	1,155.5
深圳	516.7	610.3	685.3	794.9	860.5
北京	932.5	959.9	1,007.3	1,066.3	1,112.5
新加坡	425.9	430.0	484.3	490.2	510.4
香港	972.1	1,034.1	1,192.1	1,243.4	1,329.6
东京	1,610.5	1,848.1	1,842.7	1,938.8	—

资料来源:东京都统计局,CEIC数据库,新加坡统计局,北京、深圳、上海城市年鉴,作者整理。

表 6.8 2015—2019 年金融中心境外贷款比例

单位:%

城市	境外贷款/信贷规模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上海	3.8	6.8	5.9	5.4	—
深圳	5.7	5.6	5.1	5.1	4.1
北京	6.6	6.5	5.2	3.0	2.1
新加坡	12.8	12.7	12.6	11.8	12.0
香港	30.3	29.7	30.1	29.4	30.0
东京	—	—	—	—	—

资料来源:东京都统计局,CEIC数据库,新加坡统计局,北京、深圳、上海城市年鉴,作者整理。

表 6.9 2015—2019 年金融中心信贷/GDP

单位：%

城市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上海	211	213	219	204	209
深圳	184	208	206	217	221
北京	252	248	243	213	217
新加坡	138	135	142	131	137
香港	314	322	349	344	364
东京	187	191	195	201	—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库，作者整理。

表 6.10 2019 年第一季度—2020 年第二季度城市所在经济体对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GDP

经济体	2019Q1	2019Q2	2019Q3	2019Q4	2020Q1	2020Q2
中国	2.05	2.04	2.05	2.05	2.16	2.22
中国香港	2.96	2.99	3.04	3.06	3.21	3.28
印度	0.58	0.56	0.56	0.56	0.58	0.60
日本	1.62	1.62	1.63	1.64	1.66	1.78
韩国	1.89	1.92	1.94	1.97	2.01	2.07
新加坡	1.66	1.69	1.69	1.76	1.79	1.86
新兴经济体	1.43	1.43	1.40	1.44	1.44	1.54
发达经济体	1.61	1.64	1.62	1.65	1.64	1.74
所有报告内经济体	1.54	1.56	1.53	1.56	1.56	1.66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库。

6.3.5 外汇交易和财富管理业务活跃

全球的外汇交易多年来一直集中在几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清算银行（BIS）2019 年 12 月一期的调查显示，2019 年 4 月，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日本这五个地区占全球外汇交易的 79%（见图 6.7）。其中，英国占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份额的 43.1%，美国占 16.5%，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占 7.7% 和 7.6%，分别排名全球第三和第四。亚太地

区整体约占全球的 25%，香港、新加坡和东京的外汇交易份额在 20% 左右。2016 年以来，新加坡和东京的交易活动增长相对放缓，份额小幅下降，香港的外汇交易量增长率高于全球增速。中国的交易活动显著增加，2019 年达到 1,360 亿美元（见表 6.11），相比 2016 年增长了 87%，上海一跃成为全球第八大外汇交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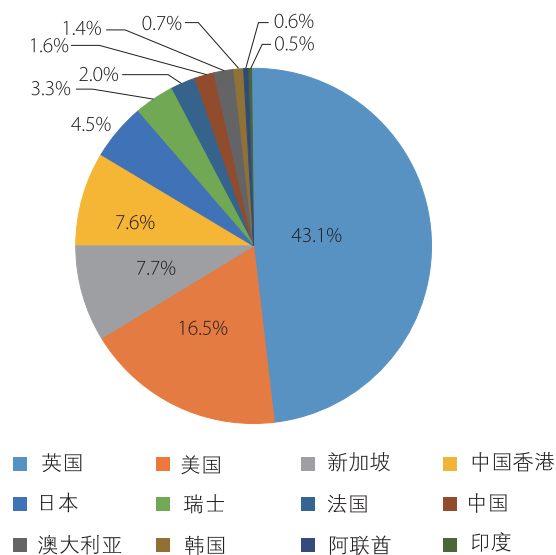


图 6.7 2019 年主要经济体外汇交易量占比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2019 年外汇调查。

表 6.11 2013 年、2016 年和 2019 年主要经济体外汇交易量

单位：十亿美元

经济体	2013	2016	2019
英国	2,726	2,406	3,576
美国	1,263	1,272	1,370
新加坡	383	517	640
中国香港	275	437	632
日本	374	399	376
瑞士	216	156	276
法国	190	181	167
中国	44	73	136
澳大利亚	182	121	119
韩国	48	48	55
阿联酋	—	—	46
印度	31	34	40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2019 年外汇调查。

新加坡不仅是全亚洲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也是亚太区领先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

中心。截至 2020 年 10 月，新加坡的资金管理规模达到 4 万亿新元，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了 15%，其中资产的 75%来自境外，69%投资在亚太区域，共有 890 多家资产管理机构。2020 年 1 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了可变动资本公司（VCC）框架，为基金提供灵活的企业结构，兼具运营和成本优势，8 个月内吸引超过 120 家公司注册。此外，新加坡还是亚洲领先的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中心。在 2018 年德勤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排名中，新加坡位列全球第二，是亚洲私人银行家调查评选中最受喜爱的离岸财富中心。2017—2019 年，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增长了 5 倍。宽松的投资环境和金融监管政策、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高端财富管理人才，成功吸引了高净值人士入驻。

6.3.6 亚洲金融中心引领新经济新业态发展

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向创新企业提供资本、人才、科研等要素支撑，营造良好创业生态，成为孕育新经济新业态的沃土。从 2020 年 8 月发布的“2020 胡润全球独角兽排行榜”来看，全球 586 家 2000 年之后成立、价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即独角兽）中，亚洲上榜了 278 家，占总数量的

一半以上，占总价值的 55%；其中 60%以上都将总部设立在亚洲金融中心。北京是全球独角兽之都，共有 93 家，包括字节跳动、滴滴出行、快手、京东健康等。上海有 47 家，代表企业有陆金所、平安医保科技等。深圳也上榜了 20 家，包括微众银行、大疆科技、优必选等。首尔有 Coupang、Woowa Brothers 等 9 家，东京有 Preferred Network 等 3 家，新加坡有 Trax 等 2 家。

金融中心是独角兽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地，金融业本身也是出产独角兽最高的领域（占比达 31.0%）。从投资机构看，除老虎基金、高盛等欧美风投机构外，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力地支持了本地风投机构的成长与运作。北京的高瓴资本、红杉中国基金，上海的云峰基金，深圳的腾讯投资，东京的软银、丰田汽车，新加坡的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以及卡塔尔的卡塔尔投资局都是全球领先的风投机构。从金融领域独角兽看，中国的蚂蚁集团、陆金所、微众银行和印度的 Paytm 等估值均超过了 130 亿美元，排在全球独角兽企业的前二十名。

参考文献

- [1] 澳大利亚统计局. 2019 年国际直接投资补充统计. <http://www.abs.gov.au/>, 2020-5.
- [2] 北京市统计局. 北京市统计年鉴 2020.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 [3] 自由贸易协定: 亚洲的选择.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0.
- [4] 曹莉. 亚洲金融合作与中国作用. 中国金融, 2020 (Z1): 130-132.
- [5] 陈雨露, 罗煜.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 一个述评. 管理世界, 2007 (4): 138-147.
- [6]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英国 Z/Yen 集团. 第 28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2020 (9).
- [7]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统计. <http://www.asean.org/resource/statistics/asean-statistics/>, 2020-12.
-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协调的直接投资调查(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CDIS) 数据库. <http://data.imf.org/>, 2020-12.
- [9] 姜莉莉. 亚洲主要金融中心发展现状及优劣势分析. 时代金融, 2014 (26): 45-48.
- [10] 金鹏辉.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若干思考. 上海金融, 2020 (11): 2-7.
- [1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统计. <http://stats.oecd.org/>, 2020-10.
- [12] 凯捷研究院. 2020 年世界支付报告. <https://www.capgemini.com/cn-zh/>, 2020-10.
- [13]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 疫情后的国际生产. 联合国, 2020.
- [14]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第 37 期)(RCEP 协定特刊). 联合国, 2020-11.
- [15]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第 38 期). 联合国, 2021-1.
- [16] 牛盈芬, 马青林. 金融中心从集聚到辐射效应的研究评述. 财讯, 2018 (25): 74.
- [17]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日本贸易和投资统计. <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2020 (12).
- [18]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市统计年鉴 2019.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 [19] 深圳市统计局. 深圳市统计年鉴 2020.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 [20]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 <https://wits.worldbank.org/>.
- [21] 吴东, 温振华. 国际金融中心定义辨析. 中国外汇, 2013 (7): 72.
- [22] 新加坡统计局. 2019 年新加坡外资股权投资, 2019 年新加坡对外投资. <http://www.singstat.gov.sg/>, 2020-12.
- [23] 新加坡统计局. 2019 年新加坡外资股权投资, 2019 年新加坡对外投资. <http://www.singstat.gov.sg/>, 2021-1.
- [24] 印度工业政策与促进部. 外资直接投资统计. http://dipp.nic.in/English/Publications/FDI_

- Statistics/FDI_Statistics.aspx, 2020-12.
- [25] 印度工业政策与促进部. 外资直接投资统计. http://dipp.nic.in/English/Publications/FDI_Statistics/FDI_Statistics.aspx, 2020-12.
- [26] 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局. 2019 年实现的国内及外国直接投资. <http://www.bkpm.go.id/>, 2020 (2) .
- [27] 余秀荣. 国际金融中心历史变迁与功能演进研究. 沈阳: 辽宁大学, 2009.
- [28] 张颖. 改革开放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中国金融, 2020 (22): 93-94.
- [29] 张震. 金融开放度量方法研究评述. 经济学动态, 2008 (3): 117-120.
- [30] 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20.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 [31] 中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 [3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2019 年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www.censtatd.gov.hk, 2020.
- [33] 周小川. IT 技术发展将促进支付体系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 2020 上海金融论坛.
- [34] 朱元倩, 文君. 亚洲跨境支付的现状和展望. 中国银行业, 2020 (9): 80-82.
- [35] Kindleberger C P. The in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36] OECD. OECD Equity Market Review Asia 2019. 2019.
- [37] Valentina B, Song S H. Cross-Border Banking and Global Liquid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5 (2): 2.

编写说明及致谢

本年度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曹莉共同担纲，曹莉副院长负责报告的整体组织和协调。

报告分上下两篇，上篇主题为“亚洲经济展望”，由张宇燕教授主编。在写作分工上，概述由徐秀军撰写，第1章由冯维江（1.1和1.2）、熊爱宗（1.3和1.4）和贾中正（1.5）撰写，第2章由徐秀军（2.1和2.4）、贾中正（2.2）和熊爱宗（2.3）撰写。下篇主题为“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由林桂军教授和曹莉副院长共同主编，写作团队包括曹莉（概述）、裴建锁和张蒙（3.1）、邓世专（3.2）、王飞（4.1）、周念利（4.2）、孙梦阳（4.3）、王春蕊（5.1和5.2）、刘琰（6.1和6.2）、田维希（6.3）。写作团队全体成员自报告立意构思至报告截稿之日，勤勉精进、通力合作，以卓越的专业素养和忘我的工作热情保障了此报告的顺利交付。

在报告构思与写作过程中，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先生给予了全面的指导和帮助。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前执行院长欧美同学会会长姚望、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执行董事何建雄、中国亚太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玉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等四位专家对报告提出了专业的评审意见。对论坛秘书长和评审专家对报告的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专业团队对本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

由于水平有限、疏漏难免，文责作者承担。本报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
国贸大厦A座42层
电话 +86 10 65057377
传真 +86 10 65051833
网址 www.boaoforum.org

Secretariat of Boao Forum for Asia
Floor 42 China World Tower A
No. 1 Jianguomenwai Avenue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el +86 10 65057377
Fax +86 10 65051833
www.boaoforum.org



责任编辑：张俊娟

责任印制：沈德军

封面设计： 正典设计
www.feall.com



定价：200.00元